



国际生活

俄罗斯对外政策、外交和国家安全





外国使节服务署
俄罗斯外交部

热情接待——我们的本分



- 出租方：经验丰富、信誉可靠——不动产管理始于1921年
- 经营莫斯科市100万平方米舒适环境的住宅与写字楼
- 联邦所有制——直接持续租赁
- 交易上法律手续干净透明
- 首都市场上向同一个所有者承租市内不同街区不动产的一个独特机遇
- 所有楼区设有治安保卫、停车场、昼夜物业服务值守
- 受人尊敬的邻居

www.arena.updk.ru, www.updk.ru

(495) 770-35-35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外国使节服务署

广告

项目领导人

“国际生活”杂志总编—阿尔曼·奥加涅祥

项目责任编辑

“国际生活”杂志责任秘书，历史学博士—叶甫根尼娅·皮亚德舍娃

摄影图片

伊丽娜·兹纳特诺娃

玛丽娜·丘林娜

维克托莉雅·波兹德尼娅科娃

中文版

中文翻译

© ООО «Прогресс ИД»

总经理 - 萨尔基斯·奥加尼扬

编辑部副主任 - 玛加丽塔·塔尔韦尔多娃

翻译：伊丽娜·科斯特罗米季诺娃、李裕泰

电脑排字—阿列克谢·乌瓦洛夫

排版—安东·佳特洛夫

编辑部地址：邮政编码105064，莫斯科，高罗霍夫斯基小巷14号

电话：+7(499)265-3781；传真：+7(499)265-37-71

E-mail:info@interaffairs.ru

©«国际生活»杂志编辑部2013

目录

趋向

5 谢尔盖·纳雷什金
在欧洲议会大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5 谢尔盖·拉夫罗夫
俄罗斯外交哲学

21 亚历山大·雅科文科
今天世界和国际关系：
新的和久已遗忘的旧的

33 诺达里·西莫尼亚、
阿纳托利·托尔库诺夫
全球化与世界领导的若干问题

47 亚历山大·兹梅耶夫斯基
谈反刑事挑战和威胁斗争的国际合作

今年主题

55 根纳季·加季洛夫
叙利亚问题的调解公式：
民族对话与境外玩家的有效作用相乘

67 阿尔曼·奥加涅祥
叙利亚：
谁为“保护责任”承担责任

71 阿列克谢·波采罗布
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主义末日来临？

本期访谈

阿列克谢·梅什科夫 85
传言欧盟走向解体，恐怕为时过早

谢尔盖·里亚博科夫 109
俄-美：拟扩大相互等待和机遇的界面

尤里·沙弗兰尼科 121
降低国内天然气价格并使天然气饱和全部工业

地区向量

安德烈·克林 125
全欧思想还活着吗？

弗拉基米尔·科津 133
美国“新”核战略及其对俄罗斯的后果

塔季扬娜·杰伊奇 155
非洲的“中国世纪”

谢尔盖·沙尔科 169
中亚作为欧亚地缘政治中心：新的可能性还是幻觉？

图书专栏

伊戈尔·莫尔古洛夫 189
俄罗斯和中国：历史和现代。对一本书的三种意见

叶甫根尼娅·皮亚德舍娃 197
至关重要的世界政治和俄罗斯外交问题

杂志理事会

谢尔盖·拉夫罗夫
俄罗斯外交部长

亚历山大·阿夫杰耶夫
特命全权大使

安德烈·杰尼索夫
特命全权大使、经济学副博士

亚历山大·扎索霍夫
政治学博士

伊戈尔·伊万诺夫
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历史学博士

康斯坦丁·科萨乔夫
俄罗斯联邦合作署署长、法学副博士

弗拉基米尔·卢金
俄罗斯人权全权代表、历史学博士、教授

米哈伊尔·马尔格洛夫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政治学副博士

谢尔盖·马列耶夫
俄罗斯外交部总经理

阿列克谢·梅什科夫
特命全权大使

亚历山大·帕诺夫
政治学博士

盖奥尔吉·彼得罗夫
俄罗斯联邦工商会副会长

叶甫根尼·普里马科夫E.M.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阿列克谢·普什科夫
俄罗斯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历史学副博士

谢尔盖·里亚博科夫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米哈伊尔·谢斯拉文斯基
俄罗斯出版和大众传媒署署长

弗拉基米尔·季托夫
俄罗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阿纳托利·托尔库诺夫
俄罗斯科学院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政治学博士

阿列克谢·费多托夫
特派大使、俄罗斯外交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弗拉基米尔·奇若夫
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

维塔利·丘尔金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历史学副博士

尤里·沙弗兰尼科
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工业家联盟理事会主席、“世界政治与资源”基金会主席

亚历山大·雅科文科
特命全权大使、法学博士

谢尔盖·纳雷什金

俄罗斯联邦议会国家杜马主席



在欧洲议会大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尊敬的主席，尊敬的秘书长，尊敬的议会大会成员们！

一年前我没能到这里访问。可是，当时使我推迟行程的原因，在今天条件下成了进行会晤的补充的和重要的情况与理由。我看到现在又有使议会大会失调并转移其对真正迫切问题，包括与必需深刻改革议会监督系统相关问题的讨论和解决的企图。我认为这是重要课题并重新提及它。

Сергей НАРЫШКИН,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ПЛЕНАР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ПАРЛАМЕНТСКОЙ АССАМБЛЕИ СОВЕТА ЕВРОПЫ

此外，我在莫斯科和我深刻真诚尊敬的亚格兰先生与米尼翁先生的会晤，使我更加确信欧洲国家肩负的责任迅速增大。现在它简直是空前沉重。

因为我们是在戏剧性时刻进行了会晤。尽管在叙利亚可看到的事件远离欧洲，事件进程和事前的情况证明对和平的威胁和对法律的忽视与欧洲大陆建立的世界秩序基础有直接联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最危险的是靠边站，漠不关心。

冷漠和妥协会导致什么，是欧洲所有国家都熟知的。当欧洲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牺牲的人数以百万计，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它已是以千万计。我们知道：今天一系列国家的立场不仅坚定，而且明确。我这里指的是您们知道的英国议会的投票。它禁止自己的政府参加对叙利亚的火箭一炸弹轰击。

俄罗斯总统调解叙利亚局势的建议得到了广泛支持并已开始实施。您们知道几天前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对著名决议的投票结果。欧洲对今天的法律和发展原则中存在的人文价值的许多世纪的忠诚起了远非次要的作用。

您们大概会问我现在为何谈到它。至少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件都已开始被遗忘，有人企图“粉饰”它的教训，歪曲XX世纪最可怕的悲剧实质本身。当时纳粹分子宣布了自己的特殊性和优越性，无耻地编排了绝灭欧洲整个人民的次序。

冷漠对待这种危险的意识形态传播的结果，终于使全世界付出巨大代价。就此只想引用一句名言：“冷漠似乎有诱惑力，甚至使人迷惑”，然而“正是对痛苦的冷漠态度使人失去人性”并且“有利于侵略者”。人道主义者、作家、诺贝尔奖金得主埃利·威塞尔正确指出了这一点。

我要提到的是：明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一百周年，它给整个欧洲带来了严重后果，使我国趋向混乱，首次建立的民主议会 被驱散，还有1917年革命事件和内战。

与此同时，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击的侵略只是潜伏了下来，它仅仅二十年后就进行报复，导致了新的世界火灾。我想再次指出，它导致了几千万人的牺牲。

纳粹反人类罪行在纽伦堡受到了审判，国际法庭的判决是无期限的。可是现代一些政治家却不知为何开始忘记这一点。也忘记了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暂时未接触到邪恶的那些人的默许下发生的，而当时后者已经剥夺了其他国家的自由和人们的性命。

作为俄罗斯历史协会主席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纪念民族筹备委员会首脑，我认为不应该忘记这种教训。维护历史真实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任务，不管是在民族教育计划范围内还是在欧洲青年政策上。就此我建议不仅要在大学，而且要在中学讲授纽伦堡审判文件，使之成为欧洲所有语言的主要文件，包括在欧洲理事会、联合国、欧安组和其他国际联合组织的网页上登载。

尊敬的女士们和先生们！

今天和已过去的世纪那样，世界上不同国家的人们特别关注欧洲事态，它的社会—经济、政治进程、我们议会的辩论过程。因为正是在这里，在欧洲出现了伟大的发现和工艺突破，诞生了使有可能取得进步和使人类得到自由和当之无愧的生活的法律与社会—政治理论。

在座各位十分清楚，没有道德不可能有真理。我们没有权利闭眼不看干涉法律乃至道德准则的行为。正因为这样，还在九月份俄罗斯议员们就首先，实际上是唯一呼吁和美国同行会晤，以讨论叙利亚周围局势。但是，正如您们所知，我们遭到了拒绝。即

那边只顾作出自己的决定，不愿意听取别的理由。说实话，这对于议会前所未有的情况。

与此同时，我确信：今天在上世界上议会外交的作用在不断增大并且越来越重要。还在千年前于欧洲开始出现的代议制民主，不仅对现代国家还是对世界用痛苦换取的安全结构的保持，都仍然是经受过考验和必要的机构。

不能忘记，正是在XX世纪下半期，共同责任和欧洲统一的情感上升到了空前的高度。正是它使有可能在1945年建立联合国，而四年后建立了欧洲理事会及其议会大会。

我确信，今天在斯特拉斯堡组织范围内可以也应该解决对世界和欧洲大陆最复杂和重要的问题。对它们不能保持沉默，应该把它们纳入议事日程。何况在这里，在议会大会向来都有不同的意见，提出不同的立场。对于我国，这是决定性的指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属于8亿欧洲人的共同的决定。

至于对我们和对任何国家的批评，都不可避免。我们所有人在各国的议会上也都看到这种情况。可是，成见的情绪可能贬低最高尚的思想并损害任何建设性的努力。这种情绪不可避免地出现是因为有人企图把越来越多不仅与欧委会议会大会监督程序有关，而且和把它转变为欧委会部长委员会的可能性有关的新的义务强加给俄罗斯和一系列其他国家。我想，完全是另外的一个问题——关于从对国家监察转到专题监察过渡的问题也已成熟。

我们认为，所谓对新民主的特别监察的做法已经过时。它实际上把欧委会议会大会划分为“清洁”和“不清洁”的国家。即对一些国家经常提出要求，对另一些国家则几乎从来没有要求。但是，如果这种监察对新的国家，在民主道路上刚刚迈出了头几步的国家在参加欧委会的早期阶段似乎还合理，现在这显然已是不合理的陈旧做法，我甚至敢说这是政治歧视。就此我们确信监察

程序需要深入的原则性的改革。据我们所知，一系列其他代表团都赞同这种立场。我们将坚定地并以充分的理由建议这种决定。

在欧洲理事会活动中还有不仅我们在欧委会议会大会上提到的其他问题。我甚至同意，有时问题是具有客观性质的。可是问题在于怎样抛掉这种包袱，不把它留给后代，我们主要应该集中注意什么。

现在我想谈谈我认为影响我们相互理解水平和共同的议事日程的内容的挑战。而且，它们直接涉及到我们一立法政权机关的代表们。

第一，这是当代世界法律的一般状况，今天它们的发展趋势，还有议会在保护法律方面的作用。首先要防止非法现象对它的侵入，包括纯粹司法程序的政治化。危机程序和其他全球进程对这些趋势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保障法律的纯洁性是作为立法者的我们的直接任务。

这也涉及到国际法准则。因为要想使它们出现，需要所有人的意愿。而要想破坏它们，只需要不多的人的努力。拥有独特的法律基础的欧洲理事会在这里可以说出自己权威意见。

再者，我们知道，现代的立法程序已不能闭门造车，参加它早已不再仅是“精英们”的事情。社会需要看到全部进程，并在整个新法律讨论过程中直接和立法者对话。

依据我们最近的经验，我要说：正是缺乏反馈联系导致政权决定的合法性和法庭判决的正义性可能受到怀疑。而某些因特网一资源开始灌输关于在完全没有法律义务情况下的个人绝对自由性质的思想。然而，伏尔泰就已警告过：真正的“自由在于它仅取决于法律”。

由此产生第三个迫切的课题。新的通讯对今天的政治议事日程的影响的确很大。在我们的面前，另外的民主机制在和议会平行地

壮大力量，暂时它还是虚拟世界，但已经有影响民意的工艺而且没有国界。那里组成了许多“兴趣集团”和“无捻”的辩论平台。

有人甚至认为因特网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典型的议会制的没落，因为现在社会网络似乎已是人民之声。我不想争论，它们的影响是大的。但我要重复一遍：议会在这种情况下的作用和责任只会增大。我想必将是这样，直到新的“电子”民主及其程序得到其法律形式，经过多年的考验，能保障不出现使我们的后代付出沉重代价的错误。

与此同时，我们在公民积极性增长中看到的不应该是威胁，而是新的，为扩大民主而尚未利用的新的可能性。由于青年较积极使用因特网，这种工艺使有可能不仅和他们直接联系，而且对新的要求作出反应。

我想提醒您们注意的第四个问题，这是早已成熟的，集中注意真正迫切的议事日程的必要性。例如，对于许多人，大量无国籍问题已不再是非民主的现象。这是什么，如果说不是取代现代民主的意义本身，不是倒退几十年、几百年？

我只是提到了现代最严重的一个例子。然而，对于我们的其他的共同挑战并没有消失。那是恐怖主义、民族冲突、麻醉品走私和跨国犯罪、人体器官“黑市”，还有，我要重复提到公开或暗中破坏历史纪念的新纳粹主义。

最后，和我上面谈过的问题密切相关的第五个问题是议会间协作方面明显缺乏新的质量。特别值得在这个讲坛上谈到它。已成为解决共同问题的独特场所的欧委会议会大会，可以成为其他一体化联盟的范例。我们不想隐瞒，在欧亚一体化问题上，很大程度上参考了欧洲经验。这个模式对我们接近。

我想强调指出：我们今天的联系所需要的不仅是新形式，而且是较为深入的战略内容。例如，三个相关任务：法治，人权和民主

与其他许多发展重点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当为了假迫切的或冲突的课题而把文化、教育、科学或卫生事业的发展抛在后头的时候，自然导致缩小欧委会议会大会活动范围和狭窄对于我们公民相当重要的方向。

我觉得这些问题毫无疑问需要经常共同的关注。我真诚感谢许多国家的同行们参加去年在莫斯科举行的议会论坛，在那里我们一起讨论了存在的议会制发展问题，民主面临的当代威胁和立法方面的新风。十一月中旬将举行第二次这种论坛，我将很高兴在莫斯科看到您们。

尊敬的女士们和先生们！

今年对俄罗斯是标志性的一年。十二月份是俄罗斯宪法和现代俄罗斯议会首次选举的20周年。对于我们，这完全是个历史里程碑，是转折点。

对于我们，未来的俄罗斯议会周年是更深入了解现代议会制问题的很好理由。何况这二十年中，俄罗斯大部分时间都在欧洲理事会。我们新法律的制订，加入欧洲理事会的几十个公约、我国公民向欧洲法庭诉讼的权利等等都和这个时期相联在一起。与此同时，大陆最大的国家加入欧洲理事会不仅是对于我们，俄罗斯公民的历史事件。我们和您们在欧委会议会大会范围内还将有不少内容充实的对话课题。

我支持欧洲理事会秘书长亚格兰先生及其战友们根本改革欧洲理事会的努力。我认为斯特拉斯堡组织所有方面的工作都应该平等，因为它们都为加强人权和多元民主服务。俄罗斯在欧洲事务中一如既往以“*The Council of Europe first*”为指导原则。

现在，尊敬的同行们，我转向谈您们大概最希望我谈的问题。我尽量简述外国伙伴，往往也是我们自己仍然关切的俄罗斯现代外政策。当然，在规定的时间内我不可能讲述所有方面。

在外国很出名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非商业组织，即所谓“外国代理人”的法律修正案。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它们活动融资的公开性，我们正是这样做了。但对这个和其他法律的履行，我们向来认真研究，并按结果作出修改，已经在进行关于“政治活动”概念的讨论。顺便提提，俄罗斯人权全权代表鲁金已就此法律向宪法法庭起诉。而我们的议会向来尊重宪法法庭的立场。至于“外国代理人”的概念，不知为何有些人认为这里有不良的阴影。现在我不想在词汇方面钻牛角尖，可是，外国也存在相应的词汇，您们对此十分清楚。

我想谈到的第二点是俄罗斯关于群众大会和其他群众活动的法律。是的，我们和许多国家此前那样，在更适当地追究群众大会上违反法律行动的责任。我想强调指出的是，这不是参加它们的责任，而是在群众大会和其他群众活动举行方面违反法律的责任。我们这里仍然相当经常举行群众大会、示威、纠察活动。我们支持这一切。因此，通过的法律不会影响公民积极性。但愿这只是消减了挑衅者和流氓们的气焰。

第三是关于所谓因特网黑名单的法律。我想首先指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在俄罗斯没有“黑名单”，因特网过去如此，现在仍如此，在自由境地。与此同时，众所周知，所有人都可以进入网络，包括儿童。如果说国家有能够防止对安全威胁的特工机关，父母却没有这种资源。怎样防止他们的儿女受到色情、麻醉品和自杀宣传的损害呢？我们认为这是国家的义务。许多国家在走类似的道路。

最后，在因特网的公开和可理解的行为标准显然比在那里登载关于因特网自由的声明，同时却采取全面的，对电子通讯，并通过它对自由思维本身的无法律依据的监督系统的做法更加符合欧洲价值。何况法律机制依靠其公开性可以完善，而没有任何社会

监督的工艺却绝不是这样。顺便提提，爱德华·斯诺登对此已说得不少，我认为俄罗斯不把斯诺登交给美国政权的决定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在那里可能会对他有非法的行动。而且也没有引渡斯诺登的法律根据和道德依据，因为这个人向世界揭发了全面违反全世界亿万人的人权的事实。

还有一个经常受到外国攻击的法律是关于在未成年人之中宣传非传统的性关系的责任的法律。许多评论员有意无意地忽略“在未成年人之中宣传”这句话，从而歪曲了这个法律的内容和通过这个法律的理由。

我不同意关于它会成为歧视少数人的工具的说法，而且不仅是因为没有对此的具体例证。在我国，任何性倾向者在工作、学习和社会政治生活中都没有受到任何限制。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建立自己的生活。可是，什么都不应该强加给未成年的孩子们，更不能进行宣传。

我最后想谈的是关于污辱宗教情感的刑事责任的法律。我要强调指出的是：俄罗斯人们还没有忘记苏联时期对信仰，对宗教的迫害，许多公民希望民主国家不只是承认，而且能实际保护其宗教情感和信仰。我有一个问题：难道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是全欧价值？或者说，在其他国家有宗教信仰者不多，他们对污辱其信仰，侮辱他们的寺庙、基督教和东正教十字架，剥夺他们的基本权利和价值观的做法不感到愤慨？

总之，我认为不能为了一些人的权利而忽视其他人的权利，即便前者过分积极，而后者沉默不语。这在法治国家和文明社会是不应该的。我想补充的是，我们高度评价我们的议会大会在推动国际文明对话及其宗教维度所做出的贡献。但愿今后能一如既往。

自然，我没有谈到所有可能的问题。我猜想到没能全部满足那些惯于听纯粹法律依据，演引著名决议和具体法律准则的那些人的

愿望。可是，我的国家杜马和联邦委员会的同行们已经不止一次，包括在欧委会议会大会讲坛上阐述了详细论据。这是第一点。

第二，今天我希望不仅您们，真诚尊敬的议会大会成员们听到，还希望欧洲各国那些对法律公式不像立法者那么接近和熟悉的公民们听到。也许，我的直截了当和朴素的语言更能得到他们理解，更有说服力。

是的，在“白”和“黑”之间还有许多深浅不同的色彩。然而，黑色永远是黑的，白的永远是白的。就像善和恶这两个永恒的道德标准。人们向来清楚什么是前者和后者。对于我们，人民选出的代表，道德价值不能成为抽想的，和法律没有联系的东西。这是我作为议长一再在议会讲坛上重复的观点。

今天我坦诚地希望愿意倾听者听到我们的主要想法。这是我真诚的话。

最后我想说的是，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对我们共同的家的以后事件，它的稳定发展肩负重大责任。我们，欧洲人民之间，相同的比差异的多。不成比例的多。

欧洲人文理想是我们共同的平台。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毫无疑问是盟友。我认为在所有涉及我们公民的福利和合作方面都应该是这样。偏重分歧和冲突将是共输的道路。我确信这不是我们的道路。

真诚感谢您们的关注并邀请您们来俄罗斯作客。

2013年十月1日。



谢尔盖·拉夫罗夫

俄罗斯外交部长



俄罗斯外交哲学

2月1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批准了新修订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总统宣誓就职当天签署的命令，指定了文件工作的方向。这项工作持续了数月。构想草本最终与积极参与国际活动的部门协调一致并经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各分部审阅。参与起草构想的有俄罗斯专家社团，包括外交部下设的学术委员会成员。我们向所有，包括在“国际生活”杂志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提出建议的人表示感谢。

讨论的主要结果——树立了对我国现代自主外交方针实质上为别无选择的理念。换句话说，我们甚至不能假设地考虑俄罗斯作为

Сергей ЛАВРОВ, Министр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РОССИИ

从属于国际舞台某个主要玩家而被“缠缚”的事。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独立性由其地理范围，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多世纪的历史传统、文化和我国人民的自觉性决定的。此方针同样是近20年来，国家在当时——以探索和错误为代价——的新历史条件下发展的结果，阐明了在颇大程度上符合现阶段俄罗斯利益的对外政策哲学。

新版不仅保存了2008年版的主要原则，但也保留了普京总统2000年批准的文件的基本原则。这首先是实用性、开放性、多面性，一贯性，但以非对抗性推动俄罗斯国家利益。这些原则证实了对其的需求及有效性。更甚的是，其普遍性在增长，也就是说，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用于武装现实政策。

俄罗斯国际活动的主要任务是为经济增长创建良好的外界条件，将其经济转上创新轨道，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样提出问题不仅是从对国家现状进行的分析引申出来的，同时，就俄罗斯历史性未来来说，也是自然而然的。鉴于此，我想摘引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登位后于1881年3月4日向驻国外宫廷的俄罗斯使节发出的通知中的话。其中说，“俄罗斯已取得自行发展；她没有什么可想往的，无须强求任何人。俄罗斯只需巩固自己的地位，保护自己免遭来自外界的危险，发展内部力量，道德与物资，积累资金储备和加强自己的福利。”证实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这种立场的，是他在1893年写下“俄罗斯力量的和平发展应成仅为国家主管的对象和服务于和平政策的优先动机”的话。

百年来的战争、革命、两极对峙，未允许我国全力以赴地落实建设性议程。在现阶段，当俄罗斯不与任何人为敌，立足稳定并深有把握地实施发展计划时，为此也就有了新机遇。

显而易见，保障渐进性地增强我国潜力的目标，只以国际稳定为条件才能达到。因此，对俄罗斯来说，保障共同的和平与安全，同时也是全球的玩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义务和实施自身利益的关键问题。鉴于此，我们听到对我们外交政策的保

守性，致力守持明知不会取胜的维护必定变化的现状立场的指责。这是明显歪曲俄罗斯的外交政策。

是的，我们确实不支持企图借助革命口号，包括以加速推进民主进程的口号，重新分划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就此存在不少原因。俄罗斯对暴力政变的破坏力太清楚。这种政变不会带来最初宣布的目标实施的结果，而且往往导致相关社会的发展倒退数十年。近15年来发生的外界武装干预，实质上，没有一起带来预期的结果，反之，在借助早就做出入侵决定的保护口号下，促使了附加问题的积累和加深了民间的痛苦。最后，因武力和为更迭制度采取的行动结果，造成不稳定的策源地增多，导致国际关系中动荡范围的危险扩散，加强了混乱元素。而这是——直接通向丧失控制全球进程的途径，将是对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国，包括提倡外界干预的人一个沉重打击。

与此同时，没有再比说俄罗斯企图“冻结”地位更离谱的说法。我们的立场出自世界正处于急转弯处，进入了几乎为不可预测的深刻变化时代。

这还与新风险、新机遇挂钩，但在某些方面允许我们从新的一页开始。在摘下过去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后，我们可能比其他——比那些按惯性，或有意识地继续顺延不再符合21世纪现实的意识形态渠道漂流的人有更清楚的理解。如无偏见地正视国际事件，就能看出并非是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推行陈旧的集团立场，采取与其它安宁和安全绿洲隔绝的无前景的做法，在有损于树立平等和不可分割的安全原则上，坚持军一政领域的保护主义。

对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再分配产生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要求做出最大限度地，不以愿望代替现实的诚实、正直理智立场出发的严肃评价。俄罗斯领导多次强调，历史性西方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上起关键作用的机遇减少并不令莫斯科感到满足，更谈不上幸灾乐祸。但这是一个应当顾及的客观现实。国际社会面临了大规模的战略问题，包括涉及经济体制中明显标识的，基于对无节制

地追求利润无相应的国家或社会监督的限制器，承认现代世界多种模式的发展，寻找增长源泉和走向新技术型模式的必要性。

中东和北非地区发生的动荡，令人深感不安。对这些动荡也应根据其所有的复杂性和多义性，进行避免单纯的黑一白之分的客观的评价。很清楚，这些进程将会持续多年，估计其将伴随该地区前一阶段形成的地缘政治痛苦的转型。

证实在现代条件下，文明的同一性因素的意义提高，组建类似文明集团的倾向加强的实例在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也有显而易见的选择：要么不同文化、不同文明间的摩擦加剧，从而演进为公开的碰撞，要么深化旨在推动文明间伙伴关系的互相尊重，平等对话。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退位前有关今天只有通过对话能争取和平的话——这并非或能兑现的方式之一，而是别无选择的必要性。这种立场与俄罗斯的立场相呼应。

对外政策构想中阐述了明确的，始终如一的系统性观点，其面向解决现代世界日趋复杂的问题。其中，在参与解答今天充斥了许多未知数方程式的全球政策问题上，未有丝毫孤立主义、自我淘汰的暗示。反之，我们为国际社会集体行动组织在寻找回应面临的共同挑战做出积极地努力。坚信，为不使全球竞争演变为武力对峙的最可靠方式——不懈地为有利于确保在地理和文明上具有代表性的世界领先国家的集体领导做努力。但为保障这项工作成功，必须接受共同的游戏规则，不仅在国内，但也在国际事务中以法律至上为支撑。但当还是这些以强势，甚至以武力在其它国家推行民主原则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避之这些规则，这种现象合符逻辑吗？

俄罗斯对外政策具有其建设性和创造性。俄罗斯的外交活动针对对全球进程起正面影响，形成稳定的，理想中的一——自行调整国际关系的多元中心体系。俄罗斯在其中有权为关键中心之一。今天，大多数严肃的专家和政治家同意，现阶段上世界发展的主要内涵正是连贯地巩固多极性。

我们愿意与所有在对任何人无权强求对真理的垄断有共识的相关伙伴进行严肃的全面对话。看来，持续的，真正的伙伴协作关系应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上。但这种共同立场不能是由他人指示的。西方以救世的顽固性传播自己的价值观标尺，令大家回忆起O. 斯宾格勒的话：“所有这一切为情节性和局部性的表现，在多数情况下，甚至是由西欧模式大城市居民瞬间的精神利益，而非共同历史的永恒价值观决定的。国际关系中真正共同道德的基石，应是平等对话的产物，以一贯存在于世界主要宗教的精神道德公分母为支撑。放弃数千年积累的传统价值观，脱离自己的文化和精神根源，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绝对化——是对内和对外政策丧失任何座向标的处方。

俄罗斯是建立灵活的，包括符合共同利益的相互交叉国家联合体的网络外交的绝对拥护者。由不同大陆国家成功组建的这种联合体之一是“金砖国家”。2013—2015年在“G20”、“G8”、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为轮值主席的俄罗斯，为提高这些多边形式联合体加强全球管理做出贡献的效力，在执行积极路线。这是俄罗斯对外政策多取向的实际表现之一。我不认为今天与我们在五湖四海的伙伴构建某种强硬的，被形式化的分层次联系的企图是对的。具有灵活性、机动性、“多音部”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显然是我们的优势，其予以我们关注在流动的，变幻无常的国际局势的可能。

我们与伙伴联合参与在独联体空间发展深入的全面合作，步步推进欧亚一体化项目——以地区一体化联合体板块建材构架新国际建筑做出的重大贡献。从企图抵制邻居一体化进程来维护“自己”的一体化的视角来看，显然属无稽之谈。何况，在当今世界存在大家公认的一体化上努力的原理，其中，首先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准则。一体化项目的靠拢，将其联合为环——能是保障全球稳定发展的途径。也正是出自这一点，俄罗斯提议将建立自大西洋到太平洋的统一经济和人文空间作为战略目标的取向，引导我国积极融入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

俄罗斯按传统继续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平衡因素的角色，我们的大多数伙伴都证实了对这种平衡的需求。这不仅以国家在国际上的分量，但也以我们基于法律和公正原则，对发生的事件持有自己的看法来解释。俄罗斯吸引力的增长，还由其丰富的文化、精神遗产与独特的猛势发展可能性，与俄罗斯世界千百万人发展卓有成效的合作相结合的“软力量”国家潜力的扩大相连。

莫斯科深信，国际上扮演主角的国家在对当代尖锐问题的看法上，相同之处还是多于分歧，特别是涉及最终目标，非策略的问题上。今天，大家都希望减少国际和国内冲突的区域，解决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手段，限制恐怖和激进组织实施活动的可能性。因此，这里还牵涉有应当最终以实际行动，不是空头支票来克服个人和集体的私利主义和认识对人类文明命运承担共同责任的问题。我们不断得到规模性天灾和技术灾难，包括前不久对车里雅宾斯克城郊来自宇宙“侵犯”的警告。如果此“侵犯”发生在居民稠密区，可能就出现不堪设想的更严重的后果。

我们对近来出现一些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首先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为以国际法为支撑，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各地区存在的冲突联合努力的立场靠拢的动向表示欢迎。这对只有通过谈判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别无选择的理解来说，也是公正的。

新版构想明确地、全面阐述了俄罗斯领导对现阶段上世界发展的对外政策的观点。其基于广泛的、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通过集体解决危机局势，通过加强全球政治中肯定的，联合性议程，致力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可能性。希望我们的伙伴做出相应的，建设性的反应。



亚历山大·雅科文科

俄罗斯驻英国特命全权大使

secretariat@rusemb.org.uk



今天世界和国际关系:新的和久已遗忘的旧的

在全球财经危机的第五个年头即将过去的今天，谁都不再怀疑世界进入了根本演变的时期。导致了1980—1990年冷战结束的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系统危机，现在增加了西方社会的，包括自由经济和广泛宣扬的民主的危机。这样，在欧洲大西洋的系统失调—而这两个模式集结了欧洲文明空间社会发展的集体经验并在两极范围内保障了它在全球经济、政治和财政主导地位—成了全世界危机的关键因素。实际上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奠定了开端的历史发展的漫长周期。像XX世纪以

Александр ЯКОВЕНКО, Чрезвычайный и Полномочный Посол России в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МИР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ОВОЕ И ХОРОШО ЗАБЫТОЕ СТАРОЕ

1914年为自己的开端那样，XXI世纪应该从出现危机的2008年开始。

可是,不能两次进入同一个洪流。如果XX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发展模式的试验局限于欧洲文明范围,现在欧洲太平洋社会首次碰到了世界其它地区及其文化与文明的实际的全球竞争。这是世界发展现阶段的重要区别。其性质是超越欧洲历史经验范围,更广泛的发展和价值系统模式竞争的多元化。Ф.别德索尔和Ф.福山在自己的文章“后华盛顿共识”(“外交”杂志2011年三—四月期)中写道:“智力”越来越平均地在世界散布,“危机使任何发展模式受到裁判”,而“西方民主显露出了其对市场驱动的全球化过分依赖的风险”。

与此同时,欧洲历史及其操作手法仍于已有的思维范畴存在,用于分析世界事态,预测未来。而且这里指的不仅是冷战时期狭窄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形态辩论,而是较为早期的社会转型概念的装置和方法,包括改革、教育、革命、工业革命,还有社会协议、进步和暴力,包括作为解决国际矛盾手段的暴力。

如果谈到欧洲历史遗产,很难说它的哪一部分多—正面还是反面的。反面的有两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冷战及其边缘的军事冲突、环保问题、经济和科技发展以及国际关系的军事化。正面的可以提到科技进步的民用、依靠保障“民主和资本主义相容”自由空间的扩大。还有社会倾向的经济和基于较大的中产阶级的广泛民主的稳定社会模式与稳定的社会不平等水平。

自然,核遏制也应属于正面的成果。尽管相当危险,它保障了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可预测性。第三次世界大战一直是现实模拟,再没有军事战略的进一步发展。冷战结束后实际上不再存在发生全球战争的原因。大概这应该归功于欧洲文明缓慢向内的转型爆炸,看来,今天的危机就是它的最后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在时间上它建立的前提正好是双方的“铁幕”时期。一方面是A.柯西金没有成功的改革，另一方面是越战的激烈导致放美国放弃“黄金标准”和布雷顿—武德系统激进改革。又一个经济发展“大周期”的原有工艺基础消失，无能，或者缺乏清醒分析局势的政治意志可能是共同的原因。在苏联这表现在停滞现象上，在西方是建立所谓“财政炼金术”（(Дж.斯季格利茨)的财政增长人为泉源，正是因为它在1980年代出现财政的不可调节。毫不奇怪，西方社会中产阶级腐蚀的开始（其标志之一是高校毕业生没有按专业工作的保障）正属于这种性质。大概这是停滞的形式和“用地氲遮掩”的现象，而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及与其相关的“历史终结”精神迷醉给了它第二呼吸。

可以说，使美国和欧洲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使日本在此前十年摆脱大萧条的军事化已失去自己的潜力，包括作为经济和科技进步的泉源。这是现代世界的特点之一。我不敢相信，所谓“民族安全国家”，或者由于“斯诺登案件”而称为“侦察国家”的建立的全面安全能导致解决摆脱今天危机的问题。大概也可以说，起初在苏联，后来在西方丧失了相当长时期违背“人活着不仅为了面包”的福音真理而存在的社会文化消费习惯。实际上，皮季林·索罗金还在1960年代就已预言欧洲文明，包括苏联的这种结局。当预言变为现实的时候，很难否认我们是绝对不可能返回过去状态的根本变革的见证者。

出现了俄罗斯、美国、西方，整个历史欧洲的地缘政治“压缩”。因此不能不同意外交国防委员会主席团荣誉主席C. A. 卡拉加诺夫关于我们处于“政治悬浮状态”时期的说法。所有世界进程都得到强有力的加速，思维和政治都难于跟上。应该说，这是任何残局的一般特性，它写在俄罗斯联邦对外政治理论中（B. B. 普京在2013年二月批准）对世界现阶段发展分析部分。

发展是对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首要问题，对欧洲一大西洋地区更为重要。因为今天条件下其经济增长泉源在于历史欧洲之外。随着危机后果的积累，它对此的理解也在增加。两个美国军人V. 波捷尔和M. 麦考贝在2011年提出的“民族战略”草案是大胆“向未来突破”的尝试。它登载在网络上，前美国国务院政治计划科主任的A. 斯洛捷尔为之写了前言。建议的理论旨在更新美国国际影响来源，指的是注重国内所有各方面发展的稳定性。从某些证据看来，美国军人的这一方针对冷战现实中加速了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及其过时的意识形态的重新考虑有可能成功。最近经常引用圣奥古斯丁的话，他向上帝祈求“贞洁，但不是现在”。看来，暂时可以把它看作是在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范畴内确立美国民族战略目的与任务的追求。也许，纽约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P. 哈斯的书“外交始于家内……”更有成功的可能。

被局势迫降到罪孽土地早得多的俄罗斯当然比较容易走这条路。接近2000年的时候出现了头一批理论文件，作出了关于外交的主要工作旨在创造国内发展的良好外围环境的结论，有了走进进一步发展国家的慎重道路的可能性。如果用一句话加以概括，这是俄罗斯外交的全部哲学。我们的伙伴在这个方向的运动使有可能谈到世界感受水平上的潜在幅合。

如果看得宽些，很明显，正在幅合和聚合道路上寻找欧洲一大西洋社会发展问题解决办法。这客观地为克服冷战时期的目光短浅和确立对恢复欧洲文明，包括欧洲、北美和前苏联空间的欧洲文明统一的相应验测标准创造条件。

XX世纪在欧洲文明范围内已有东西方之间的幅合点。例如，在1930年代由于大萧条的后果。又如，在战后时期西方国家经济的“社会化”成了对“苏联挑战”的直接回答。后来出现了缓和，与之相关的欧洲一大西洋经贸合作的深入。制订了反映在赫尔辛

基最后协议的欧洲政治的共同原则。总体创建了稳定的经济发展模式。正是这个模式固定在现代俄罗斯宪法中，并成俄罗斯全部社会经济政策的解释。

最近20年俄罗斯奉行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一贯政策。我们成了世贸组织成员并希望加入经合组织。作为“二十国”成员，我们和伙伴们寻找克服危机现象和恢复全球与各国经济稳定的途径。可以设想，世界上的许多问题只是在克服今天危机之后才清楚。这将是世界上危机后的一种调解。

大概需要吸取最近三十年来创造人为增长泉源的教训，这歪曲了经济全景，包括统计数字。过分肥胖的财政部门本身开始为自己工作，不再为实际经济服务，不再协助资本出口国家创造工作位置。这导致了资本收入和就业收入之间差距的增大，损害作为广泛代表性民主支柱的中产阶级。这里可能谈到更变经济发展模式，着重其质量，使之符合社会现状的要求，包括人口因素。可是，能够像裁军那样，在质量上加强经济，同时减少其数量吗？

这要求解决“金融时报”主要观察家马丁·沃尔夫称为“先天租赁倾向”的问题。应该说，这出自国债支付形式。对租赁谈得越来越多，包括和减少社会流动性和升降性、各代人之间的对立、丧失历史前途等相关的问题。法国Belle Epoque时代给了我们食利国范例。难道全部历史欧洲都重复这种忘记自己发展利益（既然可以“剪辑钞票”！）的经验？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走了这种道路。正因为这样，理解当时欧洲社会状况和欧洲政治恶习十分重要，以便继续考虑今天的问题。

俄罗斯和英国的一个有趣共同点是经常“使用”周年这个词。对于英国，看来是受到了长期的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传统影响。更有趣的是，在今天危机背景下出现了材料，其中按照它最初的旧约含义使用了它。进行了比较，负重债者虽然不是奴隶，但自

由受到很大的限制。至于欧元区的地中海国家，它们最难于承负的是国债，它对独立国家主权的限制远非微小。如果把1971年作为负债生活起点，我们已接近50周年。

至于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大周期基础的的新工艺，这里应该说存在绝对的不可预测性。正如英国专家У.杰努埃在自己的书“在创新经济中实行资本主义”中所写的那样，不可能预测何时出现能成为大规模商业化并创建生产与工作位置的工艺。例如，信息工艺和计算机化，包括手机通讯大大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对于经济，它根本改变了劳动性质，但它没能创造更多的工作位置，没能补偿与世界其它地区传统经济部门外包有关的损失。

这样，可以说是某种后退或发展的停滞。但生活在继续下去，出现如何给予补偿的问题。大概，应该是对人的投资，它终将解决人类发展前途问题。这意味着拥有优势的将是能够为人的价值自我实现，首先是能向卫生、教育、文化和生活保障结构，包括交通、动力和农业方面投资的国家。后者在经济上不断增大的作用可以说是指向回返——在财政的“浪荡”后返回人类生存的源头。

就此“斯特拉特福尔”的奠基人和主席П.Ф.弗里德曼的分析文章毫无疑问引人深思，其中研究了美国中产阶级沉浮的问题。例如，作者指出：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的出现是战后决定的结果，包括对退役军人提供优待。这里指的是保障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稳定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这里有值得考虑之处，在危机条件下，如果指望偶然，那是极度的轻率态度。最近三百年的经验应该足于使我们清醒分析问题，并为了全社会的利益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开始以传统智慧谈论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的根本变动。这是力量、影响和繁荣的“分散”，包括一系列国家，首先是金砖国家，还有印尼、土耳其、墨西哥等属于“新的活跃发展经济”国家的上升。由于危机，给了“二十国”新的气息和质量(政治领袖

会晤)。这是世界主要国家集团，没有它已不可能解决全球政治、经济和财政问题。在较狭小的论坛，例如，在“八大国”工作中也有此感觉。它保持作为协商和协调与会国立场的平台，可是解决具体问题需要更广泛的伙伴。

自然，这里说的不是取代已确定的联合国安理会的职能，从它的常设成员及其一致通过原则，就可以看出当时就已考虑到它作为多中心的世界秩序的监管机构。遗憾的是，在对世界事务的所有暗淡预言背景下，很少人注意这种正面的现实。联合国在“历史的终结”精神生存情绪条件下得到了其迫切性。这里指的首先是全球管理的基本法律基础。否定此现实的企图是在按冷战结果的某种“调解”借口之下进行的。可是我们知道不存在这种描绘的调解，西方伙伴违反了对俄罗斯的一系列的，包括北约不东进的口头许诺。至少这种调解不能和拿破仑失败后的开明态度相比。当时，按塔列朗的说法，法国摆脱了皇帝“私人”得到的领土，而其他领土纳入了平等的欧洲范畴。俄罗斯自己摆脱了冷战遗产，随之放弃了对东欧的支配。可是没有出现俄罗斯在平等基础上参加的欧洲大西洋“音乐会”。不管是结构不完善的欧安组，还是其他欧洲机构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说实话，欧洲安全条约的思想就是为了开始解决恢复地区政治统一的问题，从而依靠裁减军费减轻预算的负担。

实际上，我们是返回欧洲历史上已尝试过的，保障了欧洲从维也纳会议到克里米亚会议时期和平的“强国音乐会”。当欧洲这种政治秩序在东方问题口号下被破坏时，很少人想到过后果。成见和反对任何合理分析的政治上层本能占了上风。英国历史学家奥兰多·费杰斯认为，后来克里米亚的“不需要”的战争成了第一次的全面战争。这里首次出现了把英布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联在一起的概念。它启动了凌辱和吞并失败者的恶性循环，根本

改变了欧洲政治气氛，失去了文明理念。甚至俄罗斯建议举行的两次海牙会议也没能挽回这种趋势。维也纳会议两百年后欧洲和世界经受了痛苦的历史教训，此后才理解到除了在国际法、全球集体管理基础上寻找协调，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之外别无选择。

值得指出的是，核对峙“制动”的消除降低了动用武力的各种方案的门槛。例如，起初在伊拉克，后来在利比亚单方面的或基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在阿富汗的动用武力。叙利亚的例子使最近二十年的经验陷入死胡同。尽管联合国安理会持否定态度，但单方面的军事干涉却在进行，而且代价难于估量，包括纯粹军事支出、对自己财经的后果、威信的损失等等。实际证明，任何局势，包括冲突，都不可能再生产，就像在商店里一样，什么都不可能随意得到。总会有自己的特别情况，必要的资源，包括政治资本也会为此消耗。

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证明对现代国际问题任何单方面的，特别是军事解决的企图都适得其反。这些战争，像当年越南战争那样，表面上又是采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联盟集体努力的逻辑，包德国和日本在长期占领条件下的改建。这里没有考虑到其它地区的具体情况，完全没有像当年美国对南韩和台湾，苏联对蒙古那样承负长期综合性的义务。因此，现代世界政治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一方面是不能“廉价”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是不能没有保障军事干涉实际成就的政治意志和足够的资财。

今天的危机表明：本国存在尖锐问题时谈不上在外国进行什么“国家建设”。所谓“阿拉伯之春”范围内的演变过程给了新的例证。利比亚的“廉价”行动导致了“廉价”的结果，更不用说它损害了对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信任。

遗憾的是，旧习惯“难于消亡”。世界事务中的操纵惯性仍然明显。例如，这表现在文化水平上，实际上它成了国际关系主体行

动基础。从上面提到过的“斯特拉特福尔”对今年夏天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反映使时间倒退的寻求的政治文化的鲜明例子。其中描绘了由美国、欧洲、中国和俄罗斯构成的地缘政治“四角”。把欧洲定为现代世界独立的中心，大概还不错。难于相信的是另一方面，即关于欧洲和中国不可避免地没落的说法。结果又是剩下美国和俄罗斯，而且作为“小”冷战范围内全球政治对峙的两极。承认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未来也许值得欢迎。但是，这为什么应该成为对美国战略文化惯性的辩解呢？为什么要在本能水平上怀疑俄罗斯必然，几乎客观上会成为美国所有地缘政治方面失败的得利者呢？

因此，另一些美国的表现使人特别满意。例如，托马斯·格勒马在“国际先驱论坛报”（2913年八月22日）的文章中以充分的论据分析了把美国的一切灾难归咎于俄罗斯的趋势，其中指出这是转移对自己发展问题注意的办法。他的值得注意的论点是，在美国一些集团的潜在意识中，“俄罗斯问题”在于：只是对手在国内发展和国际舞台上都以胜利者为模范时，才能说美国在冷战中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很显然，俄罗斯不是能给美国这种满足的国家。可惜的是，那些不能饶恕我们在战胜纳粹德国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人也有这种情绪。

工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贸易和财政方面的差距也反映了这种政治文化元素。在国际关系的共同体系中往往采用早已忘却的“新殖民主义”词汇，它反映从物理的监督向较隐蔽的不平等的过渡，包括把发展中国家看作原料供应国，尽管其发展水平已比五十年之前高。这种殖民主义在信息工艺依赖方面也得到体现，它实际上使这些国家丧失独立发展的前途，包括建立有竞争能力的智力资源。

正是全球发展的多极化与地区化成为向不平等国际关系作斗争的主要物质条件。在冷战时期曾局限于“两极”的多中心主

义已在创造相应的竞争环境，保障按照本身发展利益选择国际伙伴的自由空间。现在，在争取影响斗争中，数字和媒体空间成为一个关键方面。不久前 D. 斯诺登的揭露表明对信息的臭名昭著的控制仍然是现代地缘政治的重要元素之一。至于实际上否定私生活权利的全面监督，甚至不能得到西方新一代人的接受，那是另一回事。德国就是鲜明的例证。Дж. 奥鲁埃尔的反乌托邦投影在历史欧洲空间没能经受住和那些由于年龄关系未有按照“旧”地缘政治准则思考的习惯者，包括在保护基本权利与自由和安全利益之间没有按“浮士德式取舍”的习惯者的冲突。

最近几年俄罗斯和英国之间，不仅在对当今国际局势基本评价方面，而且在挑选符合时代的外交方法方面都有所聚合。六月外相威廉·黑格在加利福尼亚的讲话就是证据。他谈到了网络世界、牢固的双方关系的重要性和为了达到共同目的而“部分重叠的联盟”。所有这些思想都和俄罗斯几年前，在2008年出版的对外政策理论中反映的结论吻合。我想强调指出的是，为此我们并不需要全球的财经危机，总统还在七月份就批准了此理论。

其中谈到了网络外交作为多中心国际系统的重要外交方法。可喜的是“多极”这个词没有引起我们英国伙伴的过敏反应。这里指的已不是过去相互对立的庞大的军事政治联盟。众所周知，正是它们的建立成了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的最重要因素。主要的是，在所有国家相互依赖条件下没有理由建立这样的联盟。因此，正在建立多种多样的利益联盟：它们公开，它们的形状可以改变，它们联合伙伴是为了保障具体的共同利益。例如，广泛的反恐怖主义联盟、反有组织犯罪和反贩毒联盟等等。它们的建立不是为了反对谁，而是为了什么。它们反映现代作为跨国现象的挑战与威胁。只有在国际广泛合作基础上能够高效对付它们。

自然，外交和外交机构应符合现代任务。俄罗斯和英国在这里有许多共同之处，特别是保守党戴维·卡梅伦政府执政之后。两年前V.黑格在外交办公室的讲话给了我深刻印象。当时他谈到了必须加强外交官的语言培训，增进他们对各国的知识，谈到了历史的重要性。他在加利福尼亚说：他就任后历史又成为外交办公室的工作核心。这的确重要，如果不知道历史教训，很难从不久前的事件中吸取经验。这可以说是返回经典的外交。记得国务卿X.克林顿曾这样说过。但愿这意味着克服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立场和系统。

冷战成见之一是把外交看作“无钱的赌博”。这在官方信息和整个信息方面传播很广，认为是意识形态对峙的一个“阵线”。看来，这里许多人在走熟悉道路。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在现代条件下，消失了过去的意识形态对抗，政治的关键点成为向国际社会“销售”意见，通过对信息空间的控制影响伙伴。D.斯诺登所见的一切说明信息安全和国际关系任何方面那样，应该成为严格的法律调节对象。任何志同道合者的联盟都不能取代明确的，法律上必须遵守的万能性质文件。没有它们就会破坏世界政治上的信任，妨碍国家之间在所有各方面的合作。正因为这样，需要对因特网的国际管理。这样，各国的边界在这里也保留其意义，作为保障私人信息权利不可侵犯的最终工具。

然而问题广泛得多。C. A.卡拉加诺夫所说的思想慌乱要求对所有发展方面的问题进行积极的国际辩论。信息监督直接和这种思想交换相对立。不为这些辩论的所有参加者创造平等条件就不可能解决现代世界的全球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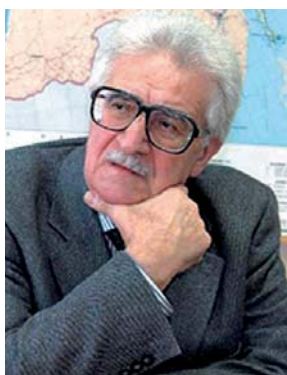
毕竟局势在改变，很明显，这和美国、欧洲与整个世界换代有关。我们看到对不同观点的巨大需求，对扼杀自由的因循守旧思想的否定。这大概是由于某段时期“历史终结”精神在西方和全

世界占了上风。换句话说，真理只有一个，它已清楚，只是应该一起迈向“光明的未来”。当然，这一切远非那么简单。2008年秋发生的全球财政危机“唤醒”了所有人面对此现实。

真理是又多棱面的，对它的寻找从未间断过。就此我想引用前坎特伯雷大主教 P. 威廉斯在研究 Ф. М. 陀思妥耶夫时作出的关于永不完善的结论——按基督的理解，自由的是生活的道路。这也否定了任何“历史终结”的方案，不管是共产主义还是自由资本主义都不能确定历史创作的极限。对真理的追求是人和社会生活素有的关键特性之一。我正是把“Russia Today”频道在美国，后来又又在英国受欢迎情况相联在一起。人们需要多元意见作为确定自己对某种问题的观点的必要条件。可喜的是，俄罗斯媒体是这种多元媒体的组成部分。

最后想谈谈对战后欧洲和世界人权和人文调解的评价，它在诸如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公约等文件中得到反映。它对所有人确定了可接受的共同标准。最近几十年来，把具体国家或地区范围内形成的，自己对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解释作为万能标准的企图，给国际关系气氛带来了新的复杂性。实际上，这为保障在整个国际社会范围内真正达成协议的集体协调努力造成障碍。明确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头几十年形成的一切，反映对社会传统价值的共同理解，包括法律—自由和利用它们的责任之间的平衡。对前者的绝对化和对后者的忽视都将损害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世界主要宗教道德共同点的文明之间综合关系。克服这种实际上为自我损害的不良趋势的矛盾，将是XXI世纪人类面临的挑战之一。





诺达里·西莫尼亚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simonia@imemo.ru

阿纳托利·托尔库诺夫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tork@mgimo.ru



全球化与世界领导的若干问题

国际关系中两极格局的突然瓦解，造成了至少两种重大后果。许多国际关系参与者长时间对这种后果不加以理解，或有意识地不去加以理解。首先，丧失了两个体系在意识形态对抗时期，或当时被称为“两个阵营”产生的“超级大国”存在的客观必要性的基础。其次，无掩饰地揭示了在两极“幕帘”后多极世界趋向的诞生。这一正在成长壮大的趋势（此趋势依然在建立和组建，

Нодари СИМОНИЯ, Академик РАН, Анатолий ТОРКУНОВ, Академик РАН
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И ПРОБЛЕМА МИРОВОГО ЛИДЕРСТВА

此进程将会持续数十年），最初遭到许多怀疑论者的否定。他们长期不承认这种趋向，推出他们反对“多极世界构想”的各种论据。正在组建中的多极世界——非是“构想”，而是客观现实。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及其盟友向其它国家（包括向俄罗斯）推出的“单极世界”思想很快就销声匿迹。就这时，在经济危机初始，复兴“两极性”成了口头和笔下的时髦课题，但现在，取代苏联的应当是经济肌肉和军事实力得到迅猛发展，只以某种经济增长指标略为下跌（自10%降为7.5—8%）来回应世界危机的中国。何况，现在出现一种有关在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提出挑战，并接二连三地在超赶他们的“新型资本主义”，超赶了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的中国，致力排挤美国跃居首位的言论。今天，包括在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工作的大部分专家团队，对中国实质上会做到这一点毫无疑问。鉴于此，还存在一种严肃的，无科学依据的神话。说实话，在约有200个不同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国家共存的非为全球化的现代世界（像俄罗斯一些专家断言的），确实不能根据GDP的统计数据，甚至是根据世界同一性原理进行人均计算的GDP数据进行表面和形式上的比较认为是有科学依据的分析。不顾及世界共存性的这种比较——类似根据不仅病情各异，甚至不同病情性质的病人来断定“医院内的平均体温”的做法。国际社会的每个成员国都追求本国的地缘经济和政治利益，形式上为联合国的成员国并非就变为该社会的同质元素。正是世界的共存性阻碍了多哈会谈，或拿在联合国一年一度的气候大会通过替代京都议定书新的有效文件上取得一致。

纯出于假设，世界共存性可分为几种类型（所谓假设，因为其中每一类存在显著地‘个体’差异）

1.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中大多数国家已经历了工业化阶段，并在产生后工业化结构（信息技术一型）；

2. 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追赶模式框架内致力工业现代化的同时，其以不同形式介入发达国家后工业化领域取得的成就；

3. 早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今天多数为拉美、非洲和部分亚洲国家；

4. 为生存进行斗争，发展薄弱的发展中国家；

5. 未能多少建立稳定国家的一些不成立的国家。

显然，我们所关心的，根据世界大多数专家的看法，是作为00世界经济和共同体整体谋求个体或集体领导的前两组国家。我们援引前不久刊登的一篇相关问题的有趣文章，其中企图为指出的局面予以依据。作者是国际事务委员会工作人员乔舒亚·库兰齐克¹。文章说，“在发达国家企图摆脱危机的近5年来，出现了挑战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经济的新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以国家拥有公司或在其中起主要作用，予以扶持和引导的国家资本主义来取代”。（库兰齐克有关近5年来的说法就很表面。国家资本主义，以其不同形式曾是“日本奇迹”的基础，继之仿效日本的是韩国、新加坡和其它一些东南亚国家。）他以中国为例。2002年只拥有3600亿美元的中国大型国企（121家）的国家资产，在2010年增至2.3万亿美元。库兰齐克告诫，不能低估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创新潜力。作者在对中国经济进行的进一步研究中，未再就中国创新成就援引事实和数字，只限于对尽管一些国家经济行业中有超额花费，中国政府的干预有效刺激了科研和先进行业生产发展做一般的见解。此后，作者予以了巴西经验更实质性和具体的关注。但其中又未注意到其与文章前述思想的矛盾。库兰齐克说，30年前巴西政府对飞机制造业施行补贴，其结果巴西的“Embraer”喷气式飞机在世界此机型地区的飞机市场居首位。作者还罗列了巴西许多其它成就。

是的，巴西确实是发展中国家取得工业化成就的杰出典范。但本还应当说明，这种发展的基础由1964—1985年期间的军事专政，接二连三地进行了替换的将军们，为国家工业化做出的贡献奠定的。约在同一时期，另一名韩国独裁——朴正熙创下多半仿效日本历史性经验的韩国“工业化奇迹”。就这样，国家资本主义（其多元形式和表现）不仅不作为一种世界多国“赶超发展”进程中的独特现象，但具有实施这种发展本身的规律性条件。

为数不多的一组国家首次踏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时，在周边众多国家发展水平较低的环境下，能从容不迫地发展。其一步一步地经历了自己多世纪的演进，从通过企业生产的简单合作到垄断阶段。但在“赶超发展”的国家不能接受西方在“西方化”口号下强加于其复循演进之轨的作法。再说，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家的作用被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拥护者过余贬低或干脆闭口不言。与此同时，从还属其本身前不久的历史经历中可以提醒两个实例。在北海最终发现油气田后，挪威政府立即成立了国家石油公司“Statoil”，该公司兼顾生产任务与调节进入挪威上流的外国公司的职能。稍晚，“Statoil”（在欧盟的压力下）改建为以国家控股的股份公司。另为更早时间的例子：二战后，意大利建立了“埃尼”国家石油公司，该公司长期争取被接纳为获名“七姐妹”的盎格鲁撒克逊石油财团成员。此要求被拒绝，但“埃尼”克服了所有障碍，并在今天世界石油业扮演起重要角色。

在返回探讨似乎向高度发达发展国家提出“挑战”的第二组国家时，我们不能与以下问题分开进行抽象的谈论：这种“挑战”的依据及其在GDP结构“检测”中的高度化程度。因为，谈国内生产总值的多少，不能说明其结构和质量。再说，大经济不意味

就“先进”或“结构高度化”。我们以领导世界经济的“头号候选人”，即中国为例来分析所有这些方面。世界大多数专家将中国列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并预言其将居首位。有关这种前景的言论有不少，其中唯一的区别在达到此目标的期限。一些人按平价购买力进行统计（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英语），另一些人——根据美元的汇率。但有些专家将“第二类”指标附加于基准指标（依我们的看法，这更重要，但也不适于作为结构高级化的依据，例如，形式上被统计为居民年人均收入6万美元的一些社会落后，但石油富裕的波斯湾国家，不可能参与谋求全球领导地位的竞争）。

就拿中国来说，世界银行认为，以评价购买力计算，2011年中国GDP仅为10万亿美元，美国为14.6万亿美元，其人均GDP只为美国中等收入收入的16%。鉴于此，为克服指出的差异需要数十年时间。援引这些数据的文章作者，在安慰为中国实力增长感到不安的美国人时，劝大家前往中国西部收入只为中等美国人收入四十分之一的贫穷的贵州省。他说，“您会感到自己好得多”²。确实如此，中国13亿人口人均GDP为3700美元，这不算多。这比印度（1030美元）多，但比巴西（8200美元）和俄罗斯（8700美元）要少，与日本（3.97万亿美元）、德国（4.09万亿美元）和美国（4.638万亿美元）更是少得不可相比³。因此，为解决此问题看来还需要很长时间。中国领导对自己提出（2012年中共11月份大会报告）2021年在中国GDP超过美国指标时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翻一番的任务。这比“经济学家”杂志2011年12月统计的指标更适度。杂志专家根据多方面的资料（从钢材和电力的消耗量至汽车和手机的销售）和出自中国今后十年经济以年均7.75%增速，美国为2.5%的经济增长速度考虑做的统计。其中也顾及到通货膨胀水平等的变化。专家根据

分析结果做出的结论是：如果按评价购买力（PPP）计算，2016年中国的DGP将超过美国的DGP，如果按市场的兑汇率来说，能在2018年被超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均收入将比美国少四分之三⁵。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在“黯然失色”（“Eclipse”）新书中显示了排榜世界经济前三位国家各居地位变化的极有意思和独特的景况。他在自己的分析中考虑了三个因素——在世界DGP中的份额，贸易和资本出口。“经济学人”杂志在本社2011年第九期杂志上就书籍刊登了详尽的书评。以下是一份简略的图表。

在世界经济中各占的比例（百分比）⁶

2010 年	美国 — 13.3	中国 — 12.3	日本 — 6.9
2030 年 (预测)	美国 — 10.1	中国 — 18.0	印度 — 6.3

据作者的看法，领导世界经济的看来将是中国，但估计意识到这种领导地位的假设性，萨勃拉曼尼亚先生称2030年中国将是“提前为超级大国”的国家。杂志补充说，有些人更赞同“早产的超级大国”术语，因为中国在“富裕”之前会先是“强大”⁷。

今天中国的GDP内涵以什么来“充实”，其实质性的结构性能如何？

以下的数据予以我们这个问题非模棱两可的答复。

1. 中国是一个不够城市化的国家，其城市人口为51%，农村为48.7%。此两范畴的居民人均收入差异显著：城市居民年均收入为

21.810万元人民币（3434美元），农村居民为6977元人民币（1000美元）。何况，根据校正的数据，在农村有1.28亿人的年收入只为2800元人民币（361美元）⁸。

2. 中小企业以生产三分之二的工业产品保障了半数的税收。在这些企业就业的有将近80%的人。（工业和信息部的资料）⁹。

3. 以中国在能源消费上超前增速作为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优势论据时，必须考虑到美国，特别是德国、日本的“落后”与这些国家在节能和有效利用能源方面取得的成就相连。

我们实际上似乎已接近于对主要标准下定义的界线。根据此标准，可以判断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进一步的结构发展，即基于信息技术构架直接社会劳动进程中可能获得的领导权的机遇。这种标准，实质上有两种：国家框架内创新体系的形成水平和这种体系对形成全球性直接社会劳动跨国结构起肯定影响的规模。

为解决雄心勃勃的赶超发展战略任务，中国领导早就（至少自80年代起）对信息技术的意义有所评估。经过长期辩论，看来选择了中国对世界市场（世贸组织）的开放，与国外跨国公司进行紧密科技合作，高新技术领域建立研究中心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大中国”，即香港和台湾以及在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特别是硅谷、美国）华侨银辉资源的模式。在北京的卫星城——廊坊，上海（浦东的张江高科技园区）和与香港交界的深圳经济特区设立了最大的高科技中心。这些中心包含了一系列大学、研究院和信息技术产品企业的综合科学与产业集群。如，北京中关村就包含了7.1万家信息技术公司，39个大学和200所研究院¹⁰。

在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和产品出口方面在初步阶段上取得的成功，香港起了主要作用，随后，在大陆向台商开放后，台湾的信息技术公司做出了主要贡献。

台湾IT公司由曾一度在硅谷就学和工作的台湾人在政府的支持下创办的，他们与外国的跨国公司保持联系并在返回祖国后创建仿效这些跨国公司产业的公司。他们自己业务中的创新只限于设计新款，适应地方市场，加速生产供应市场，但绝非是创制新产品。尽管如此，一些公司取得了地区和世界声誉（品牌）。台湾市场得到迅速开发，劳动力的价格也同样增长。一旦有了可能，该项商业涌入了大陆市场进行开发。他们在中国每个科技园和东南“沿岸”的许多大城市建立了自己的企业，并且不仅在地方市场上，同时在出口电脑、移动电话、芯片方面占居优势。据台湾信息产业研究院的统计，与“软件”相比，80%的台湾“硬件”，实际上就是电子设备是在中国生产，中国“硬件产品”60%的产值则由台商在大陆生产¹¹。就此现象出现了夺目的，但远离现实的“美国硅谷—台湾新竹—上海张江”三环构建的“金三角”术语。如果这是金三角，那绝非是等边的。盈利的主要部分归技术来源的第一环，较为显著部分的盈利和声誉归第二环，剩余盈利和征税优惠则归于提供廉价劳力的中国。

跨国公司在中国也不以台湾为中介：500家世界最大的跨国公司的480家，在中国都设有自己的分公司，包括100家信息技术公司中的90家¹²。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后者在这些企业从事的只是成品组装。带软件程序的组装件（微处理机芯片、电视屏、硬件）有日本、美国、韩国和台湾提供。因此，尽管中国2006年在电子产品的出口上继之美国居第二位（达3420亿美元），

但此项出口的75%，囊括了成品组件的最初进口。最终实际附加的成本在中国才850亿美元¹³。书中援引了有关中国生产的新“Apple iPod”产品“惊人的”例子。用于生产一件产品的成本价为150美元，中国在每件产品上只附加4美元，而美国和其它国家“iPod”的零售价格为299美元。由此可见，大部分盈利被“苹果”吞没¹⁴。

中国公司目前聚焦于边际产品。这也适用于由曾在美国的跨国公司工作的“回归者”创办的印度信息技术公司。这些公司都不愿意从事有风险的信息技术的研制项目，只接受西方跨国公司定约的研究项目¹⁵。由此可见，中国或印度作为第二或第三环边际环节参与受跨国公司控制的全球化进程。这种仿制模式和创新也具有相应性质：能将产品做得更好、更漂亮，使用上更方便，甚至生产增速和增产。原则上，这些产品还将是原本产品，但其生产无须承担用于研究和购置新设备的风险支出，以及为创建原则上一新的产品费力。就结构来说，中国完全处于追赶发展阶段（不用说存在共产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与迅猛发展的资本主义基础之间隐蔽矛盾）。

传统教育体系的改革问题，是致力建设创新型结构的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的主要障碍。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中国的“工业奇迹”，在颇大程度上以当代（借鉴西方的）和具有特殊社会环境下传统的孔子遗产的聚合为支撑。但不制约创作思想的飞跃——作为创新经济基础的社会中的传统社会关系体系进行广泛和深入的改革，就不可能建设全面的创新型国家。

日本与韩国为奠定基础花去数十年。原来，不可能就那样随随便便地借用和照搬别人经验的模式。以新思维的一代人来充

实未来创新业的必要性，对中国领导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为填充此“空白”，其拟定了庇护和吸引在国外就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的体制。根据中国的统计数据，在国外就学和工作的华裔科技专家约为60万人。仅在美国就有45万¹⁶。自然，并非所有人有心回国，但无论如何，这是积累必要的新型科技创新人员潜力的主要源泉。

这里需指出，中国领导对国家创新体系的虚弱表示忧虑，并对研究和开发活动进行大投资。其结果，中国对研发活动的投资有显著地增长，占世界对研发活动投资总额的12.9%，与此同时，美国占的份额约为34%¹⁷。但问题不仅在于统计数据上比上下，而在于国家创新体系的质量问题：正当美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在不断地有今天世界最优越的专家进行充实和滋养，中国不得不靠本国科学院的力量来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因此，我们可以同意И. А. 纳西波娃的看法，即“尽管中国经济取得显著成就，但其模式目前不能被视为是创新型”和“创新，首先是本国的，起有非系统性，限制性作用”¹⁸。

根据一切迹象判断，可以推测，中国领导就自己原先为外商投资实施够广的门户开放政策结果感到失望。西方投资者靠中国服务外包赚大钱，但不忙于分享自己的保密技术。看来，由于中国的劳动力变得越来越昂贵，外国公司将外包生产业务转移到像印度尼西亚、越南、巴基斯坦等国¹⁹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此外，因美国财政—经济状况，美国欠中国的巨额债务也加深了存在的烦恼。中国3.2万亿外汇储备的70%为美元资产，其中包括1.1万亿美元国库证券²⁰。

无论怎样，中国领导前不久改变了自己的策略。现在能经常听到外国公司代表埋怨中国不再像以往那样对他们表示欢迎，而

且，现在还对他们实施较强硬的政策。但主要变化在于中国商业涌向西方，其中主要是美国。如果2006年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只为两亿美元，那么，截止2010年年底，投资额增至50亿美元²¹。这种“泛滥”现象的目的不仅在于开拓广泛的美国市场，也在于在“现场”获取“技术诀窍”和高新技术。有意思的是，有些公司建立研究中心，雇佣当地的专家。危机又促使了这种投资。美国资产价格下跌，公司遭遇尖锐的清算问题。（这里请注意，并非是美国整体上存在清算问题，而是因像上述所说的，坐在“现钞山堆”的银行不愿在混乱的危机期间担风险。）

具有代表性的是，在与中国公司生产电视机、汽车等的同时，像“华为”和“中兴通讯”这样的中国电信通讯和其它电子设备的大生产商开始渗透美国。2005年向美国巨头“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分公司购置生产“联想电脑”，于2012年作为最大个体电脑生产方的“联想集团”公司，看来，在挖尽创新发展资源后决定将部分生产返回于美国境内（可能是为了“充电”）²²。但活动最活跃的则是从与供应自己廉价智能手机的运输公司达成交易在美国开业的“华为”和“中兴”。“华为”由前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员于1987年建立的，但其今天致力转化为跨国公司。该公司总部在美国拥有25亿美元的研发预算，在美国雇佣了数万名工程师。该总部与得克萨斯的另一个中心及在墨西哥、印度、越南、泰国、孟加拉国、智利、瑞典和其它13个地方（世界各地共有11万人为其工作）的研究中心保持联系。就在美国活动十周年之际，其于2011年4月在硅谷（加利福尼亚斯塔卡拉拉）²³开设了研究中心。

据“彭博商业周刊”的看法，尽管取得了所有这些成就，“华为”在美国的声誉说会好转，不如说会恶化。这是因涉嫌其与中

国军方有牵连，被控诉将知识产权化为己有（如美国“思科”）等事件相连。“华为”的活动令美国国会特别不安。2012年10月，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做出“华为”和“中兴通讯”的活动危害美国安全的结论²⁴。

根据上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今天和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首先面临的是“赶上发展”的历史性任务，其领导不可能有扮演世界领导角色的打算。确定2021年达到美国GDP的目标（就算是达到此目标），也不予以其作为世界领导的依据。提出的此项目标，令人联想赫鲁晓夫就苏联将于1980年建立“共产主义”的承诺。与此同时，美国也已丧失了“超级大国”地位，其以人为地和时时采取无效的武力手段来保持自己地位的企图，恶化了本国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就曾所说的，美国的这一危机局面存在矛盾的辩证关系，即：美国结构上的危机是美国资本主义进步形态的后果。因此，危机归危机，但具有客观意义的进步的创新型，在整个此阶段*得到迅速发展。（*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资料，美国使用的软件和IT服务达5144亿美元，软件产品的出口估价为134亿美元。就中国而言，这种指标则相应地为503亿美元和93亿美元——“商人报”2012年1月29日。）这种严重危机，首先是由社会—政治因素造成的后果，是因为美国政治特权无能力克服相互间的勾心斗角，将精力集中于拟定和实施庞大规模的计划，就类似美国前领导为拯救欧洲免遭“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危险实施马歇尔计划。今天又提出需要有类似的计划，但这个计划是为了拯救大多数美国人民，以通过和谐途径从传统的工业化过渡到“新经济”的计划。

为完成这种过渡，美国有两条路可走：以有意识地 and 由政治意志引导进行的和谐过渡，另一条，传统地为保守的和将为

数百万美国人带来痛苦和死亡之路。在后一种情况下，美国将证实马克思于19世纪中期的预测：“只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拥有了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将其服从于最先进民族的共同监督下之后，只有在这时，人类的进步不再会像令人厌恶的，一定得从被杀者的头颅喝仙酒玉液的异教偶像”²⁵。

1. Bloomberg Businessweek. 2012. 2—8 July. P. 4—5.
2. Bloomberg Businessweek. 2011. 17—23 October. P. 14—15.
3.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процессы. 2010. № 3. Декабрь. С. 24.
4. Коммерсантъ. 2012. 9 ноября.
5. The Economist. 2011. December 31st. P. 57.
6. The Economist. 2011. September 10th. P. 78.
7. Ibidem.
8. Коммерсантъ. 2012. 9 ноября и 25 декабря.
9. Bloomberg Businessweek. 2011. 15—28 August. P. 14.
10. Greater China's Quest for Innovation / Ed. by H.S.Rowen, M.G.Hancock and W.F.Miller. Stanford. CA, 2008. P. 159—160.
11. Op. cit. P. 147.
12.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2010. № 8. С. 35.
13. Greater China's Quest for Innovation... P. 9. 据中国财政部的消息，国家出口总量的55%有外资参与的公司出口，外国公司缴纳的税占征收的总税额的22%。外资参与的企业为解决专业人才的缺乏问题上，做出显著地贡献。这种企业中就业的人达4500万（金融信息 11.11.2010.）
14. Ibidem.
15. Greater China's Quest for Innovation... P. 198, 345, 359.
16.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10. №5. С. 86—100.
17.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12. №10. С. 80.
18. Там же. С. 82.

19. The Economist. 2011. 24 September. P. 8.
20. Wall Street Journal; Financial Times. 2011. 9 August.
21. Bloomberg Businessweek. 2012. 4—10 June. P. S1—S4.
22. Ведомости. 2012. 3, 14 и 26 октября.
23. Bloomberg Businessweek. 2011. 30 July — 5 August. P. 19—20; 2011. 19—25 September. P. 74—75.
24. Ведомости. 2012. 9 октября.
25.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инения. Т. 9. С. 2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集





亚历山大·兹梅耶夫斯基

俄罗斯总统反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斗争国际合作问题特使

zmeevskiy@mid.ru

谈反刑事挑战和威胁斗争的国际合作

2012年五月七日 В. В 普京总统在他“实行俄罗斯联邦外交方针措施”命令中确定促进反国际恐怖主义、麻醉品走私、有组织犯罪的斗争的国际集体努力积极化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基本任务之一。

这种新的挑战 and 威胁牢牢进入了国际议事日程，成为影响全球和地区安全保障的因素，甚至成为地缘政治影响的工具。

Александр ЗМЕЕВСКИЙ, Специальный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вопроса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борьбе с терроризмом и с транс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ой преступностью
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 БОРЬБЕ С КРИМИНАЛЬНЫМИ ВЫЗОВАМИ И УГРОЗАМИ

恐怖主义、犯罪、贩毒并非新现象。其新特点是规模，即危险程度（因国家和地区而异）和地理范围。在现代条件下它们已具有全球性。。

只有共同行动才能高效地对它们作斗争。何况黑社会拥有很大的财政和物质可能性并利用现代工艺（例如，通过因特网招募和训练自己的拥护者）。现代跨国犯罪活动的特点是活跃发展，迅速适应新现实。经济因素对它也有不小的影响，它追求得到最大利润，部分用于发展罪恶实业，部分用于链接合法的世界经济。最近出现不同犯罪集团联合的情况，例如，恐怖分子们“掩护”海盗和贩毒者，换取财政支持。有消息报道，有组织犯罪集团从非法猎获大象和犀牛角所得部分利润用于财政支持与“基地”有联系的恐怖集团“阿尔—沙巴布”和“上帝抵抗军”等恐怖结构。

我们谈到刑事挑战和威胁，指的主要是来自非国家主体的挑战。对于国家，跨国犯罪并非传统的敌人。它不对国际义务，不对周围人士和整个社会承担责任，在另外的道德价值和原则系统中行动。为了削弱它们这些“优势”，各国应该建立更现代的全球系统，以高效地对付国际犯罪集团的挑战。

今天在全球和其它水平上已建立了强大的反犯罪国家合作的条约基础。

实际上，最近几十年来这方面已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出现了系列的国际法条款。禁毒条约基础补充十多个反恐怖公约，还有反跨国有组织犯罪和贪污斗争的公约，签订了许多地区的和双边的条约。

拥有国际法基础使有可能在组织高效反犯罪斗争道路上克服许多障碍，但还不是所有障碍。因为许多原则和准则是在冷战时代制订的，它们的实行（例如，（“或者引渡，或者判罪”原则）还带有过去的烙印。外长 C. B. 拉夫罗夫在第67次联合国大会的

讲话中指出：“国际关系中显然缺乏信任。我们看到这是阻碍迈向确立平等与不可分割安全的万能基础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况显然与联合国宪章规定的集体安全理论和现代世界深刻相互关联相矛盾，因为对所有人的大部分挑战与威胁都是跨国性的”。

反犯罪协作的法律调节基础已奠定。但法律基础需要完善和发展并努力扩大其参加者。

建立反网络犯罪斗争国际法基础也是优先重点。欧委会范围内实行的2001年布达佩斯公约不但陈旧，而且已不适宜。一些条款忽视尊重国家主权的基本原则。国际社会制订专门全球公约的必要性已成熟。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注意到了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研究中做出的结论。这方面工作将在按照2010年十二月10日通过的联合国大会65/230项决议建立的国际专家组范围内继续进行。

反犯罪合作结构化进程已转到实际平面。条约机制得到信息结构的补充（相称重要的有一打黑反洗钱财务行动特别组织、“八大国”罗马/里昂集团、符合“二十国”要求的全球反恐论坛、巴黎—莫斯科反阿富汗鸦片进程）。

这个系统的坐标中心是联合国、它的机关和其它专门结构。最近几年联合国安理会在建立全球反恐怖主义机构方面起了最积极作用。通过它的必须执行的决议建立了较现代的全球协作机制。最近二、三年的趋势是联合国安理会在对国际和平与稳定的威胁背景下参加解决反贩毒、反犯罪问题。例如，2012年二月21日安理会特别会议讨论了西非洲和萨赫勒地区跨国有组织犯罪对它们的影响。

在联合国大会范围内已制订和实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怖战略。

这并不能贬低地区范围内，包括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独联体，欧安组织，欧洲理事会，北约 — 俄罗斯理事会（NRC）和美洲国家组织的努力。

例如，俄罗斯建议，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各国反恐怖主义斗争合作小组讨论如何对付洗钱和财政支持恐怖主义，保障集体系统交通安全，保障重大社会活动安全等问题。在东盟地区论坛框架内俄罗斯和澳大利亚与马来西亚一起承负反网络犯罪的主导作用。

一系列地区的决定具有突破性并且对全球立场的确立起决定性作用。例如，2005年欧洲委员会在俄罗斯联邦的积极努力下通过了防止恐怖主义公约。公开挑拨恐怖犯罪的行为的严重后果，促使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1624（2005）项决议，其中呼吁所有国家立法禁止这种挑拨，增加预防措施。

北非和近东、非洲角地区的矛盾进程使地区反对新挑战和威胁斗争具有特别意义。恐怖集团活动猖獗，它们越境灵活、武装迅速，首先是依靠利比亚武器和得到新的财政来源。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集团，包括西非洲和萨赫勒地区的集团关系越来越密切。“基地”和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塔利班运动继续积极活动，麻醉品非法生产和贩卖的结合增大跨国规模的恐怖威胁。由于2014年国际保障安全力量撤离阿富汗，这些威胁很可能“泛滥”到各邻邦。

极其危险的趋势是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它往往利用“社会网络”进行，匿名散布改革、民主口号，呼吁组织街道抗议活动。媒体播放的打着“基地”旗号和举着本·拉登画像的抗议人群画面也不能不令人担心。我们还可以看到“基地”和其它恐怖组织拥护者打入政权和社会组织的企图。在这种背景下，世界上掀起极端主义的破坏性浪潮，挑拨各地区危险的宗教紧张关系，为它们招募新的拥护者，首先是招募青年创造良好条件。恐怖主义新特点中还有自我极端现象和单一恐怖分子的出现，社会对他们更难防备。

另一个令人特别不安的趋势—恐怖主义卷入现代地区或其它武装冲突，例如，在马里。恐怖分子们打着分裂主义旗帜，直接威胁国家领土完整，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基础。

“基地”和与之联合的其它恐怖结构（例如“贾布哈特 安—努斯拉”）对叙利亚有强烈兴趣，它们的变该国为自己在近东的主要基地以便向其它国家散布恐怖主义的计划引起严重不安。在恐怖机构加强对叙利亚反对派影响的背景下，采取团结立场十分重要。遗憾的是，最近某些西方国家阻碍联合国安理会在叙利亚事件范围内通过谴责恐怖和威胁行动的决议，这完全违反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关于无条件谴责任何人以任何借口进行恐怖主义行动的决议所规定的义务。

双边的反犯罪斗争合作得到了发展，通常这是因为相互之间有较高的信任。俄罗斯和各国在这方面有二十多个常设工作组和其它协商机构，包括俄罗斯—美国总统委员会范围内的反恐怖、反贩毒斗争工作组。不久之前这里还增加了网络安全分组。

随着相互信任的积累，已转向建立更先进的相互协作方式。例如，举行共同的行动（在集体安全条约范围内反贩毒的“渠道”行动，吸引了广泛国家参加，包括非条约成员国）。俄罗斯和美国参加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范围内实行的加强吉尔吉斯反麻醉品机构的计划可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

在联合国范围内推进我国对反海盗问题的方针并不简单。在联合国安理会1851项决议范围内为协调各国和国际组织关于反海盗方面的行动建立了索马里海岸反海盗联络小组，俄罗斯是它的成员（总共有将近50个国家）。这里建立了讨论与此现象相关的不同问题的工作组。在索马里海岸反海盗联络小组范围内确定了提高国际反海盗联盟采取的措施的效率的途径。其中的重点有一推行俄罗斯旨在确保对此种危险罪行承负责任的建议，保障防止海盗袭击的努力

（包括在商船上部署武装保安），消除海盗财经动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建议特别适时，它和世界银行和国际刑警准备公布关于和索马里海边海盗有联系的非法财政来源的全面调查。

俄罗斯的新捐献角色 开辟了联合国范围内进行高效反犯罪合作的补充可能性。

在多莫杰多沃俄罗斯内务部全俄罗斯进修学院基地上为阿富汗和中亚国家（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协助下建立的俄罗斯—北约理事会的范围内）培养缉毒人才计划已充分表现了其效率。规定用俄罗斯给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捐献的资金并在办公室的主持下实现四个反贪计划：“建立和支持联合国反贪方面电子法律图书室”；“培养政府的反贪方面专家”；“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主持下编写关于在组织和举办社会活动方面防止贪污的教科书”；“为实业界培养防止贪污的统一领导”。

我们认为适宜吸引实业界纳入反犯罪努力，自然，这应在相互利益条件下。例如，创造工作位置，特别是在人才过剩地区，一这不仅是收入的潜在来源。而且可以削弱犯罪的社会经济基础，因为这种现象正是在贫困、失业，缺乏正常生活条件的地区根深蒂固。俄罗斯是在反恐怖斗争方面与实业界合作的倡始者。2006年在莫斯科“八大国”峰会上，按俄罗斯建议举行大型的会议，为国家和实业界反恐怖协作奠定了基础。

重要的是把这种经验扩展到其它方面，例如，反麻醉品和反贪的斗争。2012年五月按俄罗斯建议并在它的财政保障之下于奥地利由国际反贪学院主持为独联体和东欧国家举行了有关实业结构及其职业联盟的反贪培训问题的讨论会。2012年四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防止犯罪和刑事司法局通过了俄罗斯关于启动和实业界关于建立保障旅游安全，防止恐怖和犯罪分子袭击的国际合作基础工作的建议。

我们打算一如既往，积极利用经济因素作为重要方向和对护法机关在反对犯罪挑战斗争中的新的手段。例如，2012年二月按俄罗斯建议在维也纳第三次巴黎公约部长会议上通过了向阿富汗鸦片作斗争的决议。其中确定了首要任务：截阻制造麻醉品的前体供应和阿富汗麻醉品生产的财政来源。现在，后者按俄罗斯的建议建立了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截阻财政来源，制止各种罪恶商业，包括资助恐怖主义的商业极其重要。2013年四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防止犯罪和刑事司法局支持了俄罗斯和南非提出的在联合国犯罪和司法国际科研机构主持下深入研究制止非法珍贵金属交易和为犯罪目的使用其收入的问题的建议。得到主要的开采和加工公司—国际铂金协会成员支持的俄罗斯这种思想将按国家—私营伙伴方式实行。

2012年十一月在利马举行了大型会议，它确定了国际反毒品威胁战略替代发展。我想，其中纳入的思想完全可以更广泛地作为反任何犯罪的替代，作为有利于稳定发展与繁荣的选择。替代发展工作的核心仍是对人的关心，保障其权利，包括应有的，安全的生存，以诚实劳动得到应有报酬的权利。

各国和有关国际组织，诸如联合国反恐怖机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工发组织，粮农组织、国际财政机构、联合国地区经济委员会努力的协同作用具有特别的意义。需要鼓励国家—私营方式的替代发展合作。

缩小恐怖主义和与之密切联系的其它犯罪现象的社会基础不可能没有争取人们的智慧与良知的系统斗争，扭转对犯罪的放纵态度。公民社会、首先是非政府组织、文化与宗教活动家应为此做出重要贡献。重要的是摘除恐怖分子及其同伙的争取自由斗士的光环，证明贩毒和贪污的危害性，防止黑帮招募伙伴，尤其是在年轻人之中。

国家和公民组织—实业界、非政府组织、媒体是潜在的盟友。应该在这些问题上寻找共同语言，使我们的合作牢不可破，避免共同的努力受到挑拨离间。这里有吻合的目的—防止贪污现象、麻醉品、恐怖主义和其它犯罪团伙在社会上的扩散。

在今天条件下所有这与“软力量”方法相关的工作十必需要。这种方式在世界不同地区（包括犯罪危险较高地区），在解决防止极端化、制止恐怖主义思想散布和宣传并在这种基础上招募恐怖分子或其它犯罪集团行动方面得到理解。在这种情况下，非暴力的行动更便于寻找消除极端主义威胁的高效途径，在社会上推动包容原则，扩大和科学教育中心、媒体、非政府组织、宗教组织与实业界的合作。

诚然，上述问题的解决绝不能看作是贬低护法组成部分，包括交换信息、举行共同行动，侦查罪犯和保障有罪必罚、截止对他们的武器和其它形式的支持、协助培养职业人才和完善民族法律的工作。俄罗斯将一如既往，在反恐怖主义和其它刑事犯罪斗争中坚持综合性立场。

重要的是排除对抗因素，它有时甚至损害共同的工作。在这种条件下，旨在寻找可能的盟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灵活的伙伴关系的“网络外交”作用在不断提高。在反犯罪斗争的合作中最必要的仍是遵守国际法，在国际事务中确立法律高于一切的准则。

反对新的犯罪挑战的斗争作为战略优先重点之一固定在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上。保障国际安全的这个最重要方面的工作将继续下去。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根纳季·加季洛夫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叙利亚问题的调解公式：民族对话与境外玩家的有效作用相乘

联合国安理会于2013年9月27日一致通过第2118号决议，支持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当天在海牙做出将叙利亚化学武器置于国际监管之下和继之予以销毁的决定。这一事件标志了在纽约结束的第68届联合国大会“部长级会议周”的最终成果。此期待已久，但又远非所有人相信会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大家最终承认，能取得这种结果，多亏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为首的俄罗斯外交的努力，日复一日地与美国伙伴进行艰难的谈判，争取不仅能避开对

*Геннадий ГАТИЛОВ, Заместитель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ФОРМУЛА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В СИРИИ: МЕЖСИРИЙСКИЙ ДИАЛОГ, ПОМНОЖЕННЫЙ
НА ЭФФЕКТИВНУЮ РОЛЬ ВНЕШНИХ ИГРОКОВ*

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的威胁，但也为政治解决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的复杂危机开启通道。

从这时起，就围绕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出现重大转折。5月份，俄—美就叙利亚问题召开国际会议上取得的共识和通过的第2118号决议，示范了在具备政治意志和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妥善解决问题的意愿，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能化为实际行动。不以对叙利亚多层次冲突的起源进行全面分析为任务，在这篇文章中，我想以近来，允许我们期望政治解决该国问题还为时不晚的事件为重点。

当然，叙利亚政府在裁减化学武器问题上表现的开放性与合作，能精确地，无中断地履行自己承担的公约上的义务起了关键作用，为落实俄—美就调解叙利亚问题召开国际会议的倡议创建了条件。将裁减化武和政治进程之间的相互联系被载入联合国安理会2118号决议中，这一点很重要。以此，最终争取到联合国安理会对2012年6月30日的日内瓦公报的赞同——自取得共识的公报发表以来时隔一年多时间。

众所周知，俄罗斯先前曾多次提出以安理会决议确认这份文件，予以其相应的法律地位的建议，但遭到安理会西方国家的阻扰。他们坚持要以联合国宪章第7章的武力元素来“充实”这一决定，获得对大马士革施加压力的杠杆和动用武力可能性的一幕。与此同时，叙利亚反对派完全被排除对自己行动承担任何责任。这种态度与规定各方为政治进程事业做出贡献和不为任何人破坏的日内瓦公报的精神相矛盾。

开始形成一种奇怪的局面：形式上，大家都主张尽快停止在叙利亚的暴力，启动全面的，符合叙利亚人民合法意愿和允许他们独立地，通过民主途径决定自己未来的政治对话。大家同意，此进程的结果，应在国内创建叙利亚各社会阶层

居民，包括所有民族和不同信仰者都感到安全和舒适，并能作为发展叙利亚国家做出贡献的条件。联合了我们与我们伙伴的这些共同任务，反映于一系列重要的国际文件中，包括日内瓦公报，G8厄恩湖峰会的总结公报等文件中。但要对以上陈述的目标，在方式方法上取得共识，只在我们的同行对叙利亚和地区总体局势所持的态度进行反思后，才成为可能。

看来，自叙利亚动荡伊始，联合国安理会的西方成员就无意试图去理解事件发生的渊源，将其视为是“又一个阿拉伯之春”。这便于他们将叙利亚复杂的，不同一的事件归纳为“为自由和民主进行的斗争”。他们对反对派队伍中拥有现代武器，包括用从利比亚武库劫来的武器装备的外国武装分子雪崩似增长的现实漠不关心。对叙利亚事件的这种低估，导致联合国安理会的西方伙伴顽固地拒绝在安理会对极端反对派制造的血腥恐怖事件进行谴责。其解释这是激进分子为反对对人民犯下罪行的“独裁政权”制造的爆炸。这里就显示了“双重标准”的逻辑，并将恐怖分子划分为“好的”与“坏的”，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辩解。

随着叙利亚国内冲突的扩大，国际恐怖组织将该国宣布为“圣战之地”和为建立“世界哈利法”进行斗争。他们以实际行动来证实自己的意图：摧毁修道院和教堂，在被“解放的领土”上建立包括宣判死刑的“沙里亚特法院”的“秩序”。自然，文明国家对叙利亚的这种施暴分子予以支持感到“不方便”。特别是当受到西方支持的一些像叙利亚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或类似人权观察非官方组织也开始公开谈论恐怖分子犯有军事罪行和反人性罪行后。

越来越多证实圣战者的目标并非是为叙利亚取得民主胜利，而是控制领土和基础设施并树立自己秩序的事实，迫使

反对派的资助者推出新纲领。应当寻找可替代伊斯兰极端分子匪帮的温和派。这个角色就由受伊德里斯叛逃军官指挥的叙利亚自由军扮演（叙利亚自由军——全国联盟的战斗一翼）。西方将叙利亚自由军作为分享“西方理想”并与恐怖组织无牵连的世俗武装反对派予以支持。但又很快发现，叙利亚自由军并非是统一的“肌体”。自由军包括了数十个极端倾向的不同组织，其成员时时倒向得到自己庇护者更富裕的待遇和拥有更现代武器装备的圣战组织。

在这方面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具有权威的“杰恩斯”国防研究中心前不久的一份负有代表性报告。根据此份报告，反对叙利亚政府的是一支“四分五裂”为千支队伍的10万名武装分子组成的“军队”。其中有一万人是“世界圣战”思想的拥护者，30000—35000人为针对叙利亚问题的极端伊斯兰分子，另有30000人为“温和派”伊斯兰分子。因此，很清楚，参战分子中不存在任何世俗或民主一方的反对派。

除以上所说的，德国“明镜”周刊又刊登了一则有关近一年来，前往叙利亚冲突区与阿萨德政权作战的西方“圣战分子”人数显著增加的报道。援引德国联邦宪法保护厅报告的消息说，叙利亚成了欧洲极端分子猖獗的前哨。西方国家的伊斯兰好战分子前往叙利亚，从以往的个别现象发展为规模性。据掌握的信息，今天站在叛军一边参战的约有一千名欧洲“圣战者”，其中，来自英国的有90人，比利时——120人，丹麦——50人，科索沃——150人。至于德国，已有200人或已在叙利亚，或随时准备前往叙利亚。前不久，网上出现了150页的“荷兰圣战者宣言”，其中，实质上是极端分子在向“基地”及其目标“誓忠”。类似现象可以无止境地罗列下去。

在颇受欢迎的，注重中东问题的国际门户网站“Al—Monitor”还报道了一则土耳其观察员F.塔施凯金报道的消息。其中说，前不久，载有160名战士的船从也门驶抵土耳其的梅尔辛港，负责将他们送至叙利亚的中介就此似乎获得200万美元的赏金。

最后，为有一个完整的图像，还有一项刊登在今年10月29日的“费加罗”报上的记者调查。其中示范了向叛军提供由某些“注射”国在“黑市”，包括在欧洲市场购买的武器线路。借助军事运输机将武器先运抵与叙利亚毗邻国家后，再由车队送至叛军。圣战者的武库就以这种方式得到上吨的武器和弹药的充实。类似的信息，包括在与叙利亚毗邻国家建立培训雇佣军营地的消息，在网上和报刊上传播不少。

当然，在叙利亚处于战争状态下，要改变这种现象是很难。平民的死亡，破坏和暴力将会继续，从而也将恶化该国人道主义的灾难。只在所有扮演介入冲突的角色，首先是叙利亚进行对抗的各方，意识到除政治解决再无其它途径的情况下，才能终止这一切。看上去，这种思想简单又为大家易懂，再说，又是由生活本身提出的，何况在战区已建有一定的力量平衡。

叙利亚政府明确表态选择有利于和平解决的方案。至于反对派，问题就复杂了。一当涉及对话的课题并也有领导人同意进行对话时，其中，立即出现实质上是为破坏政治进程前景开始活动的势力。也就是那些打赌将“胜利到底”的人。在这方面能说明问题的，就是19个叙利亚主要的伊斯兰分子武装组织（“苏库尔沙姆”和“阿赫拉尔沙姆”等）做的声明，他们示范性地预告，如果全国联盟做出出席日内瓦国际会的决定，其退出全国联盟并有意为建立伊斯兰国家继续独

立地进行战斗。他们将所有同意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人视为叛徒并将面临“革命的伊斯兰法”引申出的后果。这种威胁可过余明显！

因此，叙利亚人面临了两种选择：要么向和平方向集体运动和利用就叙利亚的未来达成共识的机遇，要么，继续下注在战场上的军事方案。毫无疑问，第二种方案将导致更大规模的伤亡，恐怖主义的崛起，武器继续无监督地被扩散，人道灾难和人权状况领域的全面堕落。况且，这种现象将会蔓延至叙利亚境外并破坏整个地区的稳定。

所有这一切，引发对发生的事件进行再思的必要性，提出联合所有视以政治—外交解决冲突为别无选择的人做出努力的任务。将冲突方围绕谈判桌坐下进行谈判，是该聚焦于的首要工作。我们一贯呼吁伙伴放弃致力借叙利亚来解决自己的地缘政治任务 and 协调对叙利亚一方施加的“压力”，从而争取他们同意停火和开始对话的做法。我们认为，我们一些西方与阿拉伯同事只以“阿萨德必须下台”为目的，对继之会出现什么不加以明确理解进行支持的逻辑是有害与危险的。曾举过利比亚的例子，以“树立”民主为目的的外部干预，其结果是国家机制的瓦解，人权与安全领域的堕落和撒哈尔—撒哈拉地区恐怖主义威胁的增长。此外，也曾谈论过，如果采取针对进一步煽动叙利亚冲突的步骤，其将不会有在该国建立民主结果，反之，将加强与“基地”合伙的组织与好战激进主义的传播。

就我们在国际舞台上采取的步骤，一贯以国际法至上和联合国章程原则为指南，首先是不动用武力和不干涉主权国家内部事务。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联合中国三次阻止了在联合

国安理会通过西方国家开启武装干预叙利亚内部冲突道路的决议。出自同一的原则立场，我们制止了我们的某些伙伴，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对2012年6月30日的日内瓦公报进行解说的企图。我们坚持将对销毁化学武器进程，包括工作人员的安全的责任，不仅由叙利亚政府，但也由反对派来承担的条款载入安理会第2118号决议中。我们要求武装分子的国外赞助者阻碍激进分子可能进行的挑衅，而毗邻国家——关闭能被圣战者利用进行化武冒险行动的边境。提请大家注意，还在不久前，将类似的段落纳入安理会决议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我们的西方伙伴甚至对极端分子假定地使用化武的可能性都不予以承认。这就是说，思维上出现能相应接受叙利亚现实的转变。

所有这一切，最终允许尽管不在一个波段上，但能从冲突的进一步加剧带来的后果，首先，对极端激进主义的传播方面有一个共识，开始考虑叙利亚问题。厄恩湖G8峰会领导人通过的总结宣言中，主张联合叙利亚当局与反对派打击恐怖分子的努力，并非偶然。落实这项任务是“日内瓦—2”国际会议的优先方向之一。因此，就是从这一个角度来看会议的召开，也越来越具有其迫切性。

现在已无人反对会议的核心应是包容性的直接民族对话，这种对话将以日内瓦公报为基石，针对争取全面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对叙利亚来说，这是停止流血和开启自己国家未来体制谈判的独特机遇。外界玩家的任务——联合努力并协助他们达成这种能符合该国多信仰社会所有阶层利益的协议。

应当指出，为召开会议进行的筹备工作非常不易。存在对全国谈判做出预期结果的企图，为会议设置人为地时限，以某

种对一旦不履行可能的协议进行“严重后果的”威胁。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11个国家，以及叙利亚反对派传统的庇护者——沙特、卡塔尔、土耳其等国10月22日在伦敦举行的所谓“叙利亚之友”核心小组会议，就是近来的例子之一。

遗憾的是，会议结果通过的总结文件，对调解叙利亚危机途径所有原先的理解上，出现了明显的重审日内瓦公报的主要元素，对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做预期结果的企图。但其本应当是在完全另一种形式——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举行的政治对话框架内进行协调的课题。我们只能将此评估为企图破坏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企图，以便将“道岔”从反对派一方扳向当局。何况，这一切是在当我们的西方伙伴徒劳地企图确保反对派结构在全国联盟的“伞下”参与国际会议的条件下进行的。

那么，“日内瓦一2”会议应当是什么样的会议？民族对话道路上存在哪些困难？如何保障履行可能的协议？国际玩家，以及叙利亚一方为保障会议成功必须做些什么？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日内瓦一2”会议的进程和结果，将取决于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角带着什么样的行李参加会议。在提倡举行国际会议后，我们与美国一方谈妥：俄罗斯将说服叙利亚政府参加对话，美国一方将做使反对派组建能代表叙利亚所有阶层利益的代表团的工作。我们已走完了自己的部分路程，保障叙利亚政府将抵达日内瓦，并且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大马士革代表团组建后，立即做好参加谈判的准备。

美国人，至少在写这几行字时，还在完成自己的“家庭作业”，企图将继续得到其包括财政援助积极支持的，四分五裂的反对派凑集在全国联盟的“伞下”。与此同时，他们还

将全国联盟说成是不仅代表了叙利亚所有反对派，还代表了叙利亚人民。但近来的事件，说明此移民组织不能代表所有叙利亚人的意志，因为其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更不能称为被载入“叙利亚之友”伦敦文件中的“叙利亚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

全国联盟对武装分子的影响作用上也具有争辩性：根据上述提到的，在叙利亚作战的数十个武装小组，声明他们不再是这个联合体的组成部分，也不准备执行叙利亚自由军——全国联盟战斗一翼的命令，并非偶然。

在这种条件下，所有的外国玩家应当懂得：如果他们希望叙利亚的政治体制成为多元的，那就必须促使叙利亚反对派的联合。这种促使应不是出自于自己“希望有的”，而是基于组建由与在叙利亚活动的极端分子有明确划分的叙利亚社会各阶层代表介入的，具有代表性和全权性代表团的重要性。只在叙利亚各派反对派不是挑一择二地，而是全部出席会议，才有望达成能停止流血的内战和保障稳定去向运动的协议。将重要的政治力量留在“船舷”外——无论是叙利亚国内的，还是在国外的——意味将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对日内瓦会议结果可能达成的协议的接受和实施问题。

接下来，叙利亚民族对话的焦点应是日内瓦公报的全面履行。企图“创作性发展”其条款，以“凸出”一个课题来取代其它的作法是不可接受的。谈判应涉及综合调解叙利亚问题的所有方面。我们的一些伙伴企图将事情说成似乎是“日内瓦—2”会议——仅由政府与反对派共组的过渡管理机构成员举行的对话。建立这样一个机构，确实是叙利亚人根据谈判结果应自己决定的一揽子问题之一。但其必须与其它任务

综合讨论。因为，各方还得就许多其它重要问题上达成一致，否则组建临时内阁就丧失了其意义。其中有停火，为选举做准备、民族和解、提供国际人道援助，等等问题。

重要的是，所有国际玩家因为建立促使叙利亚民族对话的政治气氛进行工作。无论对话的难度有多大，不能允许紧张升温。日内瓦公报中明确指出，叙利亚各方应自己在无外界干预和威胁的情况下，就本国的未来问题达成一致。谈判上将出现必须要进行工作的问题，应在叙利亚问题特别代表卜拉希米和扮演主要角色一方的协助下，在无任何对他们采取强力措施威胁的情况下，专业化地及心平气和的状态下予以解决。外部力量，首先是波斯湾地区国家，应当在此问题上帮助叙利亚，而不是企图对其施加压力来对谈判进程加以影响或预期结果

联合国安理会将起的作用也非常重要。绝不能利用安理会作为对各方施加压力，包括为谈判设置人为的时限及之后采取制裁的工具。“叙利亚之友”核心小组在伦敦发表的声明，根据一系列国家的看法，就示范了应当只施加于官方大马士革的压力。而反对派，首先是得到外国支持的部分，将不受批评。这种立场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并与进行全面调解的任务相矛盾。

同时，联合国安理会能在各方达成协议后的下阶段上，在可能也包括促使解决安全的问题上起积极作用。

民族对话结果决定的履行，是负有重大责任的阶段。争取做到这一点，不比筹办谈判工作简单。很明显，能达成的协议将不会符合在叙利亚受到国外慷慨解囊的财政和军事援助，以及一心想扩大自己影响力范围的圣战者的心意。政治

上的突破与国外的一些赞助者的利益和目标相矛盾。他们可能会有破坏协议实施的企图。其中，采取包括类似8月21日在大马士革城郊东古特利用有毒化学物质的挑衅行径。当时，极端分子——此袭击的幕后操纵者——认为西方会利用此事件指控当局“犯下反人性罪行”而攻打叙利亚。

在此阶段上，将会被提出国际社会根除叙利亚恐怖主义进行谐和的联合行动的任务。继续将恐怖分子划为“自己的”和“别人的”做法，意味迎合“基地”的行为。历史曾示范了其可能的结局。

能对激进分子起显著影响的是他们国外的赞助者，首先是波斯湾的君主们和土耳其。西方已开始意识到激进组织影响力增长的危险性（报刊已公开讨论激进党派夺取提供给叙利亚自由军的武器，以及叙利亚自由军与政府军为与伊斯兰分子进行斗争出现局部联合的现象）。看来，安卡拉现在也意识到与圣战者眉来眼去的祸患后果：土耳其总统居尔在第68届联大会议上发言时指出，“那些构建自治结构的激进组织在威胁叙利亚本身及其邻近国家”。因此，打击恐怖分子能是团结所有实施G8（厄恩湖，2013年）公报有关为驱赶恐怖主义必须联合政府和反对派力量条款上存在政治分歧国家的任务。

这只是在国际会议语境下要解决的部分复杂问题。俄罗斯——作为为数不多的，亦可能是唯一的，与叙利亚双方构筑了建设性关系和未提出不现实的政治性要求的国家——愿意为会议顺利举行进行具体的和紧张的工作。在我们处于目睹为一时权宜之计违反国际法，对主权国家动用武力造成灾难性后果的一系列事例的条件下，“日内瓦—2”会议应成为

基于国际法，通过极仔细地寻找妥协方案，为解决当代复杂危机进行协和的集体工作的典范。只有这样，基于联合国章程赋有保障人民自由和独立的使命，将作为解决国家间争端手段的战争立为非法的世界秩序才不会被冲洗。必须为在国际关系中担保国际法至上，在叙利亚——冲突的持续解决，旨在使所有叙利亚人能在和平、安全与平等的环境下生活全力以赴。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阿尔曼·奥加涅祥

“国际生活”杂志主编

ogannessian@interaffairs.ru



叙利亚：谁为“保护责任”承担责任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M. 麦克福尔在推特上与A. 普什科夫进行的辩论中指出，“他（奥巴马总统）致力维护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法。”这一立场与美国国务卿克里前不久发表讲话时，有关类似违反人性的罪行不能不受到惩罚的声明相呼应。

这一主题，就其实质而言，是毋庸置疑的，再说，就此问题不存在任何争执。问题在于：以何种形式，何时和出自何种标准可以进行谴责和惩罚罪行？如国每次都以战斧和无人机来应对这种行为，那就太简单了吧。若这种罪行属反人性的，那

Армен ОГАНЕСЯН,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журнал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СИРИЯ: КТО НЕСЕТ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ПО ЗАЩИТЕ»

么，审判官也就应当是“人类”。若有人以人类的名义进行调查、证实，自己以人类的名义执行判决，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说，这是荒诞绝伦，而出自哲学思想本身来说，这种态度是危险的。甚至为盟友一方的众多抗议、合理的和坚决反对下，无论谁的“救世”行为不由国际法予以合法化，而由个人或集体的裁判。

众所周知，目的不能证明手段的正确性。以破坏包括美国签署的国际法来捍卫国际法利益，这不是无稽之谈吗？是的，我们时时能听到援引似乎联合国通过的“保护责任”的决议予以这种打击权的话。实际上，此1674号决议是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更甚的，决议以2005年联合国世界首脑峰会通过的文件为基石。通过的人道、外交与和平手段决议的同时，其也承认坚决的集体行动（“We are prepared to take collective action”）的可能性，请注意，只是可能性。但所有这些“负有保护居民免遭种族灭绝、军事罪行、种族清洗和违反人性罪行使使命”的坚决行动，就如决议中说的，只能在联合国框架内实施。

应当承认，正是美国为拟定此项决议做出不小的贡献。美国前国务卿M. 奥尔布莱特和美国总统苏丹问题特派代表R. 威廉森是制定“保护的责任”工作组的联席主席。他们在自己工作组的报告中强调，在此决议框架内的任何行动应当“按联合国宪章实施，这意味，做最终决定的机构是安理会”。此文件的意义在于：首先，在通过归结为军事手段的应对措施，不存在任何机械地照搬性。其次，排除了任何未经安理会赞同采取的单边或集体措施的可能性，并将这种措施视为非法。

英国上将丹内特勋爵公正地指出，在使用化学武器时，就是公然违反了道德原则，也“不等于是为对他国内部事务进行干预发

出的请帖”。与此同时，上将无疑倾向于是阿萨德政府军使用了化学武器的说法。

顺便说一句，美国远非一贯在类似情况下遵循惩罚的必然性原则。吉迪恩·拉赫曼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指出，自1945年视自己为全球安全担保人的美国，从未将军事干预视为是以防范冲突或制止违反人权为目的。更具体地说，甚至两伊战争期间使用化学武器时，美国也没对局势进行任何干预。

但还有一个既作为国家的，又作为国际上的共同法律准则——无罪推定。在我们的虚拟世界里，信赖录像和截获的电话内容，至少是没理由。换上波兰制服的刑事犯制造袭击德国电台的事件，在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上起了悲剧性作用。为排除阿萨德敌对方进行操纵和欺诈行为的可能性，就得深信反对派的道德标准。德国情报部门的最新信息，对是叙利亚政府军采取类似行为的可能提出质疑。再说，我们也看到对是官方大马士革采取这种行为可能的动因做的评估，存在混乱的解释。没有一个情报部门，甚至是一些积极支持军事行动国家的情报部门对此问题持有一致看法，所有说法极无逻辑又相矛盾。

那些说联合国调查组不会就主要问题——谁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予以回答的人，自然是说对了。“肇事者”也有可能是一支由周边或海外国家潜入的队伍。但，第一，用于做出可能的结论的所有论据将公布于众，即“在桌上摊牌”。最后，安理会能对调查组提交的结论进行分析，调查组的结论往后能作为针对叙利亚决议的基石。在调查组未做出结论之前，在未经对其工作结果进行讨论而采取打击行动，是对无数冒着生命危险寻求真理的人的侮辱，是对联合国和国际法的公开挑战。以此决定，华盛顿实际上证实了那些将其行动视为是无意捍卫

道德与法，而是致力实现自己深远的地缘政治计划的消极者的看法。

美国的外交政策也确实已站在不由奥巴马，而由在对其它世界关系上，今天无人有能力单一承担“白人的负担”的新现实政治（Realpolitik）划分的红线边缘。当然，如果我们不想将世界沉浸于混乱之中。吉卜林时代一去不再复返。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阿列克谢·波采罗布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阿拉伯和伊斯兰问题研究
中心首席科研人员、特命
全权大使

podtserob@yandex.ru

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主义末日来临？

中东陷于复杂的境况。有些国家的极端伊斯兰分子遭失败，在另一些国家则继续进行抵抗。

无疑，影响局势的是埃及的政局。穆罕默德·穆尔西2012年6月当选总统，52%的埃及选民投票支持他。与此同时，投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推举的候选人——穆尔西支持票的是文盲和半文盲，特权阶层则投反对票。新任总统走上了变埃及为“伊斯兰共和国”的道路。五名“穆兄会”代表被任为部长，另有8人在总

Алексей ПОДЦЕРОБ, ведущий научный сотрудник Центра арабских и ислам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 Чрезвычайный и Полномочный посол
КОНЕЦ ИСЛАМИЗМА В АРАБСКОМ МИРЕ?

统办公厅就职，25人为省长助理，12人就任市长。穆尔西企图控制立法、行政、司法权以及媒体。2012年11月，穆尔西签发了称总统的决定不能被移交给上级法院审理的一道命令。就在其执政的2012年，他制定了埃及阿拉伯共和国新宪法。新宪法限制了妇女的权利，并将在阿拉伯世界政治进程中具有影响力的爱资哈尔大学领导宣布为“伊斯兰教法问题上的最高和唯一的仲裁”和“唯一合法法律的来源”。

与此同时，2011—2012年，日生活费不到两美元的埃及人，从40%增长到50%。国内30岁以下的失业人数达82%。为国内总产值带来10%收入的旅游业进入了萧条期：2010年，游客为国家带来的收入为136亿美元，自今年年初以来，则为40亿美元。苏伊士运河的情况也不妙：与2012年上半年同比，今年上半年的收入减少4%，达24亿美元。如果在被推翻的穆巴拉克总统执政期间国家拥有36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那么，截止2013年6月份，只剩下150亿美元。去年的消费价格猛涨，达8.3%，今年预计上涨8.4%。穆巴拉克时期的年生产增长为6%，2012年崩溃至2%。2013年国内举行了1014次的罢工和558次抗议生活水平下降的示威。在西奈半岛上则有圣战武装分子进行袭击。

当然，穆尔西也企图应对复杂的经济状况。对埃及最富裕阶层的税收自20%提升至25%，对企业并购征收10%的税。另对包括酒类、啤酒、烟、饮料、手机打出的电话、安装了空调的交通工具、油、建材、肥料、杀虫剂25种商品和服务开始征税。对经由苏伊士运河的船舶提高了费用。埃及从卡塔尔、沙特、利比亚和土耳其获得90亿美元的贷款。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答应的48亿美元的贷款，因其对埃及政府提出放弃对经济进行占GDP20—25%的补贴要求而失败。

2013年夏，埃及阿拉伯共和国的民众联合了起来。商人和金融寡头（曾资助反对派）、军人、警察、强力部门、民主改革拥护

者，以及埃及原教旨主义党派——萨拉菲派和光明党都起来反对政府。反对派势力包含了“反叛运动”、全国拯救阵线，埃及大会党、责任党和宪法党。

事发最初从征集要穆尔西辞去埃及总统一职的请愿签名（共有2300—3000万人签名）开始。随后，抗议者聚集在开罗解放广场等地的广场，以及其它城市的广场，开始袭击“穆兄会”和执政的“自由和正义党”的办公楼，但遭到“穆兄会”警察的攻击。就在这时，军方决定进行干预，并向穆尔西发出48小时内与反对派讲和的最后通牒。

因遭埃及总统穆尔西的拒绝，2013年7月3日，在警察和情报部门，大穆夫提、科普特教会宗主教和宪法院领导的支持下，武装力量发动了政变。穆尔西和兄弟会的300名领导人，“自由和正义党”主席萨阿德·卡塔尼被逮捕。此外，占领了电视台并中断了播放伊斯兰主义节目的频道。尽管如此，被推翻的总统还是获准和欧盟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最高代表K. 艾什顿及非洲联盟代表团团长A. 科纳雷进行会晤。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同样向埃及当局提出与穆尔西会面的要求被拒绝。卡塔尔外长阿提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长阿卜杜拉·本·扎耶德，美国副国务卿贝恩斯，欧盟南地中海特派代表列昂则获准会见穆斯林兄弟会副领导人海拉特·沙特尔，贝恩斯还会见了卡塔尼。

目前，穆尔西以叛国、间谍行为，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合作和2012年初非法释放狱中人的罪名被起诉。穆兄会最高决策机构指导局主席穆罕默德·巴迪亚（因离境缺席），海拉特·沙特尔和拉沙德·巴尤米，穆尔西总统办公室主任阿卜杜勒·阿提以及总统安全顾问艾曼·胡杜德被起诉犯有煽动和使用暴力，非法拘禁和拷问反对者，非法藏匿武器和爆炸物的罪。与抗议的“穆兄会”混为一体的“依赫瓦尼”民兵，企图以释放被羁押的国

家元首来回应所有上述行为。这次攻击的结果34人死亡，200人被捕。“伊斯兰团结”组织则支持了穆斯林兄弟会并强调，如果不释放穆尔西的话，其将恢复采取恐怖行为。

根据埃及军方的决定，宪法法院院长阿德里·曼苏尔被任命为临时总统。军方承诺将修改宪法和将提交全民公投并于2014年1—2月份举行选举。开罗有3000万人对军方表示支持。“穆兄会”拥护者企图在开罗大学阿达维耶清真寺广场上组织伊斯兰分子的集会，在其它城市举行的“穆兄会”集会被军方驱散。随后，“穆兄会”企图组织的示威游行也遭到军方的镇压。与此同时，在西奈半岛的圣战运动开始激化。但这种局面也不利于“依赫瓦尼”，发动类似叙利亚的战争估计也不可能。

西方国家领导人对发生的事件做出的反应，总得来说是一致的：没有一个西方政权视埃及事件为军事政变。不过，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美国人对“军方暂停执行现行宪法的决定深感不安”的声明后，停止了向埃及提供F—16飞机和取消了美国—埃及代号为“明星”的联合演习。但奥巴马又强调，与埃及阿拉伯共和国的“长期伙伴关系是以相互利益和价值观为基石”。K. 艾什顿以及法国外长法比乌斯和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提出了释放穆尔西总统的要求（考虑到被推翻的总统继续坚持夺回政权，埃及当局看来是不会同意）。

阿拉伯国家做出的反应显示，他们都支持埃及发生的事件。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科威特向埃及提供了120亿美元的资金，利比亚决定向埃及每月提供100万桶石油，而约旦向开罗当局表示声援。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强调说，埃及发生的事件意味“被名为伊斯兰政治的崩溃”。

但另一方面，土耳其表示反对埃及阿拉伯共和国的新领导。安卡拉谴责了埃及军方的行动，暂停了2012年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

访问开罗时签署的27项文件的执行，中断了向埃及提供的10架无人机和停止了联合军演，取消了亚历山大与赛义德港之间的海上界线以及拒绝向埃及派遣大使（7月初任命的大使）。此外，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于2013年7月5日通过了冻结埃及作为成员国地位的决定，其原因是埃及的政权更迭没有宪法赋予的合法性。但是，7月底，8月初，以A.科纳雷为首的非洲联盟代表团走访埃及时，做出埃及未有军事政变现象的结论。

军方定于2014年初进行选举，这是经周密考虑的举止。举行选举，如其说是为了必须修改和通过宪法，然后进行新议会和总统选举，不如说是军方为防范“穆兄会”举行集会，但更主要的是——需要一定的为开启对未来的想望进行改革的时间。如果军方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与伊斯兰分子对抗的力量将会面临分裂，而“穆兄会”将返回自己的声望。

至于叙利亚，10万名叛乱分子占领了大部分伊德利卜、阿勒颇、拉塔基亚、戴尔泽尔省，以及位于土耳其与约旦边境地区的部分古特省，其余部分，总体上有政府力量控制。前不久政府军攻下由“法鲁克旅”防守的库塞拉和霍姆斯，是政府在战略上取得的一大成就，出现了其将战胜的信心。“真主党”立足政府一边，并据报道，伊拉克什叶派队伍也站在叙利亚政府一边，同时，伊朗顾问向叙利亚政府军提供协助。

叛军除了拥有枪支武器还拥有装甲车、大炮、反坦克火箭、迫击炮、高射装置、防弹衣和由英国和阿拉伯情报部门提供的多管火箭发射系统。

反对派被分为两类（相对而言）。国内反对派反对阿萨德总统政权，但不参与战斗行动。国外反对派则参与暴乱。在其一边参战的有叙利亚自由军。此外，还有萨拉菲派。“努斯拉阵线”是该派最大的一个组织。在武装分子一边参战的有沙特的（4000

人），约旦（500名武装分子），伊拉克、利比亚、巴勒斯坦、突尼斯、美国、加拿大、欧洲人以及俄罗斯人（200多人）。

原教旨主义者在反对政府的同时，也反对世俗制度的反对者。联合国叙利亚人权状况国际调查委员会主席皮涅罗的声明中说，少数反对派主张变埃及阿拉伯共和国为民主共和国，多数反对派则致力变国家为神权国家。

与库尔德部队发生的冲突中，叛军被击退是其遭受的一场大失败。作为回应，与“基地”相连的“努斯拉阵线”和“伊拉克与地中海东部地区伊斯兰国家”两组织，劫持了叙利亚阿兰和哈西利两村的村民，其中被杀害的有450人。

西方不断就叙利亚使用化武散布疑云。反对派将此归罪于政府，而叙利亚政权则将此事件归罪于叛军。阿萨德总统声明，“化武的使用，意味将有上千、上万人在数分钟内死亡。谁能隐瞒得过这种事？”在土耳其发现了属萨拉菲派组织“努斯拉阵线”的一辆载有沙林的汽车。尽管如此，根据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副助理罗德斯2013年7月13日的声明，美国得出使用化学战剂（CWAs）的是政府军的结论，并通过开始向叙利亚自由军（“穆兄会”在其中起主要作用）提供武器的决定。

奥巴马总统在做此决定之前，就是否对叙利亚进行火箭袭击问题与国会进行磋商。这种进行磋商的决定，也是因大部分美国人（48%）反对对叙利亚动用武力所决定的，支持其立场的则是少数居民（29%）。但与此同时，B. 罗德斯宣布，在叙利亚上空不会设立禁飞区。鉴于此的提示表明，2003年对伊拉克的侵犯是在美国宣布其对巴格达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掌握了确凿证据后开始的。众所周知，稍晚，全世界信服伊拉克未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尽管如此，法国声明是叙利亚政府使用了化学战剂，并宣布法国将向叙利亚自由军提供武器。

根据一切迹象来看，这是由计划对从伊拉克经由叙利亚通往地中海的石油管道进行“全面”控制的立场所决定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以及英国表示同意这种观点，尽管他们不参与美国进行的进攻。俄罗斯拥有叙利亚叛军使用化武的信息。此信息已由俄罗斯一方递交给联合国。

曾走访了叙利亚的俄罗斯记者，向联合国秘书处转交了说明是武装分子使用化学战剂的录像资料。联合国调查叙利亚使用化武报道的技术专家组成员卡拉·德尔·彭特强调，根据搜集的资料，使用化学战剂的是叛军。2013年9月底，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向美国国务卿克里转交了证实是叛军于今年8月21日在大马士革城郊使用化武的文件。

2013年9月9日，拉夫罗夫外长提议将叙利亚的化学战剂置于国际监控之下，如果这能避免对叙利亚进行打击的话。9月10日，叙利亚外长穆阿利姆声明，叙利亚将加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并有意销毁化学战剂。2013年10月10日，奥巴马总统提议国会成员暂停对叙利亚动用武力决议的表决（表决应于10月11日进行）。今年9月份，根据拉夫罗夫外长和国务卿克里进行的谈判结果，双方就销毁叙利亚化武问题达成一致。联合国安理会也于2013年9月27日通过了支持销毁叙利亚化学战剂的第2118号决议。与此同时，决议中提到对任何一方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下，允许采取联合国宪章第7章规定的措施，但采取这种措施必须得有安理会的新决议。因此，根据俄罗斯外交行动结果，成功地推迟了——或是预防了——美国对叙利亚进行的打击。

阿拉伯国家联盟停止了叙利亚成员国资格，采取了反叙利亚的制裁措施和允许阿联成员国向叛军提供军事援助。卡塔尔、沙特、利比亚、约旦、黎巴嫩的逊尼派武装分子以及土耳其都在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尽管土耳其宣布其将准备参与对叙利亚

的攻击，沙特声明支持美国打击叙利亚的欲望，但约旦、伊拉克、埃及、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则表示反对。欧盟同样采取了制裁措施，其也不恢复向叛军提供武器的禁运令，但推荐成员国在本阶段上不向武装分子提供武器。

英国也坚持要取消提供武器（她已在提供不带武器的装甲车和防弹衣）的禁运，法国决定取消提供武器的禁令，而德国则反对向叛军提供武器。

以色列宣布持中立立场，但近年内三次空袭了叙利亚。以色列报刊写道，遭空袭的对象是向“真主党”提供的武器——“地对地”导弹、“法特赫—110”和“飞毛腿”，化学武器、俄罗斯“琥珀”反舰导弹和SA—17防空防御导弹。如此的话，不能不对什叶派组织拥护者能在极短时间掌握复杂武器表示惊讶。

自戈兰高地叛乱以来出现的不稳定局势，迫使在戈兰高地的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UNDOF）撤出日本、克罗地亚和奥地利的军人。打击最严重的，是从1250人的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撤走380名奥地利军人的决定。但目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已谈妥将有其它国家队员来代替奥地利队员。

叙利亚的难民问题也成了一个严重问题。根据联合国的资料，难民人数已达200万。在约旦有55万叙利亚人，土耳其——30—45万人。黎巴嫩——30—50万，这是迭加于国内已有的50万叙利亚合法移民。近来，还有叙利亚的库尔德人移居伊拉克库尔德斯坦。

国际社会大部分国家视召开国际会议是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途径。但为召开会议存在一系列障碍。叙利亚政府同意召开会议，但阿萨德总统发表的讲话表示，叙利亚人只与那些未犯下血腥罪行的人打交道。国外的反对派则以阿萨德总统下台和政府军停止进攻为条件同意参会。往后，他们又同意参加会议，如果会上将讨论罢免叙利亚总统的话。

邀请伊朗和沙特参会也是一个问题——美国和西欧国家不同意俄罗斯提出德黑兰参会的建议。华盛顿认为，召开国际会议的目的，是要阿萨德总统放弃政权和组建联合政府。从莫斯科的角度来说，冲突双方应自己在无外界的干预下达成一致。与此同时，俄罗斯外交部警告说，尽管取得胜利，叙利亚政府还是不可能在期待时限内结束战争。2013年10月初，拉夫罗夫外长和国务卿克里声明，他们希望能在今年11月下旬召开国际会议。

贝鲁特的“阿尔—马纳尔”电视台2013年5月16日援引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消息报道，如果今天举行选举，将有75%的叙利亚选民投阿萨德总统的赞同票。从这一点来说——如果没有什么变化的话——反对派早晚将会被平息。但还将存在外界因素。首先，外界向叙利亚增派伊斯兰志愿队。其次，存在美国和欧洲国家以及中、近东国家向叛军提供武器的问题。除此，还可以补充说，不能排除欧盟国家设立禁飞区的可能性。根据这些情况很难预测事态将如何发展。再说，以利比亚为例，尽管大部分民众支持利比亚革命领导人卡扎菲，但西方和阿拉伯国家向叛军的公开援助导致政权的崩溃。

突尼斯的局势也不稳定。2013年2月份和7月份，因爱国—民主联合党主席舒克里·贝莱德·艾达和“人民运动党”主席穆哈迈德·布拉米被害，国内发起了示威游行。首都和其它城市上千人上街要求伊斯兰复兴运动党辞退。有6000名会员的突尼斯总工会（UGTT）也加入了抗议者队伍。突尼斯市的愤怒群众焚烧了伊斯兰复兴运动党的总部，另一些地方的居民砸了他们的办公室。伊斯兰分子一帮的匪徒开始组织反示威游行和与反对派发生冲突。同时，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边境地区越境的武装分子活动猖獗，致使卡塞林边防地区被封闭。

鉴于此，政府决定自我解散。总理兼伊斯兰复兴运动党秘书长哈马迪·杰巴里提出辞职，新政府由内政部长，伊斯兰复兴运动

党副秘书长阿里·拉哈耶德（示威者因其未能防止艾达被害呼吁他辞职）组建。新政府中，伊斯兰复兴运动党获28%的席位，在旧内阁其占40%的席位。在内阁就职的无党派部长达48%。外交部长、内政部长和司法部长为独立部长。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以此做出了让步。但示威还在继续。2013年8月7日，突尼斯制宪议会议长穆斯塔法·本·加法尔决定解散议会，此后，政府也辞职。

突尼斯面临了复杂的任务。2012年，为创建新工作位置划拨的预算资金只用去一半。目前国内有70万失业者，占有工作能力居民的18%，在2010年则为13%。一些地区的失业水平达50%。30%的工作人员因旅游业的萧条受到影响。外国旅游者为地方预算曾带来50%的收入。2011年，突尼斯的经济首次自1986年下跌1.8%。去年的预算赤字占GDP的7.2%，2010年则为2.6%。外汇储备为GDP的7.5%，使突尼斯只有支付三个月进口商品的能力。根据不同数据，通货膨胀在年底自5.5%升至10%。“标准普尔”对突尼斯的评级降至“BB-1”级。

其结局，复兴运动党政府的声誉一败涂地。92%的突尼斯人认为，经济问题应当是受关注的中心问题，78%的人认为，复兴运动党执政时期国内的经济状态未有好转。国民认为，不仅是商界，连政府也不对就业领域问题予以应有的重视。

但问题不仅限于一个经济问题。突尼斯人说，复兴运动党与突尼斯的私营行业建立了接触，并采取镇压示威的措施。“伊斯兰解放党”在国民制宪大会大楼前召集了2500名示威者，要求执行哈利法制度，树立伊斯兰教教法。2012年激进分子举行的集会，迫使当局在首都实行几天宵禁，去年9月4日萨拉菲派袭击了美国使馆。许多工会和反对派运动指控伊斯兰组织袭击了他们的总部和积极分子。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萨拉菲派会不会在突尼斯的生活中居统治地位，国家是否将成为培训国外武装分子的基地。

“标准普尔”评级公司认为，投资评级下调的第一个原因，是国家政局不稳定。一些人担心在伊玛目统治下将会丧失习以为常的生活条件，另些人为反对派获胜将遭受迫害担忧。但还存在另一个层面的恐惧。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并未形成为一体的党——一些成员主张对局势采取温和立场，另些成员则坚持运用伊斯兰法。

选举将显示哪一个派别享有更大的影响力。但选举又将何时举行？一些党派要求将选举期限推迟到今秋举行。

还有一点。武装分子和武库在国内泛滥，这些武器的匿藏处以惊人的定期性被发现。不能排除复兴运动党的亲武装分子派和萨拉菲一派代表，在对选举结果表示不满的情况下拿起武器。不过，复兴运动党接受反对派提出组建专家治国的政府的要求，带来了希望之光。

形式上，利比亚战争于2011年10月23日结束。在北约进行的空袭和持枪的暴乱者在外国部队的支持下，经过8个月的抵抗，卡扎菲被推翻。联合起来反对政权的有“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的萨拉菲派，昔兰尼加部落的上层，有将旅游、服务、石油领域、建筑、医疗让位于美国人而丧失了影响力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代表，以及青年和当代中等阶层。此外，引起不满的还有100万公务员中被解雇的40万人（他们得到三年内每月领取200美元的补偿）。

值得指出，存在的失业现象，尽管政权为此不承担责任。在民众国时期，例如，可以租用数百处建有住房的土地，沿岸地区创办了几十家鱼类加工厂。但没有利比亚人愿意从事农业或渔业。居民靠出售的石油收入生活，而在油田工作的则是外国专家。

卡扎菲制度是以25000人的死亡和50000人受伤，即，占国民总数1.1%的人数为代价被推翻的。利比亚至今继续发生积极分子、律师和官员被杀的现象。但当局没有被推动“阿拉伯大乱”的力量束缚。无论是昔兰尼加部落的上层，还是萨拉菲派，资产阶级，

自津坦或其它城市的武装分子，都未获权。政权被黎波里塔尼亚人和国外进入的移民夺走。

利比亚目前的局势是：2012年8月，全国过渡委员会将政权转交给了被选出的议会——国民会议。出售的石油收入落款于新当权者的账号上。一些地方驻有新政权的部队。这就是政府能取得的所有成绩。

利比亚的临时政府规定2012年12月20日为缴械武器的最后一日。但居民置之不理。几十个武装组织出现在的黎波里、班加西、希尔特等一些大城市，他们之间发生不休止的冲突。2013年2月28日，“革命家们”包围了外交部和内政部大楼，要求与卡扎菲制度有牵连的官员辞职。在库夫拉和塞卜哈地区发生阿拉伯人与图布人之间的战役。国家南部继续在对图阿雷格人进行迫害。因自己的野心不再受现今领导赏识的津坦部队，同时挑起与利比亚伊斯兰运动（原名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的一系列冲突。希尔特、贝尼瓦尔、塔维尔镇几乎被毁平，居民因支持卡扎菲而遭种族清洗。在的黎波里和其它城市夜间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在横行霸道，居民晚上都不敢出门。

利比亚曾支持卡扎菲总统的大部分黎波里塔尼亚和费赞居民继续与政权对抗。前政权的绿色旗在班尼瓦里镇上空飘扬了数天，占领了该镇的许多部落被驱赶。民众国的拥护者还在继续抵抗。可以以塞卜哈为例，2013年4月12日，政府军的一个旅遭袭击。2012年9月11日，4名美国人，包括K.斯基文斯大使在班加西被打死后，一系列国家的代表处撤出了班加西。2013年4月23日，驻的黎波里的法国使馆前，一辆汽车被引爆。两名法国警卫受伤。2013年10月初，俄罗斯使馆遭袭击后撤出了使馆工作人员。

前政权关押犯人的监狱释放一空（包括刑事犯）后，靠“革命卫队”的努力又挤满了7000名新异己分子。赛义夫·卡扎菲被扣

押在津坦，并不准备将其移交给的黎波里或国际刑事法庭。两名俄罗斯公民——A. И. 沙德罗夫和B. B. 多尔戈夫，19名乌克兰人和三名白俄罗斯人在利比亚因为前政权维修设备被起诉入狱。

基督徒遭萨拉菲派人的袭击。的黎波里有两座教堂被毁，一座在班加西，另一座在米苏拉。将近15人被指控犯有劝诱改信仰罪被捕。就此事件上街示威表示抗议的人中有50人被扣押。两名埃及基督徒被杀害。的黎波里的希腊教堂被关闭，天主教慈善使团被迫撤离。利比亚原有10万名基督徒，现在只剩下几千。俄罗斯正教会就宗教上紧张现象的升级表示不安发表声明，并就国际社会对利比亚的基督徒遭歧视事件冷漠待之表示不可理解。

迭加国家局势的还有严重的经济现状。为修复变为垃圾的城镇需要十年时间和100亿美元。但当局没有这笔钱。试问，利比亚出售石油所获的收入并曾在西方银行被“冻结”的2500亿美元跑哪去了？

利比亚的另一个特点，是新领导中未有杰出人物。倒向当局的利比亚革命委员会成员阿卜杜·吉鲁德、穆斯塔法·哈鲁比、惠勒迪·哈梅迪也被靠边。此外，新领导成员中没有一个人多少能与卡扎菲比上下的人。

就对外政策方面，利比亚伊斯兰运动领导人，“国家党”主席阿卜杜勒·哈基姆·贝勒哈吉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这违反了安理会反利比亚的制裁措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013年6月28日注意到此事后，要求安理会制裁利比亚委员会就有关信息进行工作。遗憾的是，迟迟未见针对相关提倡采取的措施。

所以，国家的未来还是不明确。利比亚在“索马里化”。未来事态的发展将取决于当局是否能解除部落的武装。但此可能性极小。因此，剩下的只有以下一步：的黎波里的领导应当执行符合大多数国民意愿的政策。但在有130个竞争部落的利比亚，未必能做到这一点。

* * *

就总体而言，阿拉伯世界的局势目前还不确定。但有一点却清楚，越来越多的人起来反对伊斯兰主义。但无论是温和伊斯兰，还是萨拉菲组织的拥护者，都得从事改善经济状况的工作。如果这项工作失败，民众可能将再次投向伊斯兰主义。不能忽视以下一点，现代伊斯兰主义自19世纪末就存在，想摆脱其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美国的作用问题是一个特殊问题。宣布的民主化绝不说明埃及、利比亚、突尼斯和叙利亚的亲西方政权被推翻。情不自禁地会产生美国的主要目的是在中东制造混乱，为中国、日本、印度和韩国以及欧洲大国在该地区的政策造成损失的印象。自然，这种政策会影响到俄罗斯。与此同时，这种外交手段对华盛顿本身也带来危险，因为其无能力控制萨拉菲主义。不能忘记，不加考虑地支持“基地”进行反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在阿富汗的苏军，最终导致美国自己遭受他们的恐怖打击。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阿列克谢·梅什科夫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AMeshkov@mid.ru

传言欧盟走向解体，恐怕为时过早

“国际生活”：阿列克谢·尤里耶维奇，欧洲媒体，尤其是法国媒体，贯穿了似乎克里姆林宫在与欧洲人作对的思想。您认为近来针对俄罗斯的这种侵犯性情绪出现的原因何在？

阿列克谢·梅什科夫：我不能同意那些说在欧洲出现对俄罗斯具有侵犯性情绪人的话。就是在法国，而我近来与法国的代表，包括与国会和上院——法国参议员的接触，给我留下法国不仅真诚希望俄罗斯与欧洲个别国家，但也与我们的战略伙伴——欧盟深

*Алексей МЕШКОВ, Заместитель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ЛУХИ О СКОРОМ РАСПАДЕ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ОЮЗА, КАК НАМ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СЯ,
ПРЕЖДВРЕМЕННЫ*

化和加强关系的印象。出自对包括加强人们之间的接触，在欧洲形成法制与人文统一空间这样的合作发展抱有的相互兴趣，我们构建针对欧洲方向的对外政策。这条路线有其反对者，但他们绝对是少数。

“国际生活”：近几年来，欧盟不仅在经济上，还在制度、道德方面经受深刻的危机。如欧盟十年前选择另一条道路，其是否能回避今天事态的发展？

A.梅什科夫：2002年启用的统一欧元和2004年的大规模东扩，被视为是20年来“纵横”进行的欧盟一体化发展进程的顶峰。欧盟面临的尖锐危机——制度性（2005—2009年）和金融—经济（2008—2009年）——揭示了影响到欧盟所有领域的发展及政治的制度上的失衡现象。

今天，西方在谈论欧盟28国的同质性遭破坏，欧盟成员国关心的利益显著差异化的征兆，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广度”和“深度”间平衡的破坏。政治学家承认，上述因素对经济一体化领域，包括其社会方面的状态起一定的影响作用。有关克服欧盟危机途径，包括对制度的新改革需求问题进行的辩论不休。欧洲已开始公开谈论欧洲怀疑主义，甚至“欧洲离心倾向”增长的问题。

今天很难判断欧洲十年前是否能选择另一条途径。众所周知，历史没有虚拟式。有一点很清楚——欧盟进入了其新的，非常复杂的发展阶段。此发展阶段与以往阶段有显著区别。欧洲制度和成员国为适应欧洲当代一体化现实，无疑需要一定的时间。

“国际生活”：是否欧洲的怀疑论者将成先知，而离心倾向成为现实？

A.梅什科夫：是的，欧洲今天经历着并非最佳的时光。

按欧洲国家平均指标来看：今年的GDP预计不超过1.8%（与2008年危机前的4.3%相比），通货膨胀——1.6%，失业人口将近2000万，其中，个别国家25岁以下青年的失业水平达55%。16%的欧盟公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欧盟空间的危机及其后果会持续多长时间，今天没人能知道。

在这种条件下，欧盟共同体为寻找摆脱这种局面的途径做出积极努力。欧盟实施了更严格的预算—财政纪律，为刺激经济增长寻找资金和创办新的工作位置，研究改革欧盟制度的可能性。顾及到这种积极性和对保存欧盟生命力的共同想往，离心力量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形成体中，看来，还是能被中立化。

我想以以下结论来回答此问题——传言有关欧盟即将解体，依我们看，言之过早。

“国际生活”：您是否认为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欧盟的迅猛扩展，包括有经济不够发达的东欧国家的加入？

A.梅什科夫：主要原因不在于此，这是毫无疑问。欧盟的迅猛扩展，当然起到一定的，显著的作用。可以说，不顾后果地向东扩的因素，是造成欧盟财政—经济危机的一系列原因总合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国家近来有关核心和周边，南与北，欧元区和其它的区，“一个欧洲，两个速度”展开的越来越激烈的辩论，就是这种结论的明证。

布鲁塞尔以扩散和平、民主和经济福利的银辉范畴解说的欧盟扩展，在颇大程度上未考虑入盟国家是否根据布鲁塞尔提出的入盟条件做有实际准备。2004年和2007年加入欧盟的新成员国，往往是被提前接纳，认为这些国家往后会做许多校正并提升到更高水平。但就像我们所看到的，远非所有成员国能做到这一点。

对欧盟前阶段欧洲扩展经验的再思，证实“老欧洲”承认欧盟在地缘政治野心及其一体化能力的战略推算上犯有制度性错误。作为后果出现的经济困难，迫使欧盟现在首先关心和挽救的是新成员国（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等国），至于欧盟人就进行进一步扩展的积极性，似乎有所减退。

欧盟2004年和2007年做出扩展欧盟的决定多半是出自政治原因，并非秘密。估计，他们认为，欧盟新成员国在欧盟基金的支持下，能够较快地解决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克服与其它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但生活表明，这还要许多年。当然，这种不均匀性使欧盟经济架构的倾斜度也就更大，为摆脱持续的财政—经济危机增添了麻烦。

就我们自己一方来说，我们已多次强调希望见到一个稳定、强盛和整体的欧盟。欧盟是我们关键的经贸伙伴，我们的大部分黄金储备以欧元为主。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的欧洲伙伴能尽快摆脱危机僵局。

“国际生活”：能否说欧盟国家政治制度因危机丧失了对其的信任？

A.梅什科夫：我看，这种令人谨慎趋向的征兆已被目睹。遗憾的是，对欧盟国家整体的政治制度和公民对欧洲政治家的信任度在下降。进行的民意调查，居民参加选举的积极性下降（居民的投票率在不断下降），出现显示公民不满情绪的一种“独特”的新形式，都证实了这一点。希腊的例子是有目共睹的：大家还该记得，那里组建新政府遇到的多大困难。

再说，欧盟人自己也在严肃谈论带有经济紊乱的政治领域的威胁问题。所以说，这确实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欧盟未来的政治，在颇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克服财政—经济危机的程度如何。

一旦经济中的不良倾向进一步深化，这您也能理解，其潜伏着社会震荡的后患。再说，也不能完全排除欧盟国家将会有“非制度性”的政治家，包括极右翼执政的可能性。

许多欧盟成员国的排外主义、蛊惑人心和种族主义现象在增多。在此背景下，明年5月份进行欧洲议会选举期间，相关党派估计也会积极参加争夺欧洲议员席位的现象，也是符合规律的。不能排除他们将得到遭到经济危机打击的选民部分的支持，这些选民在大规模的失业条件下，不会去分辨欧盟移民政策中的奥秘。这种党派的大部分，都是明显的“欧洲怀疑论者”，可以预料，欧盟进一步的经济和政治的一体化运动将不会是简单的。

“国际生活”：几乎所有欧盟国家存在尖锐的移民问题，特别是对自信仰伊斯兰教国家的移民。许多人，包括高层人士，承认多元文化主义思想在欧洲的失败。欧盟在此方向的政策又如何呢？

A.梅什科夫：这个问题同时引申出现代西欧的许多复杂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属整个大陆的问题。如果使用规律一词的话，估计此规律显示于民众寻找的是他们有舒适感的，工资较高的地方或国家生活。但也存在另一个有意思的一面。一些非欧洲国家曾执行国有目的性的政策，也就是说，通过受控制的移民出国掌握欧洲经验后，回国将这些经验实施于本国。

您提的问题具体涉及到有关我们今天移民的适应性与融合的话题。这里得指出，在从南方移入欧盟国家的外来移民的同时，一系列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出现涌向西方的移民剧增的现象。尽管这种移民符合欧盟现行劳工自由迁移政策，但不是所有西欧人欢迎这种做法。

欧洲委员会专家以欧盟国家人口状态为背景对外来移民进行的分析指出，在今后50年内以人口自然增长率为条件，欧盟有劳动

能力的人口约减少一亿人。鉴于此，可以做出以下的结论，外来劳工的涌入是经济上的必要性。

您指出的现代欧洲社会的问题，是以合法身份（正是合法身份予以了他们享有例如与法国人同等待遇的社会补贴金）进入西欧国家的移民，表示愿意融入接纳他们的社会的人在减少，他们更愿意生活在自己同胞的社团中（或同一信仰的群体中），而且还往往按自己的传统和风俗生活。一些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特别是欧洲委员会，都在寻找解决融合与同化移民的任务。

如果作为理论和实践来理解多元文化主义，即作为拟议中的不同信仰的群体在一定领土（国家、州等）上共同居住和相互协作（对话）来谈其遭到失败，那来，法国和德国领导人意味的是按民族象征的社会分裂的深化，其碎裂性，而最终又被当地居民作为“外地人”不被接受。几十年来，欧洲社会思想以鼓励多样化和最大限度地为各种群体和少数民族争取权利为重点，有时甚至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合法权益。入乡随俗，还是为大家都承认的。

我想，另一名形式化的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者——英国首相卡梅伦，就此问题予以了极好的回答（2011年春在欧洲委员会会议会上的演讲）。他在予以了各种民族群体做出的贡献应有的评价后，主张政府将他们视作是整体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在对服务于整个国家福利更广泛的共同性上突出他们的差异性为重点。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共同的立场，问题就在于融入被接纳国家社会的机制，其落实的具体途径。

“国际生活”：近来，俄罗斯—欧盟之间出现一段“爱憎史”。国家元首一级在“相爱”，欧盟议会议员及媒体一级则“泄恨”。在这种条件下如何构建有效合作呢？

A.梅什科夫：“爱”与“恨”都非外交词汇。但其中贯穿了一种规律——责任性越低，激情上的散漫现象越高。

俄罗斯和欧盟在健康务实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关系。这一点，双方领导人在举行的高级会晤和高层会晤上都予以强调。这非常重要，因为俄罗斯—欧盟关系的潜力还远非被挖尽。

至于欧洲议会，我们对其墙内发生的一切予以必要的关注。遗憾的是，不得不说欧洲议员为加强俄罗斯—欧盟关系的积极议程做出的现实贡献是微薄的。我想指出，我们并不反对对我们进行的伙伴性批评，令人不快的是那种导师的语气和强加与他人的那种“高调”干预他国事务的欲望，但同时，欧盟本身内部积累了不少严重的问题。可能是其中存在某种相互关系，但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准备与我们的欧盟伙伴在所有平台上和各个方向上进行工作。只有通过对话才能找到共同立场的焦点。

“国际生活”：我们与欧洲委员会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关系也不见得简单。经常能听到他们对我们提出质疑，甚至带侮辱性的言论。是否还有存在参加这些组织的积极意义？

A.梅什科夫：遗憾的是，引发广大社会舆论关注的，往往只是国际事务中的重大问题方面。而这些问题遮掩了在解决世界政策迫切问题上进行的日常工作。这也涉及欧洲委员会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俄罗斯是这些机构的准成员国，又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创办人之一。这不仅是与欧洲内部，同时也与亚洲和北美国家进行定期的多边对话的平台。

欧洲委员会为成员国在有关人权、民主及法律至上，文化、青年和体育运动方面进行合作提供了有效的活动园地。工作的基础——统一的欧洲法律范畴，也就是说，所有成员国享有与独立的监控机制相结合的，平等的一揽子具有法律约束的文件。

必须顾及俄罗斯自1996年起是欧洲委员会的正式成员国这一事实。正是这一点反映了我国在历史上属欧洲发展模式。俄罗斯在欧洲委员会所有组织和机构——部长委员会，议会，地方和地区政权代表大会，国际非政府组织大会，众多的监测和公约组织机制享有表决权。与该组织46个伙伴的合作中，俄罗斯一贯推行以平等与负有责任的态度来解决我们共同大陆——欧洲面临的众多的生命尤关的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自1949年建立的欧洲委员会，多年来积累了解决各成员国中存在的共同的，但往往又彼此起伏地重现于单一国家问题不可低估的经验。这种经验宝贵无极，但必须会被利用。

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建立了一整套以政治义务和囊括了军事、经济和人文领域的欧洲共同安全与合作协议相结合的机制。它们作为当代国际关系体系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是对欧安组织地区的所有国家具有至关重要的原则，其中包括安全的不可分割性，即：国家承担不以牺牲他国安全来加强自身安全的义务，共同打击涉及到所有国家的跨国威胁——恐怖主义、有组织的犯罪、贩毒。

但欧洲委员会和欧安会同时保留为政治组织，在其平台上经常发生各国利益不合的碰撞。遗憾的是，在有如此诸多内容和综合议程的组织，往往受利用重要社会—政治课题，比如，人权问题，来达到自己狭窄政治目的的诱惑。俄罗斯经常遇到持这种态度的伙伴。这种立场往往引发发表高调的政治声明，可针对我们的这些强硬声明，远非是有理由根据的批评。当然，必须承认，欧安组织的实践和程序并非理想，欧安组织至今未有章程，还得继续在其它方面进行工作，因此，欧安组织的工作因政治上的需要经常成为其抵押品。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同意有关从各欧洲组织的讲台上听不到俄罗斯声音这种说法。有礼貌地和有依据地对回应批评，不断指出对这些地区组织日常活动和国际形象起负面影响的程序上和行为上的缺点和缺陷——是我们一成不变的态度。俄罗斯自身也为推进自己的优先方向，如签证制度自由化，维护同胞权利，抵制新纳粹主义表现，打击篡改历史的现象，保护不同民族婚姻家庭儿童的权利，保障危机阶段上人的社会—经济权利在积极利用欧安组织的平台。即刻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不可能，但坚持不懈地工作最终会带来成果。

应用于欧洲委员会，总的来说，我们视自己的任务，是加强作为以自己独一无二的公约性机制确保大陆法律和人文统一空间的独立的，普遍性的欧洲组织。就像俄联邦更新的对外政策中所阐明的。

“国际生活”：今年6月您率领俄罗斯跨部门代表团出席了欧安组织安全领域问题年度会议。您认为，是否能说欧安组织成员国在保障“硬”安全问题上，愿对组织进行现代化改建，以及从整体上更新欧安组织？

A.梅什科夫：您无误地判定了欧安组织的关键问题之一。初开始，其使命在于支持组织安全框架内——军事—政治、经济—生态和人文的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政治对话。多年来，我们西方伙伴仅聚焦于人权的“篮子”，甚至成了单纯地向此领域添加义务，但同时，对履行这些义务的监督却不够和带有片面性。

在此背景下，“硬”安全领域的工作明显低落。一方面，组织活动中居上风的小集团利益，将多年来积累的，为欧安组织独有“品牌”的军政上达成的一致，置于威胁之下。另一方面，该组织跟不上时代提出的对新挑战和威胁——恐怖主义、贩毒、有

组织犯罪进行回击的要求。所有这一切，最终不能不影响该组织成员国对欧安组织的需求性。

希望我们的伙伴对扭转组织中存在的系统性危机的必要性有一个理解。2010年在阿斯塔纳由高层领导人协调一致，面向未来的总结性政治宣言，宣布在欧大西洋和欧亚建立平等和不可分割安全的共同体的目标，以及欧安组织外长理事会去年在都柏林启动的，旨在2015年该组织成立40周年之际确定其21世纪活动战略方向的“赫尔辛基+40”进程的决定，就是一个明证。

根据我们的看法，欧安组织更新的成功性，将是无条件地履行协议框架下通过决定的协议原理加强其组织性结构，以联合性的，反映了对所有人具有迫切性的安全问题来充实组织的议程。被纳入今年2月份批准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新版中的也正是这种态度。

“国际生活”：就能源问题进行稳定的对话既有利于俄罗斯，也有利于欧盟。但最近几年出现不少矛盾和纠纷。双方的互信度能持续多久？

A.梅什科夫：俄罗斯—欧盟能源对话是我们与欧盟在能源领域合作的主要工具，这种对话在不断地进行。2012年进行了俄罗斯—欧盟至2050年能源合作“路线图”（于2013年3月签署）的拟定工作。2012年12月开始（在俄罗斯“鲁斯卡亚”压气站境内）建造“南溪”天然气管道。

不过也有过不愉快的事情，比如，针对“天然气工业”集团启动的反垄断调查（我们视此调查具有明显的政治背景）。欧盟天然气市场也开始逐步地起变化：由于美国页岩气开采的增长，像卡塔尔这样的国家开始转向欧盟。综合其它一些因素，出现了对此资源降价的压力。

我们看到包括天然气在内的欧洲市场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也考虑到金融—经济危机对欧盟起的严重影响。竞争能力在下降。因此，欧盟尽力做到减少花费，找更有利的能源价格来做到这一点。这一切都是预期会发展的事态。（这也就是我们伙伴一心想拒绝的“付费不议”，天然气价与“石油篮子”挂钩的原则）。我们认为，这里必须寻找能使卖方和消费方总体上都能满意的中庸之道。说实话，我们正在做这项工作。谈判进程尽管进行的慢，但在进行。我深信，我们与欧盟伙伴最终还是能找到共同的语言。这种乐观表现也有其理由：从地理上来说，我们是邻居，俄罗斯拥有欧盟极需要的资源，昂贵的基础设施已建成（大部分还是我们的先辈建造的）。俄罗斯和欧盟都考虑到这些问题。

“国际生活”：是否可以说“第三能源方案”成了欧盟与俄罗斯关系中的刺激物？

A.梅什科夫：“第三能源方案”及其在生活中的推广方式是双方关系中的关键刺激物。

我们提请伙伴注意的第一点，是“方案”运用上的追溯方式。也就是说，“方案”的效力对其在被通过前的权利和义务也有效。

其次，我们的欧洲伙伴实际上将“第三能源方案”置于自己的国际协议至上。例如，“第三能源方案”的实行将违反我们很久前就签署的基础协议——俄罗斯—欧盟伙伴关系与合作协议，以及与欧盟一系列国家签署的有关鼓励和保护投资的双边协议。此外，欧盟在世贸组织框架内的一些义务也被违反。

至于谈判本身，对话在不同的渠道进行。谈判，犹其说涉及的是“第三能源方案”，不如说是就方案中的一系列条款不被运用（为“方案”本身所允许的范围内）的问题。

早在去年12月份，我们向伙伴提交了有关跨境基础设施项目的协议草案。尽管欧盟委员会发出其认为签署这项协议不合理的信号，我们目前还是不排除这一可能性。同时，我们愿意在替代上述的俄罗斯—欧盟伙伴关系与合作协议进行的新基础协议的谈判框架内进行讨论。我们对就此协议的工作将会恢复抱有希望。

我们不反对在一些个别的具体项目上达成协议。比如，现在就“OPAL”（“北溪”输气管道地面延续部分）天然气管道的运作，正在进行有俄罗斯能源部、欧盟委员会，德国能源调节方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参与的紧密磋商。

如果未能取得相互的理解，将又会怎样？一旦出现分歧，首先试图内部解决。和谈未成，双方将纠纷案提交法院审理。我们认为，这种内部调和的机遇还很多。但我们也不能排除纠纷将由仲裁院审理，包括世贸组织框架内进行审理的可能性。

我得指出，欧盟官方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未曾说过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为非临界的话。相反，危机造成的对天然气消费的趋减，也无法弥补欧盟内部急速下降的天然气产量。据我们和欧盟的评估，今后几十年，欧盟对天然气的需求会增加。一些国家已与我们开始就增大资源供应量的对话。

欧盟在今后数十年仍将为我国天然气销售的主要市场。

“国际生活”：与欧盟有关新基础协议的谈判已进行很久。能否指出协议会被签署的大约期限？

A.梅什科夫：我可以向您保证，俄罗斯希望尽快与欧盟签署协议。1994年签署的现行俄罗斯—欧盟伙伴关系协议，在颇大程度上已过时，我们间的关系早已“超越”了其框架。

俄罗斯和欧盟代表已为准备新基础协议进行了大量工作。现在的焦点，是对协议的经济部分进行协调。考虑到双方的贸易—投

量和我们的伙伴尽量将广泛问题纳入协议的愿望，协议的此部分要达成一致不是简单的事。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欧洲委员会不试图要我们接受附加于入世条件的贸易—投资制度自由化。

此外，在对新基础协议进行的工作进程中，必须寻求能在文件中反映出与推动欧亚一体化进程相连的新现实的公式。因为，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在一系列领域已过渡到统一的调节制度，建立了超国家机构——欧亚经济委员会，一些重要的经济职能已转给此机构。

希望我们最终还是能妥善解决余下的所有问题，并准备一份以持续目标和相互合作为优先方向的文件。新基础协议应当保障我们关系的渐进性地发展，保障这种关系的稳定和预测性。

“国际生活”：欧盟就俄罗斯汽车报废回收费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是否感到不安，这是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首次被起诉？

A.梅什科夫：利用世贸组织来解决贸易纠纷，是一种正常的实践。因为，国家间在此领域总会有互相指责发生。

俄罗斯和欧盟在恪守世贸组织规则框架内也就相互的指责进行积极地讨论。其中有涉及欧盟针对俄罗斯钢材和化肥施行反倾销税，欧盟“第三能源方案”等一系列问题。

至于汽车报废回收费问题，在此，我强调一下，欧盟反对的并非是回收费问题本身（欧盟成员国也同样存在回收费的做法），其指的只是对一些回收参数与世贸组织标准不符的征兆。早先，就此问题曾于欧盟进行了数轮磋商，而且也接近了问题的解决。近日将继续进行磋商，但现在，这种磋商必须按世贸组织规定程序进行。

我再重复一遍，借助世贸组织解决存在的伙伴间的贸易纠纷，是一种正常的实践。俄罗斯也享有这种权利，并在必要的情况下也会利用此权利。

“国际生活”：阿列克谢·尤里耶维奇，这里很难不涉及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签证免签制度的问题。现在谈判进程如何？

A.梅什科夫：俄罗斯—欧盟签证免签的对话以进行有8年，无疑，我们在解决一系列具体问题上有进展，这允许我们期待在现实的前景中会达到执行免签制度的目的。目前，双方正在就“俄罗斯—欧盟公民短期行程过渡到免签制度的联合步骤”的明细单进行大量极仔细和紧张的工作。前不久，欧盟就明细单第四总结段落（“对外联系”）的例行专家组结束了对俄罗斯的走访。俄罗斯一方履行了自己的所有义务，满足了伙伴提出的与莫斯科和地方上（专家走访了喀山、弗拉迪高加索和格罗兹内）的各部和部门举行会晤的要求。

我国就第四段落的专家组计划于今年9月底进行回访。在就明细单的此段落进行相应的报告交换后，可以视“联合步骤”的实施进程基本上结束。截至年底，我们将与欧盟就一些余下的问题另进行信息上的交流。我们将致力做到在2014年初就取消签证协议草案开始进行直接谈判。

“国际生活”：俄罗斯—北约的合作进展又如何？

A.梅什科夫：就俄罗斯—北约的关系，近年来做了不少工作。在具有互利的问题上建立了合作关系。双方的专家积极配合，尽管他们的工作不太显眼。在打击恐怖主义（信息交流、保护自空中和搞大规模群众活动时免遭恐怖袭击、简单爆炸装置检测），海盗，军事上（海上寻找和拯救人员、后勤保障，国防改革交流经验），应对自然和技术灾难方面，在积累实际合作的潜力。

我们成功地从陈述应对共同的安全挑战的任务，过渡到互利项目与实际合作的机制，其中大部分运作正常并带来重大结果。

与此同时，我们的合作还缺乏一定的深度，应有水平的信任度。我们对欧洲在不存在导致大规模军事冲突矛盾的条件下，看到北约有些国家聚焦于集体防御，对“来自东方的威胁”神话进行加温，感到奇怪。鉴于今年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境内按华盛顿条约第5条款情节举行的代号为“坚定爵士”的演习，这种意在显而易见。我们不能不产生一些问题：准备在欧洲东北部回击哪一国或多国的袭击？是否在制定北约军事计划未来的总路线？

我不认为在当今条件下炒作“东方威胁”的过时神话和“沿前线国家”逻辑的推进，有助于加强欧洲安全和俄罗斯—北约关系。以俄罗斯军费增长进行恫吓来说服社会舆论增加国防费用的企图也无助于此。我们并不隐瞒这是因为过去长期缺乏用于重新装备规划的资金和对俄罗斯军队中军人的社会支持不够。俄罗斯今天的军事预算可与法国和英国的国防费相比。再说，我国在世界上拥有最长的陆地边界。如果以边境的每一公里的军费标准计算，那么，根据不同的评估，俄罗斯排位于世界第40位。

围绕欧洲反导防御系统的局面，是对我们向不可分割安全共同空间的推进能力，而不是倒退建立分界线的严峻考验。这里重要的是构建顾及相互合法利益安全的合作。

“国际生活”：北约从阿富汗的撤军进程在继续。北约为支持该地区的稳定与安全采取哪些步骤？

A.梅什科夫：俄罗斯与北约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阿富汗。我们不准备隐瞒对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撤出后，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及毗邻的中亚地区出现的局面表示的担忧。我们对阿富汗军队和警察有能力预防塔利班进行报复没有把握。存在好不容易培训出的阿富汗安全力量将无能力予以激进势力应有回击的极大风险。

我们距离阿富汗更近，因此是更不希望会局面恶化的一幕上演。为此，重要的是继续进行合作。我仅提示一点，没有国际法为基石要做到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很困难的。我们就阿富汗的所有方案，已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应决议中与以阐明。

重要的是，必须继续共同努力为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亚国家打击贩毒机构培训人才，包括在俄罗斯教练中心进行的培训。必须联合努力争取截止贩毒途径。

我们在对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过境问题上予以积极地支持。由俄罗斯—北约理事会为培训阿富汗直升机技术人员设立的信托基金会在顺利运作。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集安组织）与北约同行，尽管目前有一定的困难，在逐步地包括阿富汗问题进行接触。集安组织从2004年起声明表示，愿意与北约在抵制国际恐怖主义，非法贩卖毒品和武器，巩固边境安全方面进行平等和互利合作。

2012年4月在阿斯塔纳举行的集安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上做的声明，向北约成员国发出“搞好建设性合作”，包括有关“恢复阿富汗稳定，特别是预防出自该国的挑战和威胁”的呼吁。我们理解，像稳定阿富汗局势，围绕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反恐与反毒安全带这些问题，不是单方面能解决的。为完成这些任务必须联合所有地区组织的努力。

但北约仍然只是愿意与集安组织的个别成员国建立合作关系。我们希望北约伙伴早晚会对两个组织合作的必要性，特别是阿富汗方位的合作有所理解。

希望北约会改变自己在对与集安组织进行合作的这种非建设性的立场。正是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能带来现实的“剩余价值”。

“国际生活”：赫尔辛基文件签署以来将近40年，欧洲安全问题又在如何解决？

A.梅什科夫：如果我们想应有地保障欧洲安全，那就得明确，严格遵循国际法准则和原则，是可预测性和稳定性的保障，特别是在应对危机的领域。国际关系中的法至上和在内部事务中的法至上，具有同等重要意义。

我们深信，建立共同安全空间的途径，是多次宣布的其不可分割性原则在实践中的体现。靠削弱伙伴来加强自身的安全——为不合理的地分散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物质上的资源。

与共同面临的挑战和威胁进行联合斗争，比单枪匹马地或以封闭式军事集团形式进行斗争，既有效又便宜。重要的是将现实的军事—政治“提升”到我们国家之间先进的经贸、文化、科学联系的水平。

正是这些原则被纳入俄罗斯有关签署欧洲安全条约的建议。其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其继续以对话课题留在谈判桌上。

欧洲安全条约引起的针对加强欧洲稳定的国际辩论，促使了伙伴们推出与俄罗斯立场相呼应的自己的建议。其中有许多我们是在5月23—24日俄罗斯国防部在莫斯科举行的“欧洲安全的军事和政治层面”国际大会上听到的。

积极介入保障欧大西洋安全前景讨论的科学—政治团体，就此领域问题提出新颖的，非政治化的立场和思想。

对现代挑战和威胁进行评价，在现有的国际机制框架内挑选进行抵制的优先模式，就是我上面提到的“赫尔辛基+40”。希望我们能拟定出欧安组织的目标和任务的共同战略，2010年阿斯塔纳峰会针对此问题委托组建“安全共同体”。希望启动的对话能将安全的不可分割原则转为实际截面，保障国家和一组国家履行不

靠牺牲他国安全来加强自身安全的义务，同时还将推进欧安组织的改建。

“国际生活”：为保障大陆安全，俄罗斯与欧盟是否还另有新的合作形式？

A.梅什科夫：没错，已到拟议中加强欧大西洋安全，同时又在亚太和世界其它区域构建安全与合作可靠架构的“网络外交”的时候。

从前景上来看，可以组建由在法律上和政治上受综合义务约束的参与方，按区域划分联合为“环”的广泛的共同安全空间。就像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第48届慕尼黑安全问题大会上所说的，这些区域能为被囊括于欧洲安全条约（欧安组织参与国），亚太地区、阿富汗及其周边（拟定联合国安理会“阐明”的邻国不干涉中立阿富汗内部事务交叉保证）地区，波斯湾、中东（以由国际保证取得的阿拉伯—以色列问题调解为基础），南高加索（以集体保证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不动用武力承担的单方面义务为条件），在北极理事会框架内的合作范围的区域。

至于俄罗斯与欧盟就外界安全空间的国际合作，其按1994年签署的有关伙伴关系与合作的协议，以及规定了五个合作方向——加强对话和在国际舞台上进行合作；打击恐怖主义；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手段，加强出口监督制度和裁军；调解危机上的合作；保护公民领域合作的所谓“第三路线图”（在2005年5月10日举行的俄罗斯—欧盟峰会上通过）。

上述几个方面，是俄罗斯—欧盟高级会谈不可少的议程标志。今年6月3—4日在叶卡捷琳堡举行的最后一次峰会也不例外。

各种形式的政治磋商也被积极启用。在包括联大范围内，定期举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欧盟

委员会副主席艾什顿之间的会晤（2012年9月26日于纽约；12月6日于都柏林；2013年2月19日与布鲁塞尔），此外还与欧盟成员国外长举行会谈（2012年10月14日与卢森堡），同样还在政策主任一级水平上保持接触（最后一次会谈于2013年5月13日在莫斯科举行），以及与主要的国际问题专家就个别国家和地区的局势进行磋商。在布鲁塞尔定期举行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和欧盟政治问题与安全委员会领导人的会晤。2010年开启俄罗斯—欧盟军事问题工作组。

就国际议程的重要问题发表联合声明的实践被广泛运用（拉夫罗夫和艾什顿就最后一次有关调解中东问题的声明于2012年12月份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俄罗斯—欧盟峰会上通过的）。

在调解危机领域的合作上也积累有积极的经验——俄罗斯代表参加了在波黑的欧盟警察特派团（2003—2006年），俄罗斯部队加入欧盟在乍得和中非共和国的行动（2008—2009年），俄罗斯海军参与欧盟海军“亚特兰塔”行动(EUNAVFOR Somalia)司令部在国际打击海盗联合行动框架下于非洲之角地区的合作。

因此，这里不是机械地照搬安全对话的形式。今天有针对解决存在的问题进行紧密协调的实际步骤的需求。在这些问题上，现在还欠缺信任。作为后果，俄罗斯—欧盟合作缺乏系统性，其潜力也未能全面挖掘。俄罗斯在像支持国际安全与稳定此绝对重要和敏感领域与欧盟进行平等合作是开放的。希望欧盟也持有同样的立场。

“国际生活”：阿列克谢·尤里耶维奇，下面我们谈谈双边关系问题。现在正在互办俄罗斯—荷兰两国“国家年”。此不大的欧洲国家与俄罗斯积极合作，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位居对我国进行投资的前三大投资方。应对那些重大项目予以关注？

A.梅什科夫: 您指的很正确，荷兰位居对我国进行投资的前三大投资方。确实如此，荷兰投向俄罗斯经济的累计金额是极可观的——630亿美元。但也不能忽视荷兰在经贸领域同我们进行的积极合作。荷兰在俄罗斯与世界国家的对外贸易中居第二位（继中国之后），在俄罗斯与欧洲国家的贸易中居首位。

这说明什么？看来，这说明荷兰是我们经考验的和可靠的伙伴。荷兰的业务界人士以乐观的眼光凝视与我们经贸关系的发展，积极地走向我们的市场与俄罗斯企业家合作。

如果谈投资合作的话，应当指出，我国境内在荷资参与下落实诸多的大型项目。比如，“壳牌”康采恩参与“萨哈林—2”项目，开发萨勒姆斯基油田，在地质勘探领域与“天然气工业”进行合作，参与在俄罗斯北极大陆架碳氢化合物的开发与开采，以及勘探和开采页岩油。“GASUNIE”公司与“天然气工业”在“北溪”项目上进行积极地合作。荷兰“ING集团”金融服务公司在俄罗斯的银行和租赁业务顺利发展。此外，还有像“DSM”、“AKZONOBEL”、“PHILIPS”、“UNILEVER”、“FRIESLAND CAMPINA”、“HEINEKEN”、“Farm Frites”、“NAKO”等大型公司在俄罗斯运作。您也懂得，这是向俄罗斯生产投入的巨大资金。

当然，荷兰的巨额投资也可以以俄罗斯的资本回流来解释。原则上，在当今国际关系中，这是一种正常的实践，我们对此也表示满意。我们向荷兰政府就其为此创建良好条件，并鼓励发展两国间的投资合作和资本相互渗透表示感谢。

“国际生活”: 俄罗斯—法国间的关系，传统地具有积极发展的趋向。这也涉及到苏联时代。今天产生一种双方合作潜力远未充分发掘的印象。是否是这样？

A.梅什科夫：将今天的关系与苏联时代与法国的关系发展做比较，不见得公正。相反，我认为，必须强调另一面，俄罗斯与法国在各级水平上——从国家元首的互访至普通公民的日常接触——一贯示范的保持紧密友好关系的继承性。法国几十年来保持作为俄罗斯在欧洲和总体世界的战略伙伴。这种伙伴关系诞生于戴高乐将军年代，扎根于二战时期与纳粹进行的斗争。希拉克总统时期及更替他的萨科齐总统和现今的奥兰德总统，也一直执行与俄罗斯靠拢的路线。无论是俄罗斯，还是法国——不为一时的权宜之计——将增强两国间的互利关系归为国际舞台上的优先任务，是一个重要原则问题。

顺便说一句，经济领域的俄—法关系也比苏联年代更多元化和紧密。因为，以往的合作，拿航天领域来说，当时是一个了不得的领域，现在是自然而然被接受的事。但我们今天的一些联合项目也完全有理由称为是突破性的。我只指出其中两个方面——俄罗斯运载火箭从法属几内亚宇宙发射场进行发射和为俄罗斯海军建造直升机登陆平台舰。

就是从贸易上的统计数据来看，我们与法国的关系也绝对不错，尽管法国的经济与俄—法的商业性项目受到危机的严重打击。但，说实话，也存在长期未能解决的利于法国投资活动的投资失衡现象。但我们与法国伙伴正在就此问题进行工作，估计在近期就会有初步的肯定结果。

“国际生活”：如何评价法国有关提高欧盟解决世界危机局面的作用和维和潜力的提倡？

A.梅什科夫：早在奥兰德当选总统之前，提高欧盟的作用和维和潜力被法国领导宣布为自己优先方向之一的任务。但为法国人提供实际落实其作用，以欧盟名义在非洲该地区采取维和行动机

遇的马里事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您也知道，俄罗斯也支持法国在马里的行动。这种支持是出自采取的行动目的——预防激进思想，就具体情况下，预防伊斯兰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武装分子犯罪活动在整个地区的蔓延。

俄罗斯与欧盟在调解危机领域，总体上具有成功的合作经验。可以回忆起在中非共和国、乍得，非洲之角地区采取的行动。但以缔结相应的框架性协议，作为奠定我们与欧盟联合应对危机的系统性基础，还是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非俄罗斯的过错。除了俄罗斯参与欧盟采取的行动方式外，我们的欧洲伙伴对另一种合作公式不可思议。我们提出另一种，更平衡的方式——在协议中规定俄罗斯参与由欧盟采取行动的一幕，欧盟国家参与由俄罗斯采取行动的一幕，以及采取的行动因以严格平等的，未有“领导”和“被领导”的解释为基石。遗憾的是，欧盟还未有做好接受提议的准备。

“国际生活”：意大利是欧洲第二生产大国，在货币联盟中，是继德国之后经济最强盛的国家。您对意大利克服国家经济危机的机遇有何看法？

A.梅什科夫：首先，我想指出，俄罗斯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欧盟整体的局势。我们外汇储备的大部分至今依旧以欧元为主，俄罗斯不采取任何能将欧洲统一货币置于复杂处境的单边行动。因此，出自我们共同的长期目标，我们将支持欧洲伙伴。

当然，我们也在关注意大利的经济状态，因为我们两国的经济相互依赖。深信，以莱塔总理为首的现今政府能胜任摆在意大利内阁前的经济和社会领域的问题。我们真诚地祝愿我们的意大利朋友取得成功。

与此同时，我想指出，俄罗斯和意大利坚信，激化双边的经贸和投资联系，特别是中小型企业联系的加强，落实高新技术项目

的趋向只会增强。今天，意大利在与俄罗斯的贸易中居第四位。据俄罗斯社会保障基金会的数据，2012年两国的贸易额达458亿美元。2013年1—5月份的相互贸易量超过215亿美元，与2012年同期相比增长23.6%。

我们对近年来研制和实施经济领域的项目，未受世界不良行情影响感到满足。这里谈及的是以下一些具有前景的联合项目：自俄罗斯经黑海（“南溪”项目）通往欧洲南部的天然气管道工程项目，“俄罗斯石油”公司和意大利的“埃尼”康采恩联合开发黑海和巴伦支海大陆架，与意大利“Enel”公司在电力领域落实的项目，在汽车和农械制造领域与意大利“菲亚特”公司的合作项目，与“Pirelli”康采恩进行轮胎产品的合作项目，与“Agusta Westland”在直升机制造业领域进行的合作，俄罗斯公司还与意大利“Finmeccanica”企业的合作（“超级喷气—100飞机”，俄罗斯铁路现代化改建）项目。

所以，我们打算与意大利伙伴在经济领域的各方向进一步地积极合作。

“国际生活”：人文领域将有那些活动安排？

A.梅什科夫：目前正在为自2013年底至2014年举办俄罗斯“意大利旅游年”和意大利“俄罗斯旅游年”做准备。有关活动是在2012年12月举行的第8届俄罗斯—意大利经济、工业和货币—金融合作委员会会议上达成一致的。俄罗斯联邦文化部长梅金斯基和意大利地区事务、旅游和体育运动部长2013年3月20日签署了相应声明。我们深信，如此规模的倡议，将允许显著地增加两国间的旅游流量，有助于促使俄罗斯人与意大利人对两国的文化和精神遗产有更广面的了解。

俄罗斯与意大利地方间的合作，在两国互办旅游年活动框架内将予以特殊的关注。两国的主流旅游运营商安排了制定对俄罗斯

和意大利至今未被囊括的城市旅游计划。双方旅游公司根据安排的活动提倡附带举行文化活动（音乐会、展览会、放映影片）。

“国际生活”：大家早就在注视希腊经济危机事态的发展。希腊有步出经济崩溃的前景吗？

A.梅什科夫：希腊是我们的传统伙伴，俄罗斯与其在各领域建有合作。因此，我们自然希望该国的社会经济状态好转。我们知道，萨马拉斯总理的联合政府为扭转金融—经济领域的现状做出积极的努力。毫无疑问，政府采取的措施带来极大的痛苦，其伴随了希腊劳动者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我们希望希腊在欧洲伙伴和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的支持下采取的步骤将带来肯定的结果

希腊政府在反危机措施框架内制定了并在落实将国家所有财产私有化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俄罗斯商界对参与希腊私有化进程也抱有兴趣。

我还想补充说，尽管发生经济危机，俄罗斯—希腊2012年贸易额，相比2011年增长20%多。俄罗斯前往希腊的游客流量也不断增长。所以，说希腊将来能步出“经济崩溃”局面，完全是现实。



谢尔盖·里亚博科夫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俄—美：拟扩大相互等待和机遇的界面

“国际生活”：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G8厄恩湖峰会是“热点”新闻之一。G8是否能确认其将继续作为讨论全球地缘政治问题的论坛并忠实履行面向解决社会问题的义务？

C. 里亚博科夫：G8近来的动态，我能称其是经济复兴期。在组建G20时，就曾拟议将世界经济主要协调者的职能，包括贸易、各种进程和做决定的职能逐步归该集团。当然，不能低估G20的意义，但G8还是保留了其一定的经济地位。

Сергей РЯБКОВ, Заместитель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 США: БУДЕМ ПЫТАТЬСЯ РАСШИРЯТЬ ИНТЕРФЕЙСЫ ВЗАИМНЫХ ОЖИДАНИЙ И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提出的问题涉及到社会的组成部分。我想，G8的工作内容，包括“多维尔伙伴关系”计划（这是中东稳定的社会组成部分）以及征税，各部门活动的透明度问题，都有一定的社会维度。当然，不能将一切都归于此，但此议题明显地存在于G8的活动中，这是事实。这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予以支持。

“国际生活”：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相辅相成，这是可以理解的。在瑞典、英国等其它欧洲国家存在的大规模失业现象，外来移民问题，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只点出失业问题，讨论该问题的优先权归谁？此课题在国际论坛上是怎样进行讨论的？

C. 里亚博科夫：我看，此课题多半属联合国及其专业化机构的责任范围，以及像确实存在大问题，特别是预算上存在财政困难的欧盟国家地区机构的责任范围。但G8并不就袖手旁观。

当然，创建新工作位置，扩大就业，保障经济稳定增长的任务，都在G8领导人的视野范围内。作为今年G20轮值主席的俄罗斯，将就业和经济稳定增长的课题作为主要议题之一。深信，厄恩湖峰会结果，将在我们对G20圣彼得堡峰会的总结文件进行最终审核时会被顾及。

“国际生活”：考虑到G8一些成员国失业领域的不同景况，此问题就更有意思。美国基本上将失业现象最小化到危机前的水平。欧洲则相反。一个月前，“欧洲晴雨表”显示的数字，说明其创下相反的记录——失业人数达近年来最高水平。

C. 里亚博科夫：但失业现象国家的分布面也广。

“国际生活”：您是否认为，因圣彼得堡框架内达成的行动计划和做出的决定实际上未有继续，俄罗斯有必要将能源领域战略调节问题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C. 里亚博科夫：我不同意有关这种决定未有继续的说法。这些决定未被遗弃，此课题在各种国际平台进行讨论时，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自2006年G8圣彼得堡峰会以来，世界市场发生了显著变化，包括对我们具有首要意义的商品贸易——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其它碳氢化合物资源，农产品供应等，都起变化。

我们希望在供应方和购买方之间能确保正确、可靠、合理，经验证的利益平衡。此领域不可能有服从购方支配或服从供应方支配的做法，两者都是不对的。

明年，俄罗斯再度轮值为G8主席时，我们无疑将出于新的历史阶段，返回讨论此课题。今年7月份在莫斯科举行了天然气出口国论坛。论坛上确实有问题可谈：如对美国“页岩气革命”后果的评价，此细分市场不同需求的变化。随着这种变化，供应上也同样起变化。这都是一些重要问题。

但圣彼得堡（2006年G8峰会）有关保障世界经济这一关键细分市场稳定的决定，至今保持了其迫切性。我们将根据当年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构想，奠定的思想继续工作。

“国际生活”：有意思的是，当美国参议院讨论任埃内斯特·莫尼兹为能源部长时，向他提出不仅从事美国未来的页岩气工作，但也提出非一般的地缘政治任务，如向页岩气储量比美国多50%的中国推出页岩气开采工艺技术。就此问题与欧洲进行了艰难的谈判。是否可以说，尽管在能源领域存在分布和利益差异现象，我们还是接近于能做出和谐情势的决定？

C. 里亚博科夫：关于莫尼兹先生被任命为美国能源部长，对我们来说，重要的还是与美国行政此部门新领导人建立直接对话，交换意见的渠道。我们之间存在许多焦点和联合工作的方向——从开发大陆架油气田交换经验到核能。

我们不希望在供求上将能源和能源安全领域变为地缘政治游戏中讨价还价的筹码。这些问题应当由专家进行工作。我也不是专家，因此也很难做解释，但我还是试一下谈谈自己的看法。

页岩气开发水力压裂技术，从对生态带来的后果，耗费的巨大水资源和从页岩气层快速枯竭的角度来看无同一性。在此基质钻井是一个复杂问题。页岩气储层通常很快就会缩减。对谁和由什么来规划，对此行业需要多大的投资，可不是我该评价的事。

我们希望及有意就所有这些方面的问题，在平静的，专业性专家环境下与中国、美国伙伴和对开采页岩气有兴趣的，并认为会有开启新机遇的东西欧国家进行讨论。我想再强调以下一点，俄罗斯作为经过数十年考验的，包括天然气在内的油气资源供应方的可靠性，是毋庸置疑的。

“国际生活”：现获悉，美国将修改在欧洲部署反导防御系统的第四阶段并将实施期限延至2020年。此外，美国在波兰部署用于战斗值勤导弹，似乎是原有型号的导弹。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信函中，就反导防御系统的透明度问题提议签订具有法律约束性的协议。是否是这样？是否能认为俄美就反导防御系统问题上有达成妥协的可能性？

C. 里亚博科夫：有关透明度问题签订具有法律约束性协议的提议是这样的。透明确实重要，但就其一项是不够的。我们提议不是签署透明度的协议，而是签署美国导弹系统不针对俄罗斯核遏制力量的具有法律保障的协议。

为使该协议不成为一种宣言、空头支票，具有工作效力，其中一定得纳入有双方协调的，经研究后制定的保障这种不针对性的军事技术参数、标准。

但光是透明或递交一定量的有关美方在发展自己反导防御系统领域准备做些什么的这种或那种信息，这是不够的。

美国就此问题提出的建议也很具体，并与两国近年来在各层次上讨论的课题有一定的挂钩。从这一点来说，不能说提出的建议是一种装饰或不够严肃。我在此强调，我们对建议的严肃性予以肯定，但指出其还有不够的地方。

至于欧洲分阶段适应反导部署计划的第四阶段，据我们所知，确实有放弃在欧洲部署SM-3 Block IIB拦截导弹的决定——这种导弹不存在，其有待进一步研发。根据美国宣布的决定，这项工作目前不会越出研发阶段，并在2022年前不会实施第四阶段。

现在存在的是往后又怎样的问题。2022年前不会有，2022年后呢？是否将又研制另一种新型拦截导弹——这一切都动荡不定。我们注意到出现了研制用于各型导弹的通用拦截弹头的构想。就是说，为美国军方用于拦截敌方的导弹子弹头研制通用性弹头。看来，美国将使用的攻关性技术会显著增强其反导防御系统领域的的能力。

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在研制新拦截系统框架下对一个载体携带多个弹头议题讨论的恢复。这就是反导防御系统分离弹头——拦截导弹上的弹头分离部位。其在不断发生变化，我们不能忽视它。

“国际生活”：俄罗斯对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大幅度削减俄美核潜力进行新一轮谈判的建议有何反应？是否意味将出现向有利于拥有高度发展的美国非核战略潜力的一种明显的倾斜？

C. 里亚博科夫：俄罗斯反应正常，很平静。其归结为在讨论是否需要进一步削减核武器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得在落实2010年签署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现行条约上取得进展（此路程连一半都未走完）。其次，寻找解决反导防御系统问题可接受的方式。俄

罗斯坚持多次阐明的，众所周知的立场。我认为，这种立场既具有理智又有其逻辑。

此外，俄—美双边及全球整体战略稳定事态的发展，受到类似太空武器出现的前景（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这种因素越来越大的影响。还有，是在推进赋予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真正的普遍性问题上毫无进展。

鉴于华盛顿落实所谓的“全球闪电战”构想，我们与美国人有基于非核武器战略手段的大题可讨论。在常规武器上也有失衡现象。

何况，在一系列其它国家扩大核武库和导弹潜力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与美国无止境地就削减和限制核武器问题进行双边谈判。予以裁军进程多边性，愈来愈成为紧迫任务。

在谈到进一步削减核武库的前景时，在与美国的对话中不能不涉及此一揽子问题。

“国际生活”：考虑到这一切，能说是目前达不到理想中的“核零点”，至少在短期未来是达不到？

C. 里亚博科夫：“核零点”是能做到的，甚至那些60年代拟制不扩散核武器基础条约的人也都这么说。

如果仔细阅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6条款，其中指的是全面和彻底的裁军——但未对是“核零点”还是“非核零点”进行划分。您看，在冷战、对峙顶峰时期，政治家和外交家就能做到以协议形式将其固定下，而不是单纯地以口号或政治指令形式提出这种目标。

俄罗斯全面遵循自己就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6条款承担的义务。俄罗斯从未曾避开过，今后也不会避开“核零点”的话题。但这不能是目的本身，不能是自满自足、独立自主的任务。否则我们会破坏国家安全的基础。

“国际生活”：俄美之间的“名单战”是否已结束？已被美国人领养的那些孩子的状况如何？俄罗斯使馆是否注视他们的处境？美

国国务院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如何，美国人是否认为有必要与俄罗斯在此敏感问题上关系正常化？

C. 里亚博科夫：有关注视的问题，那不仅是俄罗斯驻华盛顿使馆，在美国不同地区——从旧金山到休斯顿和纽约设有的总领事馆的地方，都不断地、每天（这并非夸大）都在注视这些孩子的处境。

遗憾的是，我们还是不能说我们对从俄罗斯被领养的儿童在美国家庭的生活有一幅全面的图景。我们对这些孩子日常生活的状况往往是片段性的，断断续续地，有时甚至“挤牙膏”似的从美国相关地方机构那里能获取一些信息。美国国务院本完全可以就此问题表现更大的坚持性与进行合作的意愿。

俄罗斯总统普京儿童权利事务全权代表И. А. 阿斯塔霍夫，俄罗斯外交部人权、民主和法治问题全权代表К. К. 多尔戈夫，外交部各分部，领事处对此问题都作为头等大事予以关注。我们一如既往将从事此一揽子问题的工作。

“国际生活”：现在主要涉及的是已被领养和生活在美国家庭的孩子问题吗？我们是否应当制定新的监督标准？

C. 里亚博科夫：是的，我们应当在孩子遇难时立即获得信息，以在线形式，快速，不经官僚的过滤，没有必要多次核实市政府和州当局各自承担的责任程度。

因美国国家机构的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尽管如此，我们出自人性，出自俄罗斯社会中遗留下来的，对在美国家庭的本国同胞命运持有明显关切态度的考虑，我们不可能持有一种态度。此课题将在所有级别上进行接触时会被提及。

“国际生活”：美国是否有调节该领域问题的联邦法？

C. 里亚博科夫：遗憾的是没有这种法案。当年签署的只是双边协议。但在俄罗斯儿童接二连三地遇到悲惨事件和震撼了我们与

美国人此工作方向的认识基础背景下，发生了放弃协议的事件。此协议已被废除，尽管我们现在按形式上的领养协议制度工作，但主要还是以双边领事公约为基石。

这就是留在我们手中的法律工具。协议被废除绝不免除美国一方承担的责任。我们需要在此领域更多的开放性与合作性。否则就无法解决问题，也不能为被领养的俄罗斯孩子设置不再发生新悲剧的屏障。

“国际生活”：加强双边关系的基础，以往是，并看来今后还将是广泛合作。俄—美今天在此领域的关系又如何呢？

C. 里亚博科夫：考虑到美国和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去年贸易额为320亿美元，当然，令人可笑。以俄罗斯贸易伙伴中居前七位的荷兰、德国、中国等七国贸易量为背景，这自然会引来人们脸上出现微笑。

存在一些具有标志性的项目。不能对达成一致的大型协议闭目不视。如具有巨额投资前景的“俄罗斯石油”和“埃克森美孚”间的协议。当然，这是从长期规划而言，但重要的是两巨头已决定有意不仅仅进行紧密合作，在某种意义上还进行投资、开采上的相互交织。

“波音”和“俄罗斯技术”也是持续稳定合作，包括在我国创建工作岗位的良好典范。美国对我国机床制造业、消费市场，为俄罗斯市场商品的生产进行投资是家喻户晓的事。俄罗斯也同样对美国进行投资。

我们完全能胜任提出贸易额每年增长10%的任务。存在一系列从事经济的工作组的总统委员会。我们现在正与美国一起关注为提高这些结构的活力效力可以做那些工作。

在双方商界对相互需要未有现实需求，为付出自己的努力寻找新的可能性未有兴趣的情况下，就不会有质上的变化。

但从政治角度来说，能对机遇和潜力有这种新的互相感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没有可靠的经济基础，没有贸易—投资上的广泛合作，政治关系就陷入更脆弱状态。俄罗斯总统向外交部门提出全面促使这种相互协作的任务，我们也正在这方面进行比以往更紧张的工作。

“国际生活”：前不久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谢尔盖·罗格夫发表一篇题为“奥巴马学说：魔戒”的文章，其中说，美国有意全方位主导两庞大经济体——跨大西洋和太平洋，旨在保障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美国的意图会实现吗？俄罗斯在美—中的抗衡中占何地位？

C. 里亚博科夫：我看，必须特别严肃地对待奥巴马政府推出的此战略。在跨大西洋、太平洋方位即将开始（其已在展开）的工作，是投资制度的进一步自由化，为显示根据此两大提倡介入工作的一些国家的业已形成的经济结构与形式的竞争优势创建可能性。

相信这项工作将会是持续的。这不是一个星期或一个月能完成的工作，而继之翻过一页再做新的安排。

美国与跨大西洋和太平洋国家存在庞大的相互贸易关系。欧盟和亚太国家在此领域具有强有力的对外经济和对外贸易的潜力以及自己的利益，其已被明确地标定。顾及到这一切，要求得一个公分母并非容易。但美国显示了其政治意志。我看，此进程的其它伙伴也会感到有一定的机遇。

就一些分析员爱谈的美国与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竞争的课题，我可以这样说，早已跨5000亿美元的美—中年贸易量以及投资，包括中国向美国的投资，上万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就学，中国空前规模地购买美国国债——都是两国相互依赖的征兆。看来，其中回避不了竞争。但不能不考虑美国和中国今天已有的唇齿相连的经济关系。

“国际生活”：俄罗斯与美国在波士顿恐怖事件后发表了声明，其中表示就打击恐怖主义威胁将加强两国特殊部门间的合作。此项声明发表后是否采取了某种具体行动？

C. 里亚博科夫：是的，确实有具体行动。很清楚，如果我在这里陈述这些行动，这将与采取这些行动和相关部门间合作的逻辑相矛盾。我能向您保证，正在进行包括反恐方面的紧张工作，此方面的潜力对莫斯科和华盛顿的相互理解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以前也合作的不错，波士顿事件后，对这种合作显示的政治冲动和实际需要，又再次交集于同一个焦点，从而激化了工作并被提升到新的境界。

“国际生活”：就围绕阿富汗局势问题是否在与美国人进行着谈判？

C. 里亚博科夫：我想说，有关阿富汗毒品产量和向外界市场供应量的信息中存在很多矛盾。忽而有真菌在杀灭阿富汗的所有罂粟的消息，忽而又有不存在真菌的消息，反之，有将“库存的”海洛因投入世界市场可能性的消息。

此问题对世界与稳定带来威胁。当阿富汗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时，我们与美国人将其作为头等重要的问题进行讨论。今后，特别是顾及到美国自明年起在此国家驻军现状的改变，双方将继续进行这项工作。

对我们来说，将配合水平（而非仅是相互谅解）提升到能排除直接涉及我国安全的自阿富汗毒品威胁的进一步增大，极为重要。

阿富汗还是包括诸多其它问题的一个国家。其中有2014年后国际驻军的前景问题。说实话，我们未能彻底理解美国伙伴在此领域的计划，以及其它北约国家的计划。存在一定的国际形式——

阿富汗问题接触小组，我国的高层代表也参与工作。也有在联合国、G8和与美国及欧盟双边对话上不断进行讨论的可能性。所有这一切都将会被启动。

“国际生活”：金砖国家南非峰会后出现一种说法，似乎往后金砖国家将会与非洲进行更积极的合作，确实如此吗？

C. 里亚博科夫：从事安全的所有非洲大陆国家和非洲一体化结构体及联合体领导人对此都表示关心。18个国家的领导人应邀前来杜尔班。这是金砖国家首次以超数形式举行的活动，而且正是与非洲国家领导人进行。我们将继续与非洲伙伴进行工作。相信明年为金砖国家轮值主席的巴西人也会有同样的看法。

“国际生活”：新成员加入金砖国家的可能性有多大？金砖国家成员国就此问题自己有何看法？

C. 里亚博科夫：前一段时间，金砖国家赞同联合体应当经历某种团结的路程。作为在联合体越来越广泛的一揽子问题上进行相互协作的伙伴，需要有进行进一步融洽的一定时间。

不能同时从事从意向宣言，从固定联合立场转向具体的，往往又是复杂项目的过渡工作，以此来扩大联合体。应当让这个结构有一个成熟的阶段。我看，在今后阶段上我们会做出努力将力量凝聚到这个问题上。

“国际生活”：有关拉丁美洲的最后一个问题。乌戈·查韦斯时代已结束。该地区的发展向量是否会发生变化。拉美是否会倒退到原来的“门罗主义”时代？

C. 里亚博科夫：乌戈·查韦斯作为政治领导人的作用，在委内瑞拉国内外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他的遗产在颇大程度上仍将作为委内瑞拉和其它国家领导人的支撑。但查韦斯辞世，或是说拉美地区其它国家政治格局的改变，不会因此自行取消存在的客观趋向。

拉丁美洲在国际上，无疑在成为越来越具有独立性和影响力的玩家。拉美，包括从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角度来说，证实了他们的经济和社会模式的效力。此地区的贫穷现象在趋减。所有这一切，与查韦斯的玻利瓦尔社会主义思想及实践谐和。深信，查韦斯的遗产将比他作为个性和政治活动家来说，会留存更长时间。



尤里·沙弗兰尼科

“石油天然气联盟”跨国
石油公司董事长
“世界政治与资源”基金
会主席

referent@cng.msk.ru



降低国内天然气价格并使天然气饱和全部工业

“国际生活”：尤里·康斯坦丁诺维奇，今天俄罗斯工业面临何种挑战？

尤里·沙弗兰尼科：首先，许多人都应意识到，这是世界经济危机。毫无疑问，它涉及到世界能源。但我想从另外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危机并不是哪里出现了竞争者，而在于你的数据有多好，你行动有多正确。

我们处于快速变化的世界。世界谈到页岩气，在东非发现或者将发现新天然气产地，在海湾、伊朗、土库曼开采天然气。所有这些都是竞争。现代的挑战。

Юрий ШАФРАНИК,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правления МГНК «СоюзНефтеГаз», президент Фонда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ресурсы»
СНИЗИТЬ ВНУТРЕННИЕ ЦЕНЫ НА ГАЗ И НАСЫТИТЬ ГАЗОМ ВСЮ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好，出现了页岩气。我们今天才知道么？不。作为专家，我早就知道它。今天要想高效工作，就要超前行动，预期事件，对它们作好准备。

最近十年俄罗斯的能源部门、石油、天然气，按苏联尺度已得到全面恢复。我们达到了曾有过的天然气、石油、石油产品的最高指标。我们的出口超过了苏联时期一倍。我们建设了石油结构并在继续建设，这里指的是波罗的海管道系统、“北流”、“南流”和在东方的功率。

是的，我们恢复了潜力。但问题正在于我们恢复了。今天我们需要从天然气潜力的恢复转向发展。这就是挑战！

所有其它一切，或者是外行的议论，或者是外行的书写。

“国际生活”：有人说，我们国家动力资源是对欧洲国家施压的杠杆，您对此有何看法？

尤里·沙弗兰尼科：我确信这样提问题不对也不妥当。欧洲是俄罗斯天然气的消费者。我们在不同方面发展，建设管道。由于和转运国家出现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实现极其繁重的计划——“北流”和“南流”。它们在经济上和物理上都很困难，但主要的是财政困难。

我惋惜这些钱。因为最好能和转运国家谈妥。十五年来我们一直想和乌克兰找到共同语言，但没能成功。我们的伙伴习惯于便宜的天然气，很难容忍局势的改变。作为部长我曾签订了关于向世界天然气和石油价格过渡的政府间协议。石油协议立即得到了履行。但天然气方面我们一再退让。。。退到了激化。

我想重复一遍，当然，我惋惜价格的冻结，但我国为了成为欧洲有竞争能力的玩手，在作出一切努力。这样做是对的。

至于不同的声明，它们或者是挑衅，或者是外行，或者是竞争者的伎俩。

“国际生活”：您对乌克兰和欧洲国家之间可能的天然气反向供应协议有何看法？

尤里·沙弗兰尼科：这是复杂的政治问题。能源是能源，政治是政治。我不想谈政治问题。但我想说的是：假设我们处于乌克兰领

导的位置，生活困难，价格上涨，一切都要计算，但算不过来。怎么办？寻找出路。

为此责怪乌克兰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如果是我们，大概会寻找了方案页岩气、黑海陆架、煤、在克里米亚接收液态天然气的终点站。我们，俄罗斯，随时都应该牢记，我们是在和最亲近的重要伙伴，和亲近的，与我們有许多世纪的历史、政治、经济联系的兄弟人民打交道。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天然气经过欧洲回流一对不起，这是无稽之谈。我们必须紧急地在供应欧洲任何国家的天然气合同中写明：如果转卖所供应的天然气将增加收费。付了钱后想运往哪里都请便。

因此，这里需要俄罗斯生产者、出口者，这里指的是天然气工业公司，要做细致，认真的工作。与此同时，需要政治对话，会晤，解释我们的立场。

“国际生活”:尤里 康士旦丁诺维奇，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经济大国：中国和美国——也是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俄罗斯应怎样和它们建立关系？

尤里·沙弗兰尼科：中国是我们地理和历史伙伴。我们在东方石油结构方面已做了很多工作。现在需要的正是钻井和开发产地。这里我们有些落后。

我们的天然气结构在这方面也落后。是的，可以提到萨哈林。我们已开始在那里工作。应该发展三个方向的计划：供应中国天然气，在本土液化它并沿海路外运，国内加工。此外别无选择。

土库曼向中国供应天然气，中国已建了管道并进行开采。这是事实。据我所知，这不引起我方的担心。让土库曼向中国供应，比在欧洲市场上和我们竞争好。

中国有很准确的能源战略：它在建设乌孜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里海走廊。

美国每年钻井8千万米到一亿米。苏联最高成就是3千万米，现在我们钻了2千万米。

他们钻的比我们多三、四倍。这才是挑战，而不是美国开采页岩气。我们必须增加钻井，以保持今天的开采水平。而且要使用国产的设备，至少是和西方合制的设备，使用我国的新工艺。

美国取得了重大突破并打击了市场：美国达到自给，而且几乎把国内天然气价格降低了一半，从而大大支持了自己的工业。美国影响了市场、价格、流向。一切立即改变了。这是事实。

不排除美国在二、三年后向其它国家供气的可能性。但暂时它还没有这样做。

美国是伟大国家，它有很大的能源公司，在全世界工作，包括在中国。

“国际生活”：最后，您对石油价格会很快地下降到每桶80美元的预测有何看法？

尤里·沙弗兰尼科：对价格的评价要谨慎。请看，近东多么紧张。如果明天伊朗，然后沙特阿拉伯局势激化？这会导致什么，难说，价格可能飞涨和下跌。

如果没有不可抗拒情况，最近一、二年每桶基础价格将是100美元。这对我们己经紧张，可以生活，但不轻松。价格在短期内可能下跌到80或上升到110美元。

在欧洲的竞争激化了。就此，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有很多问题，应该解决它们。它大概要从事解决价格问题，可能有些损失。但我们供应欧洲天然气是有利的。

考虑到形成的局势，我认为应该提出达到天然气饱和俄罗斯市场并降低其价格的任务。为什么美国能为本国供应页岩气，而我们不能供应工业必要的天然气呢？！我们一定要做到。俗话说，硬币有两面。也许正是这能推动我们搞好国内天然气市场。应该降低天然气价格并用它饱和我们的全部工业。效益将巨大！



安德烈·克林

俄罗斯联邦常驻欧安组代表

rfosce@yandex.ru



全欧思想还活着吗？

我想从实况谈起。众所周知，在建设立多中心国际结构条件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有限的集团国家都没有足够资源来解决全球安全问题，包括与新的威胁和挑战有关的问题

安全不可分割。这意味着今天在自己“个别”领土建立与周围世界隔离的平安岛，或者和这个“岛”确立单独关系，以达到改善自己处境的目的的可能性不大。国际交流参加者之间的密切联系、现代威胁的跨国性质使这种方案令人怀疑。

*Андрей КЕЛИН, Постоянный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и ОБСЕ
ЖИВА ЛИ ОБЩЕЕВРОПЕЙСКАЯ ИДЕЯ?*

然而，今天，在过去称为大欧洲的地区关系建立的方向正是如此。各国着重深入与欧盟和北约关系，很少顾及其它因素。在苏联后空间的新的基础上启动一体化进程——这除了解决主要问题之外，还是改变对俄罗斯不良的趋势的认真尝试。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实现全欧空间统一的理论么？换句话说，全欧思想还活着么？

今天欠佳的全欧结构状态，包括欧洲安全合作组织的状态证明这样提出问题的正确性。欧安组作为联合全体参加者及其安全三维范围全权的论坛是全欧集体安全的体现。可是它的威信和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却在不断下降。

主要原因已清楚。它在于欧安组于1990年代的动荡事件浪潮上试图变为推动单方面立场的手段。集体一致通过决议的机关被西方一些国家看作是可以远非经过生活考验的某种“黄金标准”来“梳理”邻邦的工具。毫不奇怪，欧安组这种错误活动的结果使它滑向次要问题并在国际进程中靠边站。

它的缺点是众所周知的。这是严重的失衡——全部现场活动都在“维也纳以东”国家进行，三分之二的工作集中在民主和人权方面。还有国际法律的缺乏、所谓自愿自治机构，首先是民主结构和人权局的唯意志论。

可是撤销欧安组为时尚早。因为缺乏拥有这种全权的其它全欧结构。2010年在阿斯塔纳举行的欧安组峰会曾试图给予全欧思想新的生命。56个国家（2012年蒙古加入了它）声明在议定的原则上、在共同的义务和目的基础上忠实于自由、民主、从温哥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洲大西洋和欧洲—亚洲社会空间的共同和不可分割的安全的思想。但是，按阿斯塔纳结果，这一尝试并没有得到发展。坚持保留“现状”的保守立场拥护者几乎扼杀了它。

不过，那里声明的建立“安全社会”的目的还活着。这是建立关系系统的可能性，而它可以成为大陆和谐发展的基础，防止返回对峙、军备竞赛和军事冲突。

欧安组在这一进程中可以起重要作用。可是，为此它应该适应新的任务和条件。2015年是欧安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签订40周年。与会国越来越理解到欧安组应该具备对“安全社会”基本参数，自己在其中位置，对未来的明确计划的统一观点来迎接这个周年。这种多层次思维进程得到了“赫尔辛基加四十”的名称。

在维也纳正式平台上进行的此范围内的辩论增加了政治学家们参加的活动。欧安组秘书长组织了“安全日”系列，其中对阿富汗、欧安组空间面临的威胁、冲突的调解等问题进行广泛分析。建立了学术机构，其智力贡献应该是依靠新鲜的思想帮助寻找前进的道路。著名的计划，例如，欧洲大西洋安全建议EASI，（俄罗斯在其中代表是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И. С. 伊万诺夫），或者俄罗斯—法国—德国计划IDEAS（莫斯科外交关系学院代表俄罗斯参加）的参加者提出了关于欧洲安全结构现代化的建议。

意见纷纭，各国代表对整个欧洲—大西洋关系系统适宜化和欧安组现代化问题的态度的积极程度也不同。

有些人认为欧安组一切都好，不需要任何改变，除了完善对已有的义务履行的监督和增加“自主”机构（民主结构和人权局、媒介自由代表、少数民族事务最高专员）和独联体空间考察活动经费的预算。这种立场在最近就可能使欧安组于国际事务中彻底失去需要。整个组织也会重复已失效的欧洲常规武器条约那样的命运。

很明显，在2015年只重申欧安组基础原则和政治义务已不够。原则重要的是恢复旨在接近立场、寻找折中让步的平等与相互尊

重的对话。欧洲大西洋空间的统一将取决于使有可能集体回答外来威胁的合作和相互帮助的质量。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目的是继续吸引伙伴们进行关于保障全欧统一的关键问题的谈话。为此利用我们所有的平台——不仅是欧安组，而且欧委会、俄罗斯—欧盟对话、俄罗斯—北约理事会、欧洲主要国家和美国的双边接触。重要的是促使我们的在集体安全条约中的盟友和独联体中的伙伴们表现更大积极性。

今天主要任务之一是为欧洲大西洋和欧亚空间，即我们称为“从温哥华到符拉边沃斯托克”的空间的军事—政治、经济和人文的“粘合”建造框架。

今天在政治地图上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大陆一体化的每一个集团在走自己的路，确定自己的重点，制订自己的解决较为迫切的问题的方法。没有应有的对话与和谐的态度就会增加风险，它们之间就会出现摩擦，此后就会有根源于过去“冷战”时期的冲突。

最好的统一基础是共同的利益。欧安组应该转向处理首要问题，为各国重要的内外政治战略、理论和决议所确定的安全利益服务。

这首先涉及旨在加强欧洲军事政治安全的努力。我想，如果到2015年能在完全符合俄罗斯利益的新条件下达到关于监督常规武器新协议理论的理解，将是建立欧洲大西洋安全社会的最大贡献。可是现在已适宜进行协商，讨论能够确定不同种类武器，包括新的武器的相互联系及其影响军事问题解决程度的“基垫”的构建问题。

与此同时，在欧安组空间应建立仅用政治—外交方法来调解“冻结的冲突”的条件。而且必须消除成见，保障对建立原则上新

的监督武器机制。它的基础应该是平等和不可分割的安全、不使用武力、各方权利和义务的均衡。

附近地区、世界“热点”——阿富汗、近东和北非地区的不稳定证明必须一贯地进行降低国际关系的暴力因素、加强战略和地区安全的工作。现在全世界都极其需要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外交和其它方法。大概，和欧安组伙伴国家，特别是南地中海国家搞好更密切的协作的时候到来了。

客观原因要求欧安组提高对跨国威胁问题的注意，包括对风险问题——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非法供应常规武器，特别是对冲突地区的供应、贩毒、宗教之间和民族之间摩擦的激化、无控制的难民和移民流向、极端思想的传播。

为了对付它们，需要综合性的措施，包括动用联合国和专门的地区组织的机构。欧安组不应该靠边站，而应该揭示自己的对话平台的潜力，以便在反跨国威胁斗争中接近立场，确定共同的政治方向和吻合的重点。需要保障实施2012年已通过的战略文件——反麻醉品理论、警察“框架”和反恐怖主义全权。全新的课题也已出现在议事日程上——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信任措施。

欧安组在第二个，经济和生态“篮子”里的可能性没有很好地得到利用。各大国都是希望回避大课题，走阻力最小的路，只提出不引起争议的问题。这里展示组织的远大前景很重要。在反危机、失业、社会补助削减、贫困、贪污现象的斗争中应采取协调的立场。

欧安组可以提供用于分析和交流在克服危机的社会后果方面的经验的平台。需要协助跨国对话和合作、消除劳力流动的障碍、提供教育、卫生方面的服务、推动创新和工艺的现

代化一应该指出，最终目的是增加人的资本和提高普通人的社会经济权利的保障水平。必须努力排除为需要的国家提供及时和高效的国际援助方面的所有障碍，以消除天灾和工艺灾难后果。

欧安组的“全面”可能性对东西方一体化程序的接近，大陆南北利益和需求的和谐化特别迫切。重要的是建立统一的经济空间，保障商品、服务、人们、资本和工艺的自由流通。

搞好人权方面秩序的时候到了。按不久前离职的前美国驻欧安组全权代表W. 克林的话说：“1990年代欧安组承负了帮助新独立国家管理向民主过渡的使命”。

可是，90年代过去了，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民主过渡总体已完成，而欧安组的态度却仍旧。最近十年很明显，选择性地推动人权标准的传教并不高效。强加“已成方案”的做法往往适得其反，会滋长极端的意识形态。这在西方国家强势推动同性恋社区利益方面表现得十分明显。

欧洲国家和人民在文化、历史、价值观和利益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而每一个又都有能使之与众不同的特点。在阿尔捷克举行的欧安组青年峰会上挑选了很好的口号：“Our difference is our wealth, our unity is our strength”。安全社会应保持这些特点，而不是均质欧洲空间，不要强使所有人处于同一个分母之上。

十分明显，尽管欧洲人民多种多样，在人文方面碰到的是共同的风险。最主要的是保护数千年来形成的传统价值观系统。这是欧洲共同体的真正的，而不是想象的基础。

极端主义、好战的民族主义和新纳粹主义、不宽容、排外主义对现代欧洲造成越来越大威胁。其中的问题有一按民族、宗教、语言、文化等特征的歧视和划分，对儿童保护的缺乏，包括对他

们的虐待，性剥削、色情，还有对移动自由和媒体自由的限制、移民问题、保障不干涉私生活等问题。

优先注重的应该是消除欧洲签证障碍问题，它妨碍人文接触，阻碍向全欧统一空间迈进。

正是在人文方面，选定旨在达到共同目标的联合议事日程能帮助消除参加国之间关系中多余的紧张。

在欧安组需要相互尊重的经验和最佳实践的交流。这比“责备”更能促使各国履行承负的义务。

为此有一切前提。大概这方面，暂时只有最主要的一些酷好“强制民主化”习惯的国家的政治意志除外。

如果欧安组参加国表现出政治毅力，给它“第二呼吸”并采取这种雄心勃勃的议事日程，组织就需要认真的，涉及其法律准则基础和方法的现代化。

这意味着完善决策机关、秘书处、机构、外地办事处等暂时秩序欠佳的机关的工作。

大部分使团已不再从事解决冲突性问题。监控东道国政治局势已不合时宜。外出活动将高效得多，如果能严格对待东道国家的愿望和需求。

欧安组及其工具的现代化不可能没有全权的国际组织地位。为此需要全面的法律基础，没有它，其它任何个别的协议都不可能生效（例如，优待和豁免权方面）。

今年乌克兰担任主席，在组织里“掌舵”。它致力于完成不简单的任务，因为最近越来越少问题能够得到57个成员国的一致通过。我们的乌克兰同行在积极工作，我们也尽力协助。例如，为了巩固上述的“全欧思想”。我想，乌克兰不同于其它许多成员之处是：它理解实现此思想的所有好处，也理解所有风险—如果这种思想彻底消亡。

十二月5—6日在基辅将举行欧安组部长委员会会议。对此一年最大的活动的准备是及时开始的。但愿这次与会国能采取建设性立场。基辅会议的成功将使有可能保持和发展关于建立“安全社会”的谈判进程，为未来的主席—瑞士和塞尔维亚提供一定的加速。

实际采取对组织工作适应的上述立场将为全欧思想充实具体内容奠定良好基础。建立这种安全社会的良机还未错失。重要的是所有主要玩手都应该非政治化地对待此问题，从中看到共同的好处，而不是推开北约中心的安全模式的企图。





弗拉基米尔·科津

俄罗斯战略研究所所长顾问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和北约反导
弹防御方面协作跨部门工作组
专家委员会成员
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通讯院士

vladimir.kozin.riss@yandex.ru

美国“新”核战略及其对俄罗斯的后果

2013年六月下半月美国宣布了对自己核理论的一些修改。

其基本点在六月1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于勃兰登堡门¹讲话的军事政治部分和同一月²公布五角大楼与该国其它部门编写的“关于美国使用核武器战略报告”中作了简述。当天³出现的白宫特别事实表中也评述了核战略的个别“适应”部分。

“更新”战略得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战略司令部，还有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一致通过。

Владимир КОЗИН, Консультант директора РИСИ, член Экспертного совета Межведомственной рабочей группы при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п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ю с НАТО в области ПРО, член-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 РАЕН «НОВАЯ» ЯДЕРН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США И Е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ЛЯ РОССИИ

这样，白宫在冷战结束和2002年美国单方面退出多年来称为“战略稳定试金石”的反导弹防御条约并开始大规模部署截击弹道火箭全球结构，包括直接靠近俄罗斯结构之后对自己的核战略进行了第三次的一些修改。

巴拉克 奥巴马建议了什么？

在柏林宣布限制核武器的“补充步骤”和关于“只要核武器仍然存在”，美国就没有全面安全的漂亮言辞背景下，第44个总统表示决心一如既往，依靠在全球实行的“强大而可靠的核遏制”。

在他的讲话中，一方面提到保持“扩大核遏制”。按美国军事政治领导的理解，这是美国为了保护盟友免受“敌国”动用武器威胁而保留在个别地区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按照全球核战略的这种“地区”投影，处于美国战略进攻武器和战术核武器的“核保护伞”之下的包括北约国家、日本、澳大利亚、南韩，还有某些近东国家，首先是以色列。

巴拉克 奥巴马讲话的关键点是裁减俄罗斯和美国的“作战部署”战略进攻性武器，即已经部署在运送工具上，处于战备状态的武器，数量等于2010年在布拉格签订的第三裁减战略进攻武器条约限额的三分之一。

表面看来，这种公式的实行颇有吸引力。相互达成的协议使每一方有可能把核弹头从1550颗减少到1000—1100颗，并保持防止大规模侵略的潜力，相应地符合保持较低战略进攻武器水平的战略稳定理论。

可是仅裁减“作战部属的”战略核武器又会导致美国保持较多的“未作战部署”战略武器，它们保持在后备状态，必要时可以在短时间内装入运送工具，作为返回的力量进行军事值班。

按照美国在2013年七月1日对战略进攻武器资料的计算表明，其战略司令部共有“未作战部属的”洲际弹道火箭、潜艇载的弹道火箭、重型轰炸机类型的载运工具514个，还有792个“作战部属的”载运工具。这样，“未作战部属的”载运工具对“作战部属的”比例为64%。这是很高的比例。我们认为，为了保持俄美之间的战略平衡，完全可以有“未作战部属”对“作战部属”载运工具较低的比例，例如，不超过10—15%。

很明显，美国战略核力量，正如在“关于美国核武器使用战略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将在无限期的未来保持“相当大量的“未作战部属的”核武器。而且文件中指出，“未作战部属的”核弹可以在三合一核战略范围内从一种载运工具转到另一种工具，以便“应对地缘政治局势变化”或“完成技术任务”。美国认为这使它有可能灵活运用三合一核战略的所有三个组成部分，更换部署地点，依靠削弱其它部分而加强一个部分。可是从实际裁减和保障高度预测可能性的逻辑看来，类似的方针是不适宜的。

俄罗斯和美国关于起草第三裁减战略进攻武器条约谈判的代表团团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在去年出版的专题书“武器监督：历史、现状、前景”中承认条约中没有彻底解决海上部署的远程巡航导弹问题，没有禁止非核弹的战略进攻武器，他“希望在返回潜力方面有更大的进展”⁴，把战略进攻武器和反导弹防御系统更严格挂钩，使签订的条约“更高质，更全面”。看来，这不是偶然的。

显然，不解决上述问题，进一步推动裁减和限制俄罗斯和美国战略进攻武器是不宜的。在可能与美国继续关于限制类似武器的谈判中，必须考虑美方对“作战部署”和“未作战部署”战略核武器的立场，在确定未来的裁减公式时必须坚持计算处于积极和消极状态的火箭核潜力。

美国总统在勃兰登堡门的讲话中也提到了民族战术核武器问题，可是他却奇怪地只谈到欧洲，他说美国“将和自己的北约盟国工作，旨在寻找大量裁减美国和俄罗斯在欧洲的战术武器的途径”。顺便提提，总统不知为何在这里漏掉了“核”字。是偶然还是说错了呢？我们想，大概是说错了。

他对战术核武器阐述的观点表明美国对此问题所持的立场对我们不利，因为美国将只裁减（如果真裁减）别国的，即欧洲领土的战术核武器，而俄罗斯要在自己的欧洲部分，然而俄罗斯战术核武器早在1990年上半年就从前苏联的三个国家中撤离。这样一来，按美国逻辑，未来的协议将不涉及美国在亚洲的土耳其部署的战术核武器。岂有此理？何况在土耳其境内不仅已部署了美国核弹，而且反导弹防御系统的侦察信息工具（在马拉蒂亚的反导雷达）。在该国的几个地区还部署了几个“爱国者”防空/反导综合体，它们有可能覆盖部署着这种炸弹的土耳其领土。

奥巴马在柏林许诺促使该国政治界更加支持批准还在1996年就开放供签署的全面禁止核试验国际条约。美国国会已有一次否定对它的批准。可是总统甚至没有提到条约大概什么时候能得到立法机关的通过。我们要指出的是：没有美国的签署条约不能生效，因为美国是必须批准条约的44个国家之一。

美国总统关于可能批准禁止生产军用裂变材料的国际条约的话简直是空话。条约思想还是苏联在1989年提出的。使条约的蒂结得到合乎逻辑结果的道路是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讨论它，而不是由专家组去讨论，即便是最权威的专家。奥巴马对此没有说出任何具体的，给人带来希望的话。

因此，美国总统在柏林对军事政治问题的讲话更多的是宣传，因为其中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实际解决逐步与平衡地裁减火箭核武器的计划。实际上这次讲话和以前对此问题的公开声明没有多少区别。

是新的核战略么？

“关于美国使用核武器战略报告”中较详细阐述了“更新”的美国使用核武器战略。

遗憾的是，个别的外国和俄罗斯研究家过急地肯定评价了这种核立场。

以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为首的一批工作者在今年八月初于“独立军事展望”发表了带乐观评述和结论的专题文章。作者们经过分析做出了没有根据的结论，认为对这个战略提出了“要求五角大楼在最近几年必须实行的重要修改”⁵。他们还避而不提奥巴马柏林讲话的军事政治部分和上面提到过的白宫事实表，而其中有对俄罗斯及其军事战略计划有实际兴趣的关于美国核战略的补充解释。

与此同时，对“关于美国使用核武器战略报告”的更深入和认真的分析证明该国领导保持对全球性核进攻遏制理论，对“扩大核遏制”战略的坚决支持。这种“地区”核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是美国战术核武器，包括在欧洲的战术核武器。

“遏制和防御方面政策综述”文件在2012年芝加哥北大西洋条约峰会的通过和其中宣布的原则上新的XXI世纪核武器、反导火箭和常规武器“挂钩”的三合一综合联盟，导致这个战略进一步加强。得到更强大的物质基础。2012年八月主管武器监督和国际安全问题的美国代理副国务卿劳斯·戈特莫勒在核遏制问题讨论会讲话时指出：“核、常规和反导武器都是对扩大核遏制的贡献，都需要我们经常关切”⁶

尽管五角大楼在自己报告中只是保留在“紧急状态下”使用核武器的权利，实际上它可以在任何时刻，地球上任何地点“为保护美国及其盟友、伙伴的切身利益”而实行首先打击与回击。这

种方针在最近几年绝不会修改，因为五角大楼的报告中写明：美国方面将至少在“整个XXI世纪内”奉行它。

美国军方六月通过的使用核武器政策保持了以前美国通过的核理论的继承性。它基于2010年四月通过的“国家核政策展望”中反映的条款之一，其中说：“尽管核战争变得遥远，但核袭击的风险在增大”。在这个基础上作出了关于必须长期保持战略和战术核武器的深远的结论。

规定美国“核遏制”将不是基于可用于对付非军事大设施，例如，对付城市的“反价值核遏制”，是“适应的”核战略的积极因素。

可是，五角大楼文件中写明了两个条款，证明美国继续坚持进攻核战略并且按自己的意愿进行首次核打击。第一，写明放弃实行“最低限度的核遏制”战略，这种战略规定国家战略司令部拥有的核武器数量使它不可能遏制核袭击，只能对袭击进行报复，即进行第二核打击，因为这种核遏制条款不属于进行首次或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条款。第二，“更新的”核战略保持“巨大反作用潜力”，它规定对军事设施进行“最大限度缩小潜在敌人回击可能性”的打击。但是，既然谈到某种潜在敌人的“回击”，就意味着美国可能对这种设施进行首次打击。

为了表现转向非核军事手段的虚假“愿望”并证明“减少对核力量依赖”的追求，规定五角大楼在布拉格“START-3”条约期满后保障“更高效地”计划美国火箭核力量的利用，继续组编对文件上没有提及的各种设施的非核打击的名单。与此同时，重要的是“减少对核力量依赖”的公式只在“可能的敌人”使用常规武器，而不是核武器情况下适用。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承认利用常规武器的规定不取代核武器的利用，“对外来核袭击的核遏制”不是美国核武器的唯一目

的。这种公式完全可以解释为利用美国核武器来解决其它问题，例如，地区冲突问题的可能性，即便在对峙各方只使用常规武器的条件下。

报告中提到了俄罗斯联邦和中国。

美国把它打算无限期保持核武器的原因解释为俄罗斯有传统的三合一战略进攻核力量，还有“大量的”战术核武器，尽管双方从未交换过这各种武器数据，因为从未进行过关于裁减它们的谈判。美国用这种理由来解释对我国保持“高效核遏制”的适宜性。

与此同时，美国领导忠实于上述核理论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改良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中国“大量和迅速实行的”军事核计划缺乏公开性为理由。



依靠上述理由，五角大楼继续其保持美国战略核综合力量的方针，所有组成部分都处于“战备状态”，从而使有可能同时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保障美国对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稳定”，遏制某种没有言明的“地区敌人”。

重复了以前在美国其它军事战略文件中关于不对签订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家使用核武器的许诺，但条件是，“如果它们履行关于核不扩散的义务”。诚然，美国确信，弄清国家“履行”或“不履行”义务的权利只属于美国方面。

报告中也有直接涉及美国从核时代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谈判进程“括号外”的战术核武器的条款。报告中写明美国保持核武器的“前线部署”，这里指的是部署在欧洲和亚太地区作为“扩大核遏制”基础的战术核武器。

对于俄罗斯及其盟友与朋友，美国战术核武器无限期地——“在 NATO 未确定条件之前”于欧洲大陆的保留并非无足轻重的问题。而“条件”是 NATO 改变核政策的基础，NATO 至今不认为需要改变此政策。它在将来也不打算确定“条件”，去年五月在芝加哥举行的“跨大西洋团结”联盟峰会文件证实了这一点。

文件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承认。按照六月的核战略，五角大楼同时保持美国境外作为美国全球和地区“扩大核遏制”战略组成部分的普通和反导弹防御系统力量的大量“前缘部署”，这在芝加哥 NATO 峰会最后文件中也得到了反映。这种公式再次证明俄罗斯主张排除自己边境的挑衅威胁，主张制订新质量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立场的充分正确性。按美国高级外交官声明，美国反对用新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代替旧条约是由于它的 NATO 参加者拒绝批准它，此外还有其它一些原因。

六月“美国核武器战略报告”的上述特点表明美国军事政治领导不对该国核理论作积极修改。上面提到的不大的修改，例如，

俄罗斯和美国核理论的原则区别	
美国	俄罗斯
1. 进攻性核遏制:核打击(先发制人和预防性打击)	1. 防御性核遏制: 仅对侵略者反击, 无先发制人和预防性打击
2. 无条件核遏制:在任何时候对任何国家进行核打击, 甚至无核国家和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国家, 如果后违反了条约	2. 有条件的核遏制:不对无核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参加国家进行核打击
3. 扩大核遏制:包括利用美国境外和北约盟国的“前缘”部署战术核武器	3. 无扩大核遏制:从1994年起所有战术核武器部署在俄罗斯境内
4. 全球反导弹防御系统支持的核遏制	4. 俄罗斯境内反导弹防御系统支持的核遏制

© Vladimir Kozine, 2013

不对城市，而是对军事设施使用核武器和宣称“降低”对火箭核武器依靠的条款，不可能受到检查，因而也不可能对五角大楼的上述文件给予乐观的评价。

对比俄罗斯和美国核理论关键点证明它们实质上有很大差别，尽管双方有多年多次的，主要通过对军事理论讨论会进行的关于其内容的交换。

美国的战略进攻武器的现代化在继续

美国在稍略更新核战略的同时，不停止对作为其进攻核遏制理论物质基础的战略进攻武器和战术核武器的完善。今年六月19日白宫事实表上指出：巴拉克 奥巴马“支持”对美国潜力现代化的“大量投资”。前美国战略司令部总司令詹姆斯·卡特赖特将

军曾公开通报：为支持已有的战略核武器现代化，许诺在今后二十年内为五角大楼提供将近2000亿美元。⁷

几十年内，至少到2070—2075年，美国保持战略三合一，其所有组成部分都将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改进。五角大楼打算延长使用并加以完善的某些种类战略进攻武器如下：W78潜射弹道导弹—延长到2020—2026年，W80—1巡航导弹—到2020—2030年，W88的洲际弹道导弹—到2026—2030年。

最近几年将花费6—7亿美元的地面部署的洲际导弹现代化计划包括研制供应“民兵—3”第一级和第二级火箭的新型燃料，还要改善第三级的技术性能。在进行着增大发动机功率、提高洲际导弹准确性和可靠性、提高控制中心对其改变飞行任务的工作效率，最后，在2018年之前制造新的战略洲际导弹的工作。预料改进后的“民兵—3”将在美国核力量中保持到2030年，然后延长来到2070—2075年和更晚的时期。

美国潜射弹道导弹改进计划涉及到所有14种“俄亥俄”级战略核导弹潜艇（SSBN），起初规定每一个潜艇带八颗W76 或W88导弹，计划改善美国潜射弹道导弹“三叉戟-2”，到2018年结束延长W76弹头使用期限计划的制订。其结果将涉及战略导弹总数的60%。

此前美国海军曾计划延长“俄亥俄”级战略核导弹潜艇（SSBN）使用期限30年，而现在它们将留用42年。

美国还计划建造几艘新潜艇，初步名为“SSBN(X)”，即“试用战略核导弹潜艇”，其中安装16个潜射战略导弹。这打算在2021年开始建造，计划在2029年之前投用。

在实现高度准确和高速“全球闪电式打击”常规武器生产计划范围内，美国已改装了四种“俄亥俄”级一弹道导弹核潜艇（SSBN）—“俄亥俄”（№726）、“密歇根”（№727）、“佛罗



美国战略核武器到2075年和此后的现代化

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弹头现代化

洲际弹道导弹的新燃料研制

延长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弹头使用期限

增大洲际弹道导弹发动机功率

提高洲际弹道导弹和研制打击准确性

研制新的重型轰炸机

研制新的洲际弹道导弹

研制弹道导弹核潜艇

生产新的研制舰载导弹

进一步改装战略载体以载运高度准确的非战略常规弹头

最近二十年为此目的投入200亿美元以上

年在美国就改进的战略和战术核武器利用通过了关于利用核武器的新战略

© Vladimir Kozine, 2013

里达”（№728）和“佐治亚”（№729）。它们各携带普通弹头的巡航导弹，而不是“三叉戟-2”，但不排除装备核弹头的可能。这种改装增大对俄罗斯的威胁，因为五角大楼证实两艘这种潜艇带着308个海上部署巡航导弹在“前缘区”军事值班。佛罗里达州号核潜艇带着新巡航导弹(SSGN)进入过地中海。

利用重型战略轰炸机B-2A， B-52G 和B-52H的计划规定延长其携带的两种空中部署导弹的使用期限。这里指的是“普通方案”的ALCM巡航导弹（空射巡航导弹）和利用“隐形”技术制造的，雷达“看不见”的“完善”的“ASM”（高级巡航导弹）。两种导弹都可能带有延长了使用期限的核弹头W80，而导弹本身至少将继续使用到2030年。正在考虑于2025年之前制造新的，射程更远的空射巡航导弹“LRSO”

美国改装了的4个潜射弹道导弹在弹道导弹核潜艇SSGN726-729



154舰艇×4=616海
基导弹



Ohio, Michigan, Florida, Georgia

© Vladimir Kozine, 2013

五角大楼的未来计划中还包括利用“隐形”工艺制造新的战略重型轰炸机，它的飞程将更远，在空中停留时间将更长。已声称新飞机应能克服可能的敌人的防空系统，把核弹或常规炸弹送到目的地。已声明可能制造80—100架。2013—2017年将为此目的投入60多亿美元。

美国战略进攻武器的这种现代化将是“修改后的”利用核武器战略的重要支柱。

关于战术核武器的完善化

美国继续在实行完善在本国陆地上和五个欧洲国家—北约成员国(比利时，英国，意大利，荷兰和德国)，以及在土耳其亚洲部分的战术核武器的部署计划。除美国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国

外部署战术核武器。五角大楼的长期计划表明，美国不同类型的自由落体炸弹B-61将作为“双重隶属”（美国和北约）武器无限期留在欧洲。而俄罗斯在将近二十年之前就已从前苏联的三个共和国全部撤出了自己的战术核武器。

美国国会研究局在2012年二月14日的“非战略核武器”报告中证实：1990年底美国共有800多个战术核弹头，其中将近500个在欧洲，将近320个安装在美国境内部署的炸弹和空射巡航导弹上。看来，美国是在故意缩小自己战术核武器的数量，夸大俄罗斯的数量，目的大概是为了得到未来谈判的“王牌”，以便要求俄罗斯方面进一步裁减战术核武器。

美国国家核安全局在2011年六月重新审议通过的更新美国战略和战术核武器计划规定实行延长两种战略核武器和四种配备炸弹B-61的战术核武器使用期限的计划。

按美国官方文件，五角大楼打算再延长炸弹B-61的使用期限三十年。著名的核武器专家，前丹麦国防部长，现在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工作的的汉斯·克里斯滕森指出：“预料最近十年内北约的核力量：核弹和载运工具都将经过很大的改进。这种现代化将大大提高北约在欧洲核政策的军事潜力”⁸。

炸弹B-61的用途仍然很广：它们可用于袭击战略和战术设施。运到欧洲的美国这些炸弹有360—400千吨功率，超过1945年扔到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的数倍，有时候还超过美国战略进攻武器弹头的功率。正在研制功率较小（0,3—50千吨），但导航较准确的炸弹B-61-12。它能造成相当于炸弹B-61-7导致的损失。新的炸弹用于命中高度保护的目标、洲际导弹发射井和指挥控制中心。

按美国专家们的资料，五角大楼计划最近几年生产400—930颗炸弹B-61-12（头一个生产线在2019年建成）。按某些西方专家

的资料，美国空军在 NATO 六个国家的十三个空军基地结束了新的地下库房建设，它们用于存放高度准确的战术核炸弹。

今天装配的炸弹— B-61-7 和 B-61-11, 还有将来的 B-61-12 可用战术飞机载运到目标，也可以用重型战略轰炸机 T B B-52H 和 B-2A 载运，它们可以不加油飞行 18 千公里，每个轰炸机可能携带 16 个类似炸弹。

因此，这些炸弹在五角大楼和美国国务院文件中确定为“战略”武器。2013 年一月 3 日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家核安全局散发的关于延长核武器使用期限手册中把上述三种炸弹规划定为“战略”武器⁹。

2017—2018 年装配的 F-35 新一代歼击—轰炸机将提高载运送战术武器到欧洲的可能性，因为新飞机一次加油就能飞行 2500—

The infographic features a teal background with a grid pattern. It contains several text boxes and images. At the top left, a white box with a blue border contains the text '美国在欧洲的战术核武器加强美国反导弹防御系统'. To its right is a yellow-bordered image showing a close-up of B-61 bombs mounted on a bomber's pylon. Below this, a light blue box with a yellow border states '炸弹 B-61 型: 使用寿命延长到 2030 年, 为此花费 100 亿美元。'. A green box with a yellow border below that says '出现新的型号 B-61-12=400-930 只'. On the left side, there are two images of the F-35 fighter jet: one in flight against a blue sky and another from a top-down perspective. To the right of these images, a yellow box with a blue border contains the text 'B-61-7, B-61-11 和 B-61-12 是战略和战术核炸弹: 可用重型轰炸机 B-52H tg、与 B-2A (16 个) 和新型歼击轰炸机 F-35A 运载'. At the bottom left, there is a small copyright notice: '© Vladimir Kozine, 2013'.

3000公里。每架飞机舱内能载运两个 B-61-12 炸弹（以前的只能吊挂装运一个炸弹）。

预料意大利，荷兰和土耳其空军将装配这种飞机。五角大楼计划在2020年之前用这种炸弹装配加入了北约的这些国家的所有飞机。¹⁰

这样，如果考虑到美国和北约准备继续实行直接靠近俄罗斯联邦边界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计划，而且没有任何限期，并且把核武器与常规武器密切挂钩，五角大楼又延长美国战术核武器使用期限方针，那么，在欧洲出现新的战术核武器载运工具（歼击一轰炸机 F-35 A）将是对俄罗斯安全的增大的威胁。

尽管美国核安全局没有宣布延长在欧洲的战术核弹使用期限和改进欧洲大陆部署的战术核弹计划的大致价值，上面提到过的汉斯·克里斯滕森认为对此到2022年的总投资额可能超过40亿美元¹¹。其它来源甚至认为是60—100亿美元。美国杂志“今日武器控制”报道，最近25年内美国将为五种核弹的现代化花费650亿美元。

值得提到的是，所有这些“双重隶属”战术核武器是作战部署的，即既可以在潜在的地区冲突中，也可以在美国至今未放弃的全球核战争中使用。

部署了美国战术武器的北约六国的飞机按“利用常规空军支持核战”（Support of Nuclear Operations with Conventional Air Tactics — SNOWCAT）计划经常参加采用 B-61 炸弹模型（例如在意大利空军基地“阿维阿诺”）的空军演习。这些国家还参加“Steadfast Noon”类型的演习，演练运送带战术核弹头的炸弹到“可能敌人”的目标。还吸引北约的本国没有部署美国战术武器的非核国家，例如，匈牙利、希腊、丹麦和挪威参加这种演习。

北约领导打算更积极邀请北约成员中的非核国家参加解决各种与战术核武器相关的问题，包括涉及到核武器的“集体”计划，确定和平时期美国核力量在欧洲大陆的部署地点，相应的指挥和磋商机制的功能。芝加哥峰会文件之中有关于北约非核国家更广泛参加“分配核责任”的条款。

这样，改进的美国战术核武器在补充“更新的”核战略。

反导弹防御系统发展前景

上面已说过，五角大楼关于利用核武器的新报告中有关于反导弹防御系统的条款。美国军事政治领导不打算取消2009年巴拉克·奥巴马就反导问题宣布的计划——“欧洲分阶段适应办法”（E П A П）。为此目的的拨款不会根本裁减。在波兰、罗马尼亚建立大型作战导弹防御基地的计划也保留。继 E П A П-1 计划之后可能出现 E П A П-2。已批准了对反导弹防御系统截击火箭的专门“使用武力规则”，即关于它们的使用的说明书。2013年三月宣布的美国反导弹防御结构的“转型”非但不会导致计划的撤销，相反地会加强它，而且，按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的说法，将增加50%。其强大的带反导弹防御系统成分的集团不仅在欧洲大陆，而且在亚太地区、近东、中东、海湾和地中海地区建立。配备有作战信息控制系统“宙斯盾”（Б И У С）的美国海军的军舰已经到过黑海和巴伦支海。

到2022年美国全球反导结构的海上部分将近占突击武器的95%。美国军事政治领导认为，反导弹防御的海上部署系统有较高的机动性，不仅能高水平保障本国领土防止来自任何方向的，使用弹道火箭的假设威胁，而且能掩护在接近“潜在敌人”领土的自己的火箭核力量。

按美国国会研究局资料，到2013年年底美国海军总共将有配备“宙斯盾”和不同型号的截击火箭的29艘军舰，包括五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和24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上述集团的地理划分如下：13艘部署在大西洋沿岸国家的海军基地上，16艘在太平洋地区海军基地上（作为比较：2012年的比例为11：18）

在如下表格可见美国海军拥有的最现代类型的截击火箭数量。

美国海军配备作战信息控制系统 “宙斯盾”(БИУС)军舰数量

软件保障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3.6.1	23	24	23	19	17	16	13	11	?	?
4.0.1	2	4	6	9	9	9	9	9	?	?
5.0	0	1	3	4	6	8	13	15	?	?
5.1	0	0	0	0	0	0	0	1	?	?
总数	25	29	32	32	32	33	35	36	?	43

美国截击火箭SM—3供应数量

Block IA	107	113	113	136	136	136	136	136	136	136
Block IB	1	16	25	61	100	169	251	328	400	472
Block IIA	0	0	0	0	0	0	7	19	31	70
Block IIB	0	0	0	0	0	0	0	0	0	0
Итого	108	129	138	197	236	305	394	483	567	678

来源：Navy Aegis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BMD) Program: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3. 14 March. P. 7.

所有这一切是在美国坚决拒绝支持俄罗斯关于分别对待反导弹防御问题，在法律上保障这种大规模反导弹防御结构不针对俄罗斯战略核力量的建议背景下出现的。

谈高度准确的常规武器

美国领导不满意战略和战术核武器的发展和完善，仍然打算继续实现野心勃勃的，利用常规武器进行“全球闪电式打击”的计划，对它提出利用新一代的高度准确和高速的系统，在一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命中世界任何地区的“专门标明的特别意义的设施”的任务。按美国军事专家的评价，这种武器能命中美国全球战争计划中标明的10—30%的目标。

五角大楼代表的声明和2012年七月美国国会研究局起草的报告“利用常规武器和远程弹道火箭的全球闪电式打击：历史问题和挑战”证明了这一点。¹²

美国现政府打算继续实行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就已通过的“全球闪电式打击”计划，对这个计划的常规武器研制者提出了缩短部署到战斗位置时间和提高飞向目标速度以及命中指定目标的准确性的任务。最近美国碰到的财政问题导致了对“全球闪电式打击”计划实施资金的减少，但没有全部取消计划。

不排除用常规爆炸物：或者一个弹头（相应地重量从200—400公斤到600—800公斤），或者带独立导引装置的分弹头装配某些数量已部署的“民兵-3”号地面部署洲际导弹和未部署的“和平卫士”号洲际导弹的可能性。

美国海军将改装每14个战略弹道导弹核潜艇之中的一个，它们起初装配了核潜射“三叉戟-2”，下载两个各带四个常规弹头（与此同时，保留所有弹道导弹核潜艇各带22个核潜射导弹）。还在考虑于每一个这种核潜舰装备多达66个50到100公斤的常规弹头，射程为3000—5500公里的不大的“过渡程”导弹的方案。

在“全球闪电式打击”范围内，美国前缘防御研究计划局（А П О И П，或 DARPA）打算制订名为“光弧”的新军事系统。



它的特点在于利用高超声速空气滑翔机，截运火箭SM—3到3, 8千公里距离的目标。众所周知，最近几年内它将成为美国海上部署全球反导弹防御系统的基础。高超声速平台“光弧”可以部署在美国海军潜艇上，也可以部署在军舰上：不受检查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和“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上。

美国海军计划建造高超声速空气滑翔机——“Hypersonic Test Vehicle”，或“HTV”。其速度超过音速四倍，导引准确性达三米。据说它能载运重达400公斤的常规弹头飞达5, 5公里并用普通炸弹或动能冲击弹头摧毁高度保护目标。

此外，五角大楼考虑在将来进一步扩大重型轰炸机的非核打击功能，例如，用于地区冲突中。为此目的将使用带常规弹头的巡航导弹，名为“CALCM”（Conventional Air-Launched Cruise Missile）。

美国陆军也计划利用名为“改良超音速武器”（“Advanced Hypersonic Weapon”，或“AHW”）的类似平台。它比空军的高超声速空气滑翔机应该有较短的射程。

美国军事专家们承认，“全球闪电式打击”计划具有扰乱性，因为任何面临军事打击的国家都不能确定发射的火箭或高超声速空气滑翔机装的是什么“馅”——是核弹还是普通炸弹。特别是，如果普通炸弹安装在以前用于载运核弹的战略载体上。自然，此计划可能使作为高度准确武器打击目标的国家难于及时采取对抗措施：利用本国监督技术确定“全球闪电式打击”弹药成分实际不可能。何况美国战略潜艇在自己传统的巡逻地区，包括“前缘”地区同时携带核弹和普通炸弹。

就此应该同时考虑到美国战略进攻武器和战术核武器，反导弹防御系统和“全球闪电式打击”计划的密切联系。2006年七月在负责计划于全球规模使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美国战略司令部范围内建立全球打击联合功能一组件司令部就证明了这一点。

还应该考虑到，美国军事政治领导不打算让“全球闪电式打击计划”的攻击力量处于国际法，包括与俄罗斯联邦谈判的监督之下。

* * *

这样，今年六月下半月的美国“适应”了的使用核武器战略实际上仍无改变。其基础仍然是规定可对非北约国家和非美国“优待”伙伴的国家的进行首次核打击的进攻性战略核遏制理论。把大量不断更新的战略和战术核武器用于对它的实施。很重要的是，这些武器隐蔽在美国和北约的不断扩大、完善的全球反导弹防御系统中。美国军事政治领导仍然致力于摆脱对本国陆地的军事威胁，仍和几十年前一样，依靠“前缘部署”理论，在其它国家“大门口”制造这种威胁。

俄罗斯联邦民族安全利益要求在它的核和防御政策中，在确定和美国裁减武装力量和限制军事活动问题的新态度时认真考虑这一切情况。应该把巴拉克 奥巴马在2013年八月以“斯诺登事件”为借口建议的俄罗斯—美国关系“中休”用于制订这种态度的目的。

1. President Obama Speaks to the People of Berlin from the Brandenburg Gate / The White House. 2013. 19 June // <http://www.whitehouse.gov/blog/2013/06/19/president—obama—speaks—people—berlin—brandenburg—gate>
2. Report on Nuclear Employment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Specified in Section 491 of 10 USC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Washington. 2013. June // http://www.defense.gov/pubs/ReporttoCongressonUSNuclearEmploymentStrategy_Section491.pdf
3. Nuclear Weapons Employment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act sheet /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2013. June 19 //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6/19/fact—sheet—nuclear—weapons—employment—strategy—united—states>
4. 安东诺夫 A. 武器监督: 历史、现状、前景 M.: 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 2012. C. 52.
5. 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 罗戈夫 C. M.; 前俄罗斯战略导弹部队总参谋长 (1994—1996 年) 上将叶辛 B. И.; 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 少将 佐洛塔寥夫 П. С. 和俄罗斯国防部驻北约首席军事代表 (2002—2008 年) 海军中将库兹涅佐夫 B. С. 俄罗斯和美国在岔路口. 奥巴马在核方面的建议和俄罗斯对此反应 // 独立军事展望. №27. 2013. 八月 2—8.
6. Gottemoeller R. U.S. Strategic Command 2012 Deterrence Symposium. Remarks. Omaha, NE. 2012. 9 August // <http://mail.yandex.ru/neo2/#message/2370000000177583618>.
7. U.S. Strategic Nuclear Forces: Background, Developments and Issues /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Washington. 2012. February. P. 1—34.

8. Kristensen H.M. Modernizing NATO's Nuclear Forces: Implications for the Alliance's defense posture and arms control// Nuclear Policy Paper №11. 2012. November. P. 1.
9. Life Extension Programs / National Nuclear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2013// <http://nnsa.energy.gov/ourmission/managingthestockpile/lifeextensionprograms>
10. 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port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10. May. P. 39 // <http://www.defense.gov/npr/docs/010%20Nuclear%20Posture%20Review%20Report.pdf>.
11. Kristensen H.M. Op. cit. P. 3.
12. Conventional Prompt Global Strike and Long—Range Ballistic Missiles: Background and Issues /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Washington. 2012. 6 July. P. 1—39.



塔季扬娜·杰伊奇

俄罗斯科学院非洲问题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历史学副博士

tdeich@yandex.ru

非洲的“中国世纪”

近些年来，出现了国际上对非洲兴趣高涨的现象。还在不久前，非洲被成为“遗忘的大陆”。世界一些领先国家开始是以新的眼光评估作为他们必须有的矿藏和能源资源来源的此大陆。鞭策了对非洲发生兴趣的一个并非次要的因素——“新现大国”对非洲国家进行的空前扩张，首先是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在促使其加倍努力进入世界市场，从当地排挤“老玩家”。

*Татьяна ДЕЙЧ, Ведущий научный сотрудник Института Африки РАН,
кандидат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КИТАЙСКИЙ ВЕК» ДЛЯ АФРИКИ*

非洲大陆，根据不同的评估，蕴藏了世界已勘探的30%—40%的自然资源，实际上更多。然而，因对其考察程度不够，成了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原油来源。2012年，中国从非洲进口了6470万吨石油，据官方数据，这占国家进口石油的24%¹。中国同样是世界上铜矿的最大消费国，其大部分是靠非洲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中国对非洲的铬、铂、钴、铁、金、银和木材有很大依赖性。

但中国对非洲的兴趣不只是以大陆的资源潜力的作用，但也以该地区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增长的政治分量来解释。与非洲的关系——建立作为对抗全球化挑战机制的多极世界和南部国家集团的中国新世界秩序战略的一部分。

中国与非洲54个国家中的50个国家建有外交关系。布基纳法索、冈比亚、斯威士兰、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四个国家保持对台湾的忠实。“一个中国”是北京在对外政策上一成不变的原则：他即刻与承认台湾的国家断交。北京外交胜利的建交国名单又添加了利比里亚（2003年）、塞内加尔（2005年）、乍得（2006年）、马拉维（2007年）。新成立的南苏丹也选择了中国为建交国。2011年7月9日，中国作为最初国家之一承认了南苏丹。8月份，中国外长杨洁篪访问了南苏丹。2012年4月，南苏丹总统萨尔瓦·基尔对中国进行了访问。

中国在非洲的外交组织工作良好。除中国外交部对非洲政策承担责任外，同时还有中国商务部的四个部门分担责任（М О - Ф К О М）。中国在非洲大陆国家有分支面极广的办事处系统。除使馆外，设有经贸顾问处，在大多数非洲国家开办了中国文化中心。上述这些机构资金充裕。就规模而言，中国在非洲驻外机构系统不仅超越俄罗斯，也超越了西方国家。

中国在自己最艰苦的阶段，也没有不顾自己非洲方向的政策。自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1963—1964年对非洲进行访问以来，

中国所有任要职的国家和政治活动家视对非洲的访问为自己必有的义务。这种访问在新千年中创下了新纪录。中国领导人在2000—2007年期间访问了35个非洲国家。仅2012年，他们访问了十个非洲国家。每年以中国外长访问非洲开始新的一年，成了北京的传统。

中国新任领导人习近平，作为国家领导人将非洲国家选为自己首访国家之一。除了出席金砖国家杜尔班峰会对南非进行的访问外，习近平于2013年3月访问了刚果共和国和坦桑尼亚。对中国来说，两个国家各有其意义。刚果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石油、铀、铜、磷、金、天然气、锰矿）。在某种程度上，多亏这些资源，刚果以50亿美元的贸易量在中国与非洲国家贸易伙伴名单中居第七位²。中国与坦桑尼亚存在悠久的友好关系。1960年，坦桑尼亚在中国的援助下实施了一项大型项目——坦赞铁路。习近平在访问时向赴援坦桑尼亚在工地身亡的69名专家的公墓献了花圈。

非洲国家领导人也频频访问中国。仅在2012年，有13名非洲大陆国家领导人访问了北京。客人每次都受到隆重接待，以示中国高度珍视与非洲国家，非洲总体的关系，并就非洲大陆国家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予以应有的评价。

文化和科研联系也得到积极发展。北京政策的长期目标——参与组建面向中国的非洲政治和实体特权。2010—2011学年，政府向5710名非洲留学生发放了助学金³。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12年7月在中—非合作论坛第5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说，去年，为在中国大学就学领取助学金的非洲大学生共有两万人⁴。“争取智囊”的手段——由北京建立传播中国历史、文化与教授汉语的孔子学院的实践。2012年在22个非洲国家建立了29个孔子学院。外交部主办的非洲人文资源发展基金会从事培训各专业的专家——商

业、教育、客机、农业、卫生。正在落实交流学者的计划和联合研究项目。2010年10月底在中国举行了旨在对中非关系发展进行思想交流的首届中非智库论坛。

中非媒体也频频交流。中国企业向通讯电信和多媒体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中国对非洲的新闻突破以西方通讯社因资金困难而紧缩为背景。

以此，中国成功地借助“软实力”在非洲落实自己的对外政策，以树立中国作为友好国家愿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和支持的形象，并希望得到非洲国家同样以支持中国予以回应，为此积极利用所有可能的交流形式。

对外关系政策

中国一贯主张在国际舞台上与非洲国家团结。非洲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如扩大安理会非洲国家的代表性，为世界贸易条件更公正做出的努力等方面的立场，得到中国的支持。中国参加调解非洲冲突，上千名维和队员参与非洲大陆的维和行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中国政策上的新现象。其反映中国领导致力在国外树立国家的正面形象，向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其它国家示范自己的和平意向。

非洲国家则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问题上予以支持。联合国的非洲组阻扰了西方国家谴责中国违反人权的现象。非洲国家支持中国坚持不让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意愿。最后，大多数非洲国家承认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从而促使了中国被接纳为世贸组织成员国。对北京来说，非洲国家予以政治上的支持极为重要，他们的支持能使中国作为领导者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发言人地位得到巩固。致力吸引与台湾建交的为数不多非洲国家，仍是决定中国对非洲方针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中非关系上，中非合作论坛起特殊作用。以部长级会议和国家元首峰会形式轮流在中国和非洲国家举行的三年一次的论坛上，每次公布今后三年对非洲援助的计划。

经济与投资

近几年来，中国成了明显的对非洲的“输血国”。2012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报告中指出，对非洲的外来援助主要来自中国⁵。这种援助不仅以财政输入（科研经费、无息贷款、优惠贷款、勾销债务），但也以贸易和投资的一揽子建议形式进行。因此就很难分离实际援助效果与其它符合北京持续战略任务——保障中国资源、销售市场和所需投资领域的合作形式带来的效果。

在非洲政策的所有阶段上，北京对无偿援助的宣传重要性予以应有的注意。2011年中国就非洲之角遭遇大旱灾提供了自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食品援助。2012年向乌干达为建造医院提供了6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⁶。

财政援助多半以优待和优惠贷款形式提供。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的开幕式上，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说，近三年来，中国向非洲提供了15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⁷。就在2013年7月，习近平会见对华进行访问的尼日利亚总统古德勒克·乔纳森时，签署了中国向尼日利亚提供11亿美元低息贷款的协议。这笔贷款用于发展基础设施：建筑公路、机场终端和在首都拉格斯建造轻便铁路⁸。中国提供贷款经常以大部分合同由中国公司承包为条件。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钟建华说，在非洲有2000余家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⁹。

中国对资源的需求促使了中非贸易的增长——自2000年的110亿美元增至2012年200亿美元——成为非洲大陆的主要贸易伙伴¹⁰。

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拥有丰富石油和矿藏的国家。非洲向中国出口的85%的份额，分摊于五个石油生产国——有安哥拉、赤道几内亚。尼日利亚、刚果共和国和苏丹。

2010年联合国称中国为第二大全球投资商¹¹。中国自2003年至2009年向非洲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19倍，2012年为29亿美元，与2011年同比，增长70%。钟建华表示，截止2012年6月，中国向非洲的投资达450亿美元，其中包括150亿美元积累的外商直接投资¹²。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2012年10月13日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提到中国在非洲积累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具体数字——147亿美元¹³。尽管近十年来中国对非洲的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增长，但2012年其仅占中国累计的外商直接投资的4%¹⁴。

北京不仅对像油气和矿山开采业这样“有声望”的行业进行投资。其关注的焦点——基础设施，在非洲这仍是一个尖锐的问题。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非洲在基础设施上每年花费450亿美元，但应当花费约930亿美元¹⁵。非洲所有国家用于基础设施发展，每年至少得需要4800亿美元¹⁶。

中国在35个非洲国家实施基础设施项目，2010年实施了500个项目。中国向摩洛哥、加纳、刚果、苏丹、尼日利亚、莫桑比克修建堤坝（最大的苏丹麦罗维大坝），苏丹、安哥拉、肯尼亚、加纳的水力发电装置，赞比亚、坦桑尼亚、纳米比亚、博茨瓦纳的公路和铁路，为建造文化中心和娱乐场所（南非共和国、佛德角），旅馆（佛德角、南非共和国、博茨瓦纳、塞拉列昂、安哥拉），向班吉（中非共和国）和雅温得（喀麦隆）运动场进行投资¹⁷。

以资源换取基础设施的原则被广泛运用。与非洲国家签署的一揽子协议不仅只包含开采和向中国出口资源的项目，还包含建造铁路、公路、桥梁等项目。这种协议往往致力以保障或方

便向中国提供资源为背景。中国承建安哥拉的本格拉铁路大修工程，旨在打通自安哥拉民主共和国和赞比亚出口矿石的通道；在利比里亚修筑铁路和港口，便于自利比里亚和几内亚的铁矿出口。

但运输基础设施项目也在一些资源并不富裕的国家实施，中国进出口银行为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建造公路投资三千零七十万美元¹⁸。此外，还为在肯尼亚、莫桑比克修建公路进行了投资。中国除在坦桑尼亚进行的运输系统大修工程外，2011年转交了1000万美元的科研经费和为改善公共交通运输75辆价达570万美元的车辆¹⁹。2011年11月，中国承建自恩德培机场到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公路的维修工程。维修资金由中国进出口银行以优惠贷款提供。

非洲国家的工业行业也在成为投资对象。中国中材集团于2012年2月完成了在尼日利亚建造的价为10亿美元的水泥厂²⁰。根据莫桑比克社会经济研究院的资料，工业行业是中国向莫桑比克经济投资的主要方向。

最近几年，中国越来越多的投资转向高新技术领域。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技术公司”就移动通讯与肯尼亚、津巴布韦和尼日利亚签署了四亿美元的合作。“华为”在40个非洲国家拥有2500名职员，仅在拉格斯就有300名编制人员²¹。“中兴”公司同样对一系列非洲国家进行的电视与电话网现代化改建进行投资。像“华为”和“中兴”这些公司正在排挤在非洲的西方电信通讯设备²²。

建立经济特区，在中国与非洲国家发展经济合作方面负有重要使命。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的孵卵器，在宣布“走出去”计划后，北京领导表示有意在其它国家建立经济特区。十几个非洲国家对特区表示有兴趣，专家选出五个：埃及、埃塞俄比亚、毛里

求斯、尼日利亚和赞比亚。赞比亚谦比希铜矿区的中赞经贸合作区是被落实的第一个项目。2009年2月，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出席了开幕仪式。

非洲政策资源

中国在非洲取得的成绩归功于一系列因素。首先，中国以优惠贷款、信贷、投资形式对非洲国家日趋增长的投资以及北京参与实施非洲需要的投资项目。

中国商界聚焦于非洲抱有特殊发展兴趣的经济部门，在非洲基础设施领域扮演主要角色。中国在成了西方制裁靶标的国家（苏丹、津巴布韦）活动，作为这些国家可替代的伙伴上阵，这为中国带来巨大的红利。像在利比里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塞拉列昂遭战争和冲突破坏国家工作的中国公司，都做有担风险的准备。在复杂条件下工作的公司，能使他们从外商的直接投资上获取更高的利润。

中国在非洲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中国的关键战略原则——不干预非洲国家的内部事务。不将商务和政治混为一谈，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活动与殖民主义有彻底的区别，因为中国在向非洲的经济投资。此外，他们再三强调：“这是一种互利形式”。鉴于此，许多非洲国家政府视中国今天起有可替代由政治条件决定的西方援助和不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有条件的财政援助来源的作用。

“软实力”——中国非洲政策上并非不关紧要的武器。其武器库包括有——高层互访，文化与科技联系，对非洲卫生和教育的关注。

中国作为新经济大国的“崛起”和对非洲参与的日益增长，引起政治家、学者和媒体的高度关注。一些人视北京在非洲大陆的

驻留有利于非洲国家并对传统地在该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欧—美起平衡作用。另一些人则视北京的驻留对非洲存在负面后果的危险。西方媒体中流行的套用词——“中国的新殖民主义”。西方学者K. 阿列西和C. 汉森批评中国不关心非洲国家违反人权的现象并助长不愿打击腐败的非洲政府。北京被指控与受到国际社会谴责的政权进行合作。其断言，对苏丹石油的兴趣迫使北京闭目不见达尔富尔的种族清洗。

中国对这类指控非常敏感并企图予以反驳，声明说，中国政策与过去的殖民主义和今天的新殖民主义存在根本上的区别。中非论坛第5届部长级会议网页上写道，“西方在非洲干的事情——新殖民主义，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友好与互利关系”²³。新华社写道，“非洲出口的石油、矿产品、钢铁，在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上起重大作用。”但同时，中国保障了非洲其必要的食品和技术工艺。中国聚焦于提高非洲的生产能力，促使其基础设施和工业的发展，而并非在从事所谓的“掠夺”其资源。

在最后一次2012年举行的中非论坛第5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援引了说明中国对非洲带来好处的实例：“中国在非洲建造了100多所学校，30家医院，30个疟疾防治中心，20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向非洲提供了150亿美元优惠贷款，并在峰会上承诺再提供200亿，将非洲出口中国的运价下调至零”²⁴。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2012年在“中国日报”的一文中写道，在马拉维的中国专家帮助当地的农场主种植棉花，在埃塞俄比亚靠专设的“中国—非洲”发展基金建起制鞋厂，予以当地居民就业的机会。刚果民主共和国靠中国的贷款援助购置了水电站机组。据商务部正式发言人说，目前，在中国的援助下修建了200公里的铁路，300公里的公路。中国几乎在所有非洲国家首都建造了运动

场，新总统宫或其它公共建筑。中国的一个庞大项目——北京在亚的斯亚贝巴无偿援建的非洲联盟会议中心已于2012年1月交付使用。中国向47个非洲国家派出16000名医务人员。中国政府成立了为每年培养3800名专业人员的人力资源发展基金。已培养的非洲专家达四万人并向50个非洲国家的两万人发放了助学金²⁵。除此，中国减免了非洲国家的债务。

是“输血国”还是消费方？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2年的报告，就中国是猎取资源的国家的思想表示反对。报告中说，“中国的投资囊括了各种不同行业，包括基础设施、教育、信息技术。这些投资是对非洲有利”。美国向非洲矿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比例，远远超过中国。

中国商务部西亚和非洲司司长表示，以往中国从非洲直接进口矿石和原油，现在，中国向非洲在地方上的加工进程投资，以保障当地居民的就业和非洲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外援助司司长于永福说，“我国援助政策的使命，是尽快解决这些国家的问题，而非促使资源的交换，中国向非洲转交了面极广的技术：从开发稻田到开采和利用资源，从“绿色”能源到3G技术秘密，从技术转移到个体培训”²⁶。

那么，非洲人对中国，对其政策又有何看法呢？就像茱莉娅·斯特劳斯公正地指出，“这个问题要比官方北京对政策的自我评价以及西方媒体、非政府组织或商界就中非关系抱有的恐惧感（现实的或虚幻的）重要得多”²⁷。

但中国政策不是所有方面令非洲人感到满意。中非贸易中存在的失衡现象，中国大量外运资源（中国进口原木，往往又是非法的），阻止地方工业发展的中国廉价商品的泛滥，不受控制涌

入的中国非法移民及其对非洲的经商起不良影响。非洲人对地方工人工资低和中国公司不恪守劳动法，对以聘用中国工人来取代地方工人，蔑视环保措施表示不满。

这迫使非洲特权提请北京领导对自己政策“阴暗面”的注意。佛得角政府对中国公司的活动设下限制，要求他们更严格地对待生态标准。博茨瓦纳、纳米比亚、突尼斯也采取了同样措施。

尽管中国政策的某些方面也受到非洲人的指责，但总体上，非洲大陆国家对与北京的伙伴关系予以正面评价，认为这种关系有助于非洲的经济增长。赞比亚的反对派领导人迈克尔·萨塔指责中国公司剥削地方工人，他以“玩中国牌”当选了总统。尽管如此，就任总统后，萨塔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并继续与北京进行经济上的合作。坦桑尼亚总统贾卡亚·基奎特表示，“发展中国家视中国为解决许多问题的伙伴”²⁸。根据定期在尼日利亚和肯尼亚进行民意调查的研究中心的数据，当地对中国的评级又稳定又高——75—86%²⁹。比勒陀利亚非洲研究所S. 迈杰特兰恩学者认为，西方有关中国与非洲是“新殖民主义”关系的推论，是他们为非洲国家结构的改变和中国在非洲大陆的驻留加强，他们的战略利益将遭损害担忧所决定的。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斯文·格里姆称“新殖民主义”术语应用于中国政策是不正确的。他说，“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活动为非洲国家创造机遇”³⁰。

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中国的投资对非洲经济的发展起了肯定作用。分析员将非洲的经济增长与中国的投资相连³¹。近年来，非洲取得5%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靠中国的援助和投资。

冷战后的发达国家削弱了对非洲的关注。中国迫使他们再度对非洲大陆被边缘化问题的关注。中国在满足自己的经济需要

的同时，向非洲国家提供了新机遇。这是许多非洲政治家持有的共同观点。

1. Du Juan. Got backs energy mining investment in Africa//China Daily. 2013. 16 June // http://www.chinadaily.com.cn/business/2013-04-11/content_16392202_2.htm
2. 习近平出席中刚友好医院竣工剪彩仪式，图书馆启用和中国馆揭牌仪式 //人民日报网1.04.2013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20/818947/html>
3. 人民日报网 28.12. 2011 // <http://russian.people.com.cn/31520/7690028.html>
4. Chinese president's special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Fifth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f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2012. 19 July // Xinhua news //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china/2012-07/19c-131725637.htm>
5. Chen Weihua. China has potential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 China Daily. 2013. 13 June // chinadaily.com.cn
6. Glennie J. The West has no right to criticize the China—Africa relationship. 2012. 8 Febr. // <http://yandex.ru/yandsearch,text=china+and+African+resources=213>
7. Chinese president's special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capital of China. 2012. 19 July // Xinhua news.
8. China and Nigeria sign \$1,1 bn deal// BBC News. 2013. July.
9. China's Africa Envoy discusses China—Africa Relations // APC Communique. Boston University African presidential center newsletter. Special Report. Fall 2012.
10. 中国将向非洲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 // LENTA—RU. 19.07.2012
11.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0. Wash.World Bank. 2011.
12. China's Africa Envoy discusses China—Africa Relations...
13. China Daily. 2012—10—13 // 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12-10-13/content_15814871.htm

14. Shinn David H. Emerging Powers in Africa. Introduction to African Security Issues. Africa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Wash. D.C. 2012. 4 May.
15. India Investing in South Africa and Africa. KPMG. 2011. P. 18 // rpmg.co.za.
16. Zuma to BRICS: invest in Africa's growth // South Africa info reporter. mth. 2011. 15 Apr. // <http://www.southafrica.info/community/disclaimer.htm>
17. Shelton Garth. China:Transport Network Partner for African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China Monitor. Issue 49. 2010. March.
18. Global Post. 2010. 27 June.
19. China provides loans to Tanzania.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Dar es Salaam. 2011. 23 Novem. // <http://www.focac.org/eng/zxxx/t880448htm>.
20. China's Reform at a Crossroads. Regional Focus: China—Africa // The China Analyst. 2012. Apr. // <http://www.thebeijingaxis.com/tca/editions/the—china—analyst—apr—2012/123>
21. Eisenman J., Kurlantrick J. China's African Strategy // Current History. 2006. May. P. 219—224.
22. ИТАР—ТАСС. 25.12.2009.
23. Show Wang Mai Tian. The West's Neo—colonialism in Africa Unmasked. 2011. 7 July // www.focac.org/eng/jlydh/mtsy/t837629.htm
24. Chinese president's special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25. Ibid.
26. Xi's visit starts new era of China—Africa ties//China Daily. 2013. 16 June //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3—03/31/content_16361873.htm
27. Strauss Julia C. China and Africa Rebooted: Globalization(s), Simplification(s) and Cross—cutting Dynamics in South—South Relations// African studies Review. 2013. Vol. 56. Issue 01. 2013. April. P. 155—170. Published online. 2013. 20 May.

28. Li. Anshan. China's Engagement in Africa — Singular Interest or Mutual Benefit? Expert round table on resource government in Africa in 21st century. Beijing University, 2007. P. 1—5.
29. Sautman Barry and Yan Hairong.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hina—Africa Links// China and Africa: Emerging powers Patterns in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camb.:. Cambridge Univ.Press, 2009. P. 178—209.
30. The Chinese Impact: Africa's Ambiguous Ally. Positioning the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in China—Africa Research // The China Monitor. Issue 58. 2011. Jan.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Stellenbosch University.
31. Pan Ester. China, Africa and Oil.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6. 12 Jan. //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9557>



谢尔盖·沙尔科

民族研究大学高等经济学院
哲学系东方学系副教授
政治学副博士

shuaige@bk.ru



中亚作为欧亚地缘政治中心：新的可能性还是幻觉？

新危机后时期的地缘政治导致增大对发展中经济和地区的兴趣。因为世界各大国关于英美自由经济发展模式最能适应全球化进程和危机的谬论破了产。而新的发展地区之一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孜别克斯坦。尚未全面利用自己的自然资源。

中亚地区和与之相接的里海地区蕴藏着超过科威特、墨西哥湾和北海产地的天然气和石油。极其重要的交通网通过苏联后欧亚

*Сергей ШАРКО, Доцент отделения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факультета философии НИУ ВШЭ,
кандидат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наук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КАК ЕВРАЗИЙСКИЙ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НОВ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ЛИ ИЛЛЮЗИИ?*

空间，能连接西方和相当遥远的欧亚东部地区，打开通向印度洋的“窗口”，使中亚原料通过马六甲海峡流向日本、南韩和美国，还可通过东南方向陆路到达中国。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刚刚在世界财政危机时期的全球震荡中苏醒，就激化了争夺地缘政治空间的国际竞争条件。全球资源、战略交通和世界关键地区仍然在世界地缘政治视野之中。从最近事件看来(美国就俄罗斯和中国阻止通过阿盟在美国默许下提出的制裁叙利亚决议后于联合国安理会的歇斯底里、欧洲国家封锁伊朗石油出口)，美国开始玩弄新的对峙情节，要中亚和其他地区一起扮演自己的角色：它应等待西方国际联盟要求对地区施加政治压力的时刻，因为美国继续把它“固定”和“冻结”到好时机，暂时只是在它不满意的周边和附近国家激化局势。

使中亚局势尖锐化的不仅是国际经济扩张的交叉，而且是中亚个别国家统治阶层内部狭隘的氏族自私和与全民族利益的冲突。何况中亚空间在苏联解体后仍然内部不稳定。个别国家和地区的认同进程总体艰难而矛盾。例如，素称最亲俄政治家的吉尔吉斯新总统 A. 阿特姆巴耶夫背向俄罗斯。

俄罗斯可能失去在中亚的关键军事设施。吉尔吉斯现政府就保持俄罗斯在吉尔吉斯康德空军基地问题试图拒绝承负对俄罗斯的债务责任和集体安全条约范围内的国际义务，怀疑2009年二月建立的集体快速反应部队(К С О П)的战斗力。这可能导致吉尔吉斯将来为了更慷慨的玩手(中国、美国或土耳其)而重新审议与俄罗斯的一系列大型经济基础项目。可是，参加与世界强国地缘政治游戏的吉尔吉斯上层很快地忘记了同乘一条船的地区国家之间相互的脆弱性，2010年吉尔吉斯总统 A. 阿特姆巴耶夫上台之前的全面危机和革命表明了这一点。

从新的国际政治观点看来，对作为欧亚地缘政治中心的中亚自我认同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趋势。第一，是研究中亚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政治和其他程序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中亚的政治局势摆脱了俄罗斯控制，为邻近的中国，一系列其他国家和世界势力中心的影响开门。在这种情况下中亚是什么呢——是苏联后地缘政治区还是对世界大国扩张的开放区？

第二种趋势——这不仅是世界危机的影响，而且是在全球化和地区化条件下全球地缘政治对现代中亚国家上层对待新趋势的外交态度的影响。在美国慷慨承诺经济援助，而地区个别国家希望立即得到军事或其他合作的好处时，完全可以预测对中亚外交政策的形成采取各种战术手段。可是中亚个别国家外交政策的更新能否给予自己人民新的实际可能性还是会导导致新的幻觉呢？国际相互作用的实际结果将如何呢？是合作还是对峙呢？

“中亚地区”概念的地缘政治意义

“中亚”概念在世界政坛的启用是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轻易地提出的。1992年他在中亚国家峰会上建议放弃“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定义，把它改为概括苏联后该地区所有国家的“中亚”¹。按H. 纳扎尔巴耶夫的想法，这个概念象征苏联后，或冷战后的新的地区的形成，其中包括在世界社会上得到主权国家地位的前苏联五个共和国。

这个概念的地缘政治内容很广。这个概念不但体现了对民主自由的欣快，尝到了独立作出决定的滋味和希望尽快脱离俄罗斯的执政上层的政治雄心，也体现了对于在不无他们参加之下破坏了的苏联系统废墟上独立社会经济发展的担心。在地缘政

治上新的概念象征三重结果：第一，确定新独立国家趋向传统政治和经济联系的共同进程；第二，在世界政治上固定其国际法律主体的地位；第三，保障最佳的长期的共处，包括共同的发展，尽管不能防止整个地区范围内的某种不良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变化。

在国际政治方面“中亚”概念正中美国和西方大国下怀，因为它以新的方式表明美国从大苏联地缘政治空间分化开始以来盼望已久的影响全球划分时代的到来。新的定义的确成为各独立共和国脱离作为前苏联法律继承者俄罗斯的政治象征。M. 奥尔布赖特 — 3. B. 布热津斯基理论在新的地缘政治条件下挑选打击中亚的俄罗斯交通系统不是偶然的。这是利用类似丝绸之路的现代计划来孤立俄罗斯的主要方向之一。

美国克林顿政府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1998年十二月9日对法国“世界报”的谈话中最准确地阐述了她的新理论。她在谈话中公开说：“今后北约不应该也不会按照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行动。否则北约将不得不服从联合国。北约不应该成为安理会否决权的人质。北约的主要力量在于它将绝对独立地行动和作出决定。衰退的联合国威信应该坚决地加以清除”²。

上述理论在C. 亨廷顿的解读中把丝绸之路的复兴联系到正在形成的欧亚人民跨文明协作系统的文化文明矛盾。按照“文明冲突”逻辑，未来丝绸之路的全部空间安全问题的解决旨在保护中亚认同脱离与之敌对的文明。

结果，与西方人为地鼓吹的新历史复兴相关的地区自我认同程序相反，强化的不是地区的向心机制，而是离心机制。例如，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外交关系学院(大学)分析中心主任安德烈·卡赞采夫在评论外来干涉和在中亚占上风的离心趋势时认为中亚国家的软弱和地区的重要的地缘政治作用促使各大国

高度卷入地区事务，实际上在进行“大搏奕”³。可以同意他的看法，中亚各国自己没有表现团结的意愿，因而不可能对抗离心趋势。

今天大概谁也不会否认中亚所有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趋势是民族主义成分的增大。民族成分涂上了历史色彩，矛盾地反映在地区国家双边关系和整个国际关系上。这样，形成的国际关系系统就产生变动。大概正因为如此，热衷于Дж. 布什的反国际恐怖主义斗争的美国国务卿赖斯没能使外国投资者相信美国在中亚的新的全面的交通计划的安全性和前途。К. 赖斯的阿富汗野心没能保障中亚各共和国绕过俄罗斯进入世界能源市场，这对于美国来说是否又一个错误呢？地区的其他玩手正在努力进入中亚空虚的交通基础设施地域。

X. 克林顿的理论中也常使用“中亚”概念，因为按巴拉克 奥巴马的全球战略重心是在2014—2024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兵后转向发展此地区。可是美国这个定义是完全可以预测的，如果不称之为合符规律的，美国地缘政治变态。现在美国的地缘政治理论中用新的，近似原有的概念“大中亚”⁴。中亚地区著名政治学家弗列杰里克 斯塔尔认为应该扩大其范围，除上述五个国家之外增加阿富汗共和国。

斯塔尔构建的美国地缘政治新腔调符合“分而治之”原则，美国和欧洲人认为这在欧盟和北约东扩政策中已进行了成功的尝试。否则就难于解释，尽管欧盟有解体的威胁，刚刚签订了遵守财政纪律公约，又说要依靠吸引塞尔维亚加入来扩大欧盟，甚至不担心它可能有希腊那样的命运。

美国南亚和中亚事务局助理罗伯特·布雷克(X. 克林顿的助手)相当详细评论了X. 克林顿的旨在依靠在中亚交叉的六个交通走廊和土库曼—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管道扩大美国和中

亚国家伙伴关系网的理论。按他的说法，削弱了的阿富汗与中亚一体化对美国在中亚的所有伙伴都有好处，可使它们走向民主道路。吉尔吉斯在2010年的革命中头一个走上了这条道路。他在华盛顿关于中亚的论坛上发表讲话阐述这种想法时声明：“X. 克林顿公布对新丝绸之路的看法之后立即得到了中亚国家的接受”⁵。

P. 布雷克强调，美国的努力在于通过帮助建设公路、桥梁、石油和天然气管道、铁路网来支持中亚所有国家，从而使阿富汗较容易接近邻邦。他认为，如果阿富汗坚决和地区经济一体化，对它有私营投资就会有较大的吸引力，从而使本身得到发展，从自然资源中得到好处，也为自己公民保障经济可能性。

X. 克林顿认为地区所有国家都会采取加强和阿富汗一体化的步骤。乌孜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能折价供应电力，乌孜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协助扩大与阿富汗的铁路联系。哈萨克斯坦可以帮助阿富汗大学生得到教育。为了证实这种看法，P. 布雷克提到了所有中亚国家参加最近在伊斯兰堡与波恩举行的关于阿富汗会议的事实。两个会议上一致同意为阿富汗未来发展共同努力。他说，不存在阻碍实现X. 克林顿亲自制订的丝绸之路新计划的障碍。

X. 克林顿的美国计划及时准备中亚国为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承担国际责任。美国在财政危机时期已把债务、财政赤字和滥印美钞等类似责任转移给了地区 and 世界各国。例如，继俄罗斯之后发展了市场经济的哈萨克斯坦比中亚其他国家更多受到了世界市场财政震荡的损害。和世界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哈萨克斯坦银行系统受到危机的损害最大。它利用了房贷、股市投资、发展证券市场的现代方式。

这就是哈萨克斯坦虽然有强大的工业综合体，拥有巨大投资资源，今天却碰到严重问题的原因。这些问题和借方缺乏支付房贷能力、它们大批破产、银行收入减少、投入证券市场的资本贬值密切相关。

乌孜别克却相反，它避免了和世界财政危机相关的大部分问题，因为它的经济和世界市场一体化程度较低。乌孜别克经济的实际部门依靠薄弱的银行系统。民族经济的调节性降低受到投机资本的影响的因素，尽管这并不能防止通胀的上升、国内总产值的下降、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的减少。

而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却经受了系统危机，其特点是经济所有部门的下跌。高通涨率使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经济的实际部门下跌问题更加严重。

这样，危机后时期给这些共和国带来了不少问题。看来，中亚国家需要为其政治服从美国和为阿富汗战争的后果付出巨大代价。

很明显，美国统治集团在中亚的长期战略方针是把它作为军事物资转运区和美军基地部署区。美国从2001年的布什外交理论开始在中亚实现其战略。按照不同的地缘政治理论，美国当今的政策将持续到保障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新国际关系系统形成程序的结束。

可是，受到自己的政治和军事上层思想熏陶的美国的政治战略家们是否想到过X. 克林顿的2014—2024年计划（按美国理想的尺度编写的）有多少合理性呢？在美国传统的政权更换及其政权可能的错误后果条件下，它是否符合政治行情呢？是否计算过美国在中亚争取影响的竞赛中失去主动的错误外交理论的价值呢？最后，美国计划是否符合中亚现实呢（在美国建设议迟到的背景下）？要知道，今天中亚的战略局势已经根本

改变。怎样考虑中国影响不断增大的后果呢，如果它越来越坚决地发展自己的西部省份(不可想像它没有突破的发展，像是向中亚地缘政治区的一种跃进)?

中亚地区地缘政治脆弱的主要因素

今天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政治、文明关系是否已确立，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中亚联合不同经济系统的国家，它们的政治、战略各异，在较低的程度民族和主要信仰也不一样。

现在中亚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它们可作为正面的，也可作为反面的因素。第一，这是地区的相当完整的领土关系，它恢复了内部各国和邻近国家的边界，没有超越苏联后边界。

中亚内部领土边界划分问题没有成为潜在的冲突，尽管也导致了一些边界摩擦。原因根源于苏联时期中亚各国之间关系的历史性质。正如俄罗斯历史学家Г. Д. 阿加福诺夫指出的那样，“边界摩擦是社区性的，首先涉及到耕地、水源和交通自由的争议。政权自然要作出反应，但是，尽管内外都存在非建设性的，希望地区不稳定的势力，不会出现国家之间严重的矛盾，更不用说在这些基础上的冲突。除土库曼之外，这里所有国家都加入了欧亚经济共同体、上合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其潜力能够保障调解各成员国之间的摩擦”⁶。

而美国中亚专家Ф. 斯塔尔却反对“大中亚”理论。和Г. Д. 阿加福诺夫相反，他认为中亚国家曾受到苏联的扩张，现在那里仍存在俄罗斯积极扩张的进程。

可是，类似的观点奇怪地否定历史上中亚各共和国都在苏联版图内的事实本身。何况可以指出，个别的苏联共和国在苏联解体后固定在它们以前没有的边界上。例如，现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巴甫洛达尔已不是俄罗斯城市，而是哈萨克斯坦城市。此

外，还有别的国家的观察家的鉴定评价。例如，俄罗斯科学家们注意到，印度从它对中亚国家相互关系的研究中作出了结论：“在中亚各共和国之间关系中，与之脐带连接的是俄罗斯，而不是中国”⁷。

今天边界摩擦的典型例子是2009年六月十日乌孜别克斯坦单方面在安集延州沿着它和吉尔吉斯边界建立了三米高的隔离结构。两国之间存在一些争议的领土。不过。按双方协议，在最终确定划界之前都不采取单方面行动。

至于中亚国家和中国的领土问题，存在它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的专门条约和协议，例如，2002年五月十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划分国家边界的议定书，完成了哈中1782公里边界划分的法律手续，其中1215公里是陆界，567公里是水界。

现在调解中亚国家和中国边界进程的政治方面已得到了自己的科学理解。与此同时，中亚媒体就中国对中亚边界政策有不同的看法。C. 巴格达萨罗夫认为，“中国在苏联解体后于中亚奉行极其积极的政策，首先是得到不大的，往往是难于到达地区的领土。得到这些领土是它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还有和俄罗斯（例如，得到了阿穆尔地区的一些领土）关于争议领土谈判的结果。中国到处建立划分争议领土的委员会，尽管苏联解体前没有这种争议领土。例如，塔吉克斯坦把难于到达的一千平方公里的穆尔加布地区划给了中国。我到过那里数次，可以断言在这个高山地区（海拔五千公里）没有任何珍贵的东西，但这是战略地点，将来可以控制戈尔诺 — 巴达赫尚自治州，特别是通向费尔干纳盆地的道路。在这个地区，中国对塔吉克斯坦有2万8千平方公里的领土要求。面积相当于今天的亚美尼领土⁸。

除了积极领土扩张之外，中国在经济方面特别活跃。例如，中国十分注意中亚的战略地点，将来它们可能成为争取对欧亚纵深地区影响的有力的论据。

因此，引起担心的绝不是俄罗斯政策，相反地，是在解决中亚领土问题时排除俄罗斯作用的后果。此外，按俄罗斯汉学家 A. A. 马斯洛夫的预测，“最近几年在中亚国家居住的中国人将达到8百万，他们将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⁹。而且8百万之中2/3将在哈萨克斯坦居住。A. 马斯洛夫认为，“这正是中国的西北政策方向。因为和哈萨克斯坦接壤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近人口激增。现在为3千万，这已不少，很快地人口将达到1亿，结果它将向外“溢出”¹⁰。

西方媒体在讨论全球危机时期中国于中亚建设交通设施政策的积极化。英国分析家们写道：“在富裕国家为挽救银行而投入亿万资金时，中国平淡地宣布了投资1000亿美元的计划，它旨在建设连接难于到达的中亚与世界链接的公路、铁路。最近几十年将建设二万多公里的铁路，以便把中国商品运往中亚，而把石油和矿产运到中国。通向俄罗斯、欧洲、伊朗和巴基斯坦的铁路成为现代模式的丝绸之路。预料，在最落后和隔离的中亚国家都寻找外国投资的时刻实行的这种计划，能刺激地区和全球市场的已迟到了的一体化”¹¹。看来，最近几十年发展的中国在碰到和中亚国家调解边界的政治问题时，将立即宣布该地区为自己切身重要的地缘政治利益区。

第二，中亚的下一个特点不是地区边界，而是它的结构。从地区作为欧亚东部地缘政治中心的认同观点看来，后者引起特别的兴趣。中亚是结构极其复杂，人民和新国家结构关系矛盾的民族分散地区。由于已形成的历史联系被损害，中亚结构不适应外来的影响。它的每一个原来为前苏联成员的组成部分，都是原来高

度中央集中制国家的共同、完整生活系统的协调的，不可分割的单元。统一政治系统的失调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亚全面排挤俄罗斯人的政策导致的，而俄罗斯同胞们在前苏联境内复杂矛盾的处境使情况更加严重。

俄罗斯政治家和科学家H. A. 纳罗奇尼茨基指出：“对俄罗斯人发生的情况在世界法律和历史上都无先例。这里指的不是俄罗斯人在外国，不是加入早已在按自己时代的法律准则确认了的国家（这样变为少数民族自然是合符规律的），而是统一的俄罗斯人民在它自己的国家境内被任意划分”¹²。

俄罗斯政治学家们认为中亚内政方面，仅仅面向民族成分的认同进程越来越分离多民族国家的人民。

在国际政治方面，中亚是全球（美国、欧盟、日本）和宏观地区（中国、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印度、富裕的近东国家—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还有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玩手的多方向地缘政治、地缘战略、地缘经济利益结构对接的“断口”。尽管中亚的个别民族共和国按不同方式纳入地区进程，后社会主义进化的共同系统问题的存在，构建这些国家围绕俄罗斯作为重新接近背景下恢复苏联后空间经济整体的核心的进程。唯一的例外是土库曼斯坦，它除了独联体外再没有参加任何一体化集团（上合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共同体、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

土库曼斯坦带有孤立和部分违反地区化趋势的特别政治立场并没有扩大土库曼领导人外交的自由，相反地使国家处于地区进程的边缘。土库曼希望避免某个外国影响的中立政策会影响中亚的稳定吗？

俄罗斯科学家们认为，“如果阿什哈巴德不为美国控制中亚和里海地区，还有北约的东扩造成困难，原则上它可能得到美国的

宽容。可是，如果美国想在土库曼部署基地，例如，如果它决定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土库曼领导大概不可能保持中立。因此，奉行这种方针的土库曼可能与其愿违，在保持中亚稳定方面起非建设性作用。看来，该国的军事领导对此已开始理解”¹³。美国在马丽镇建立军事基地并通过该国运输军用物资增大整个地区地缘政治的脆弱性。随着伊朗政治局势因国家总统选举、核计划，还有与邻国的影响(以色列)相关问题导致的恶化，美国将加强对土库曼领导的施压，土库曼斯坦的外交重点也将随着新领导的执政产生变化。

外国专家们认为，“在土库曼斯坦出现较为激进的演变，新领导人古尔班古雷 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宣布向外国投资开放，结束了前任把国家引入的多年孤立。土库曼斯坦成为各石油公司关注的目标，而俄罗斯、欧洲和中国正在争夺该国的天然气资源”¹⁴。他们认为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善于使投资者进行利益争夺，而今天他的最重要目的是使外国资金用于改革处于落后状态的农业和社会方面”。

危机后时期在中亚的俄罗斯因素更明显了，因为西方国家失去了投资能力，在世界财政危机中把资金用于挽救自己的经济。欧债危机并非仅仅因为没有钱。它揭示了其经济发展模式的缺陷。因此，仅靠投入资金不会得到所期望的结果。希腊国内总产值仅占世界经济总值的0, 3%，然而，2010年以来，该国的信贷危机已成为全世界许多麻烦的根源。相反地，中国的投资能力实际上变得取之不尽。中国利用巨大的“价格漏斗”积累了超顶的外汇储备，现在推动多元化转型，从它的稳定和地区的中国伙伴们，包括日本与金砖国家之间双边交易的采用看来，人民币开始成为地区货币，以后将成为世界货币。

第三，中亚较容易受到现代世界和地区趋势的影响。它得到越来越多的跨国和边境经贸合作的特点。中亚国家尽快地并以最小损失克服世界财经危机后果的追求是促使向国际协作更加开放的新的动力。可是，地区进程的背景却是民族经济痛苦的市场演变，各方面——燃料动力、原料资源、还有与得到淡水资源相关方面战略竞争的激化。

中亚地区地缘政治影响增大还是面临解体威胁？

从地缘政治脆弱性因素影响的观点看来，作为欧亚地缘政治关键中心的中亚的认同对这些国家生活具有原则意义。地区的战略局势矛盾而复杂。它表现在国际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威胁的增大、个别新国家内部政局的不稳定、它们的外交方向不一、在银行方面严重的危机现象、经济的工业方面停滞、财政赤字、国内总产值增长速度的下滑等方面。

地缘政治中心在国际舞台上可以作为这些国家和整个地区的某种盾牌而行动并防止其可能的脆弱的后果。这种盾牌得到了自己的用场：2005年上合组织按乌孜别克斯坦请求要求美国撤除在乌孜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的军事基地。可是，尽管出现了在多方结构，例如，在上合组织地区反恐结构水平上转向保障各国安全问题的趋势，个别国家仍倾向采取模棱两可的立场。

执政集团有时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军事政治上和非地区的大国合作。阿特巴耶夫在竞选过程中曾许诺关闭美国在马纳斯机场的空军基地。俄罗斯曾打算给予经济支持，从欧亚经济共同体基金中提供1亿零6百万美元优惠贷款和俄罗斯自己的3百万美元贷款。可是吉尔吉斯的立场改变了，他的领袖没有兑现诺言。他的前任K. 巴基耶夫也曾进行过类似的

政治交易，得到了俄罗斯预付的1亿5千万美元赠款和3亿优惠贷款

俄罗斯希望达成关于联合自己在吉尔吉斯的所有军事设施的协议，有效期为49年并可自动延长25年。俄罗斯在哈萨克斯坦租用四个军事试验场和宇宙综合体“拜科努尔”，租用期延长到2050年，还建立共同的火箭综合体“拜捷列克”。

地缘政治中心在控制进入极其重要地区或拒绝他人得到资源方面有特别的作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使中亚个别国家面临被排挤到靠边站的严重危险。因此，这些国家最好站在一起。可是，在中亚的一体化趋势方面应该指出其经济方面共同的系统问题及其形势的矛盾性质。正是许多悬而未决的和新出现的问题使中亚国家在控制共同的地缘政治空间方面失去政治机动的可能性。必须加速现代化，更全面利用资源(通过利用财政、工艺、生产分工合作、人口等方面的办法)。还需要建立面向出口的生产，同时要考虑进入国外市场的复杂性。

在地区和全球市场已形成了残酷的国际竞争，并已清楚其中的强者和弱者。例如，东亚国家依靠自己发展模式的特点，包括中国模式，显示出了自己的优越性，尽管世界经济和财政系统危机后存在不良后果。这表明中亚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的必要性，同时又表明地区的个别国家系统清洗民族战略资源的危险性。

中亚地缘政治中心在新的东亚空间的存在本身对较积极的邻邦有重要的政治和文明后果。地区能否保持自己领土和文明的完整并对境外产生影响呢？在中亚可以看到对地区完整造成威胁的复杂局势。暂时在中亚还没有划分境外和世界大国影响区，也还没有确立强大的地缘经济中心。可是地缘政治的草图，至少是在理论上已经存在并在更新。

大批国家，诸如反美的伊朗、亲西方的土耳其、美国、中国等国都在向中亚提出自己的地缘政治计划。中亚局势的复杂在于它在文明、认同问题的解决过程在通过自己历史文化复兴阶段。中亚心态代表们自己就声明：“今天没有一个前苏联国家不在庆祝宗教的复兴”¹⁵。

伊斯兰帝国思想活着并在伊朗领袖们的政治文化与觉悟中复兴，而与之相对立的是土耳其的新帝国野心。随之苏醒的是曾和土库曼斯坦、乌孜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土耳其纳入统一的波斯阿契美尼德国家的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的地缘政治追求。土耳其新民族主义者看到以土耳其为首的突厥人民的新使命——主宰里海地区和XVI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当时没能征服的整个中亚地区。

结果，个别中亚共和国重新审议自己未来发展的理论基础，越来越考虑伊斯兰国家的建立。例如，地区的一个软弱代表之一——塔吉克斯坦可能变为伊斯兰国家，其中政治领袖同时是宗教领袖。这不可避免地带来政治后果。专家们预测：“考虑到穆斯林国家的经济和其它方面实力，塔吉克斯坦专家们一致认为，他们国家不可能忽视和同信仰兄弟们的亲近。第一，可能和伊斯兰国家亲近，而和俄疏远。例如，不久前恢复了国家首脑名字书写的民族方式。

值得提到的是，恢复名字书写的民族方式并没有什么宗教的东西，但可以看作是疏远俄罗斯的又一步骤。这种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却使俄罗斯政治家们不安。此外，还要提到的是总统Э.拉赫曼和伊朗总统内贾德的经常会晤，去年共进行了四次会晤，建立了塔吉克斯坦、伊朗和阿富汗的统一的波斯语电视。再者，塔吉克斯坦总统还经常访问阿拉伯世界各国。这种访问的比重在增大。所有这一切在塔吉克斯坦看作

是国家生活的民族复兴。而外国观察家却认为这是对俄罗斯的疏远¹⁶。

伊斯兰因素有何危险呢？一方面，没有被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用作政治斗争工具的激进组成部分的伊斯兰是正面的潜力。宗教资源在确定认同方面有助于团结，从而导致社会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不同的恐怖主义组织正在利用伊斯兰思想于欧亚东部不同地区建立大型的伊斯兰哈里发。这样，在这种地区化情况下，穆斯林领袖们变为旨在控制地区有前途的原料资源区的境外大国的全球战略机制。

“中亚地区”能否对境外产生影响呢？按照国际影响指数排名，俄罗斯继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之后进入了前七名。至于苏联后的中亚国家，在这里，俄罗斯指数不无道理地远在哈萨克斯坦、乌孜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前头。国际影响意味着国家引起其它国家行为改变，为自己利益影响国际环境的能力。

影响潜力意味着国家施加影响的各种手段和资源。影响的文明因素在东亚有特别作用。中亚文明影响根源于历史过去。乌孜别克斯坦民族趋势的加强和东亚未来统一国家思想复兴相关。这种一触即发的思想的论据根源于帖木尔帝国，它在XIV—XV世纪曾是从伏尔加河和高加索山脉到印度的中亚政治中心，首都设在撒马尔罕。乌孜别克斯坦政治和军事上层的个别集团关于把中亚人民（维吾尔人，哈萨克，土库曼，塔吉克，吉尔吉斯，蒙古，普什图人，哈扎拉人等等）团结在乌孜别克人民周围的主观情绪使邻邦不安，特别是中国。

这些和其它在历史民族趋势基础上团结不同人民的思想是非建设性因素之一。这不仅可能导致中亚邻国边界的变化，而且会启动难于预测的地区和整个世界地缘政治演变机制。非建设性因素

的外来作用，中亚人民带有宗教情绪的民族复兴思想可能损害中国内部的政治稳定。

地缘政治的变动可能从中国新疆开始，因为那里还没有解决作为在中亚有根源的“人民划分”问题的维吾尔分裂主义问题。与此同时，伊斯兰因素的重要还在于它和维吾尔分裂主义可能对中国西藏佛教问题起催化作用。不稳定波浪也涉及其它国家。未来威胁的规模已引起不安。专家们指出：“中国有所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它和阿富汗巴达赫尚，瓦罕走廊，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穆尔加布区接壤。主要居民是属于突厥族的维吾尔人，和乌孜别克族接近。一些极端主义集团在自治区境内活动，它们在奥运会之前曾在北京制造了几个恐怖事件。它们和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斯兰东突党”密切合作。2002年出现了“乌孜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改名问题，头一个方案是“中亚伊斯兰运动”，其中应纳入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激进集团。因此，在反恐怖主义斗争中俄罗斯和中国应相互协调行动¹⁷。

这样，中亚地缘政治影响的增长受到正面和反面因素、趋势和反趋势的碰撞。美国能妨碍俄罗斯和中国加强和中亚国家的协作吗？

对于美国，其地缘政治追求是建立由中亚国家、阿富汗和近东组成的封闭环。如果它变为不稳定区，美国全球霸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将首先成为对俄罗斯和中国的雄辩的论据。

正如俄罗斯专家们指出的那样，美国控制中亚的军事政治计划“使有可能制造亚洲大陆深刻的裂缝并划分俄罗斯和印度、俄罗斯和中国西部、它们和伊朗之间的某种分界地带。这条分界地带可能从北约的亚洲堡垒土耳其开始直到蒙古，并纳入“征服了

的”伊拉克、“安抚了的”阿富汗和“奔向”北约的格鲁吉亚、“吸引加入的”阿塞拜疆和其它一些中亚国家。在经济上这将使西方控制整个里海和中亚石油地区，在政治上使成为能有影响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中国西部和印度北部局势的杠杆。因此，在中亚，一方面有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另一方面则有俄罗斯、中国、印度以及与之协作国家的利益。因此，这里的严重的矛盾可能导致直接的对峙”¹⁸。

美国激化伊朗问题，希望控制波斯湾岸边和里海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产地，从而深入亚洲，直到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美国在中亚战略存在的计划中十分注意蒙古，目的是深入离间中国和俄罗斯，达到确立从地中海到外贝加尔和戈壁滩的隔离带。如果美国能在蒙古部署“预警飞机”的空军基地，它将有可能控制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大片土地，并且控制中国中部的很大部分地区。暂时美国对此还只能从宇宙进行监督¹⁹。

* * *

总之，可以说，中亚作为欧亚地缘政治中心的认同进程尚未结束。中亚作为冷战时代之后形成的新地区为世界地缘政治的演变作出贡献。地区进程对于任何预测都相当复杂。各个新的共和国经过了否定苏联过去的阵痛，它们还将不止一次地依靠全球化和地区化，利用在它们面前出现的可能性，还将在和世界地缘政治重要玩手接触时，由于追求不现实的希望而受到幻觉的影响。

它们的独立存在已第三个十年了。新一代已成长，他们没有对和俄罗斯的过去关系的怀思。与此同时，中亚劳动移民却朝向俄罗斯。如果出现对地区稳定的实际威胁，中亚国家将会比苏联后

在欧洲部分出现的新国家表现出更大的团结性。中亚虽然有许多问题，但它越来越迈向和有俄罗斯、中国参加的一体化，而不是朝向孤立的地区化或者趋向形成不同形式的单独国家。与此同时，有个别的共和国在和俄罗斯疏远，倾向伊斯兰世界。

1. 媒体常用这种定义，可是从中亚地理科学观点看来，这是大得多的地区，除了中亚之外还有蒙古和中国西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持这种观点 // http://ru.wikipedia.org/wiki/Центральная_Азия. 中亚
2. 奥尔布赖特理论。信息分析网址“遗产” // http://old.nasledie.ru/politvne/18_18/article.php?art=29
3. 卡赞采夫 A. 中亚:地区发展趋势10.07.2013 // http://russiancouncil.ru/inner/?id_4=2091&from=aug13rus#top.
4. 看.:斯塔尔 C. Фр. В保护大中亚。华盛顿，哥伦布区:中亚和高加索研究所与丝绸之路研究计划 2008.
5. 布雷克 P.O.美国在中亚政策 // <http://www.state.gov/p/sca/rls/rmks/2012/182643.htm>
6. 阿加福诺夫 Г.Д. 欧亚东部战略局势和主要矛盾结 M., 2007. С. 125.
7. 扎杰列伊 Н.В. 上合组织发展问题研究综 // 克利緬科 А.Ф. 上合组织发展的新边疆 M., 2008. С. 396.
8. 博格达萨罗夫 С. 中亚是世界政治关键地区 // 俄罗斯杂志 1997—2008 // <http://www.russ.ru/layot/set/print//Mirovaya—povestka/Centr—azia.html>
9. 马斯洛夫 A.A. 最近在中亚将居住8百万中国人 // <http://dknews.kz/v—centralnoj—azii—v—blizhajshie—gody—budut—prozhivat—8—mln—kitajcev.htm>
10. 马斯洛夫 A.A. 新维吾尔自治区变得接近些. 5百万中国人移居哈萨克斯坦 // <http://www.russianskz.info/politics/3126—a—my—k—vam—5—millionov—kitaycv—pereselyatsya—v—kazakhstan.html>
11. 戈尔斯特 И. 石油丰富，遥远而复杂的中亚地区没能避开震动世界之点 // The Financial Times. 2008. 30 Oct. // <http://www.centrasia.ru/newsA.php>

12. 纳罗奇尼茨卡娅 Н.А..俄罗斯和俄罗斯人在世界历史上 М., 2003. С. 334.
13. 阿加福诺夫 Г.Д. Указ. соч. С. 81.
14. 戈尔斯特 И. Указ. соч.
15. 阿萨杜拉耶夫 И.塔吉克斯坦有无出现伊斯兰国家的基础? 2009. 17 二月
<http://www.easttime.ru/analitic/1/10/573.html>.
16. 同上.
17. 巴格达萨罗夫 С. Указ. соч.
18. 阿加福诺夫 Г.Д. Указ. соч. С. 71—73.
19. 同上. С. 81.



伊戈尔·莫尔古洛夫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俄罗斯和中国：历史和现代 对一本书的三种意见

由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主持出版的集体专题书“俄罗斯和中国：四个世纪的相互关系”（“俄罗斯和中国：四个世纪的相互关系” / А. В. 鲁金编辑，世界出版社出版。2013. 704С）是把我国汉学推向新高度的新的科学著作。

我们两国四世纪以来一直是邻邦，俄罗斯和中国独特的文明在四个世纪相互影响。

*Игорь МОРГУЛОВ, Заместитель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Андрей ДЕНИСОВ, Чрезвычайный и Полномочный Посол России, в КНР, кандида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Александр ЛУКИН, Проректор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МИД России, доктор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ТРИ МНЕНИЯ ОБ ОДНОЙ КНИГЕ*

诚然，双方关系在这些时期有过不同的阶段。主要事件环节众所周知，其中有过不少复杂时刻。但原则重要的是，这些问题从未导致大规模的冲突，我们两个相邻大国之间从未有过真正意义的交战。

四个世纪它们经常和积极联系、通商、乐意地交流精神思想方面的精华。我想特别指出的是，两国的先进人物向来希望俄罗斯和中国和平友好睦邻相处，在所有各方面密切合作。

代表各个科学中心和高等学校的作者们不仅分析了俄罗斯—中国关系的复杂进程，而且描绘了它们建立的立体图景。很自然，两个相邻大国对共同历史某段时期的评价可能并不吻合。这几乎是不可能。然而，评论著作中无成见的科学分析是符合需求的。

今天形成的关系被称为现代俄中联系史上的最佳模式是合理的。集体专题书深入浅出地阐明通向现代战略伙伴关系的道路并不平坦。与此同时，它证明今天关系的质量并非人为的政治行情结构。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反映双方四个世纪联系中表现的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深刻趋势。

值得指出的是，问世的此著作不仅有普及知识的意义。它有助于从战略高度对待俄罗斯—中国伙伴合作的实践，以便继续强化它的优越性，增进相互谅解和信任。我们两国领导人正是提出了这样的任务，2013年三月中国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莫斯科的正式访问，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广有成效的谈判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毫无疑问，研究俄罗斯—中国关系的新的巨著将不仅会引起广泛的共鸣，而且能对深入两国友好联系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

安德烈·杰尼索夫

俄罗斯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经济学副博士

今天俄罗斯—中国关系进入了其历史上独特的全面战略协作和伙伴关系水平，毫无疑问，它有远大的发展前途。这种方式并非

某种政治抽想。它对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和平友好相处，在涉及它们根本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积极发展互利的实际合作与人文联系有明显的好处。

登上如此高度之后，在双方关系上值得按照中国哲语——“饮水思源”——回顾走过的道路。

在俄罗斯外交部国际关系学院(大学)外交学院与东亚和上合组织研究中心编写的专题书“俄罗斯和中国：四个世纪的相互关系”的作者们所面临的正是这个任务。这是早已成熟的书，应该承认，这是总结俄中关系史的成功尝试，是今天使有可能全面观察此课题的不多的科学著作之一。对于关心我们和中国关系问题的所有人——科学家、大学生，按职业要求直接从事此问题研究的人们，它都有益和有趣。

专题书是对俄中关系历史、现状及其在国际上范围内前途的集体研究著作，其中包括从XVII世纪到今天的俄中关系的所有时期。外交学院和其它学校与科学机关的主要俄罗斯汉学家参加了专题书的编写。

著作的特点之一，也正是它的强处，在于其中反映的不仅是作者对涉及问题的观点，还有俄罗斯和中国，其它国家的科学家们的观点。这使读者能更全面地了解对所提到的问题的争论性质，从而可以比较对历史事件的不同解读。

历史从来不会像高速公路那样平坦，没有坑洼。其中总会有许多非常时刻，不仅现代人，而且事件发生几十年乃至几百年之后的历史学家都会对它有不同的评价。我确信必须避免历史学的政治化，避免使之成为与科学研究毫无共同之处的意识形态斗争工具。正因为这样，我认为专题书作者们对俄中关系的态度是正确的一不把片面的观点强加给读者，而是为之提供广泛的历史材料和不同研究家对俄中联系史上许多困难时刻的观点。

1980年代末我们两国达到了基于邓小平建议的“关闭过去，开辟未来”方式的关系正常化。根据现代的经验，还可以增加“把历史留给历史学家”。

阅读专题书使有可能总结俄中关系史的主要教训。第一，俄罗斯和中国是两个相邻大国，在相互关系历史上没有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而且边界的划分，虽然也有过并非无痛苦时刻，总的来说是通过和平途径完成的少有范例(作为比较，值得看看俄罗斯和欧亚其它国家边界确立的历史和中国边界的形成历史)。

第二，俄罗斯和中国关系是双赢或双输的关系，这在上世纪特别明显。例如，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和战后肩并肩一赢了。遗憾的是，在1960—1970年代双方关系恶化时，我们输了。

最后，第三，两国相互关系最可靠的基础不是某种意识形态，不是为了反对谁的友谊，而是民族利益的吻合，在国际舞台上对主要程序的立场接近。

俄罗斯和中国对两大国许多世纪相互关系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和事件有不同的观点，这是可以理解的。这很自然和正常。我想，向读者建议的专题书是对两国科学界相互尊重和活跃的对话的郑重申请，其目的是更好地理解相互的立场，从而达到俄罗斯和中国科学界对待我们关系历史问题的态度的接近。

亚历山大·鲁金

俄罗斯外交学院副院长，历史学博士

这部专题书是俄罗斯科学书籍中第一部集中分析两个大陆大国之间全部历史时期相互关系的巨著。也许，对某些人，这句话说得奇怪。因为对两个伟大国家近四百年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已写了大量书籍和文章，一些科研机关专门从事对它们的研究。这确是如此，但事实总是事实：至今不管在俄罗斯还是在苏联，都没有出

版过研究俄中全部历史时期的相互关系的教科书和科学专题书。与此同时，类似的研究著作作用汉语，甚至用欧洲语言出版过。

专题书的新颖之处不仅在于它的全面性和一致性，而且在于它对材料的某些态度。首先谈谈全面性。当然，在一本书中难于阐述一切，在这种意义上任何批评家都能轻易地找到没有描述的，但他觉得重要的某个事件。可是，专题书作者总的来说保持了时间表式的一贯性，尽量提到了俄中关系史上主要的，他们认为关键的，确定了长时期趋势并且引起了较多争议的时刻。自然，本专题书中一些部分的作者阐述了自己对所描述事件的观点。与此同时，和俄罗斯的，特别是苏联的许多著作不同的是，他们没有为自己提出为某种观点辩护，乃至反驳“敌人”和“污蔑者”的任务。相反地，他们在不混淆自己观点的同时，尽量客观地提出他们并不同意的观点，包括俄罗斯的、苏联的，还有外国的，首先是中国研究家的观点。其目的不是为了使读者对叙述的事件确立一定的观点，而是使之更全面了解对某些问题争论的性质，并有可能认识不同的解读和立场。

挑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创作集体不容易。一只脚站在苏联过去，习惯于不是分析，而是攻击和辩护的俄罗斯汉学家太多了。但我们觉得代表几个大型的大学和研究中心的本项目参加者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知情的读者很容易发现，在那些曾与专门为了“向毛主义作斗争”而建立的组织曾有过联系的作者之中，没有在苏联年代反击过“中国修正主义者”和“伪造历史者”的人。尽管所有作者都是俄罗斯人，但许多人曾长期在外国不同的大学和科学中心工作，很了解外国同行的意见和立场。

作者按照已定的任务，用科学语言，客观地阐述材料，没有感情用事。在每一章都专门阐述我们认为同样重要的双方相互关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

现在谈谈取材方式。这里也有一系列新东西。作者们认为著作是完整的专题书，理解每一章都是已完成的研究著作。因此，也为了读者——我们相信其中许多是研究俄罗斯外交的大学生，每一章都对叙述时期作出基本结论。此外，每一章后面都附有主要资料目录和这个时期俄中关系大事表。

我们很重视穿插每一章，在俄中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痕迹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外交家、军人、旅行家、研究家的传记。传记编写是 A. B. 伊万诺夫、A. B. 鲁金和 H. A. 萨莫伊洛夫完成的。

所提到的活动家的作用各不相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但至少是重要的。他们的配有肖像或照片（没有找到肖像情况除外）的传记旨在说明俄中联系发展过程不是抽想力量作用和程序的结果，而是具体的人物，往往是出色的，有其个人目的、困难、成就和激情的人物的活动天地。

最后谈谈重要的创新——中国作者及其作品的名称记录是用汉字写的，不是用俄语译音。采用译音记录的传统是苏联后期形成的，当时大部分印刷厂（不是全部）都没有汉字字版。今天，在新工艺时代，不存在印刷任何文字的障碍，可是许多人仍按传统使用译音。我们认为这毫无意义。不懂中文的人，反正不能理解写的是什么。而懂中文者能更好地理解用汉字写的东西。总之，为什么要贬低伟大的汉语，例如，不像对待英语，而写别的字符呢？不过，为了使暂时不懂汉语者能知道中国名字，在括号里配了译音，而书和文章名称则使用了译文。

头四章把双方关系划分为四个主要时期。第一时期名为“从平衡到殖民主义。俄罗斯——中国关系从诞生到1917年”，即时间截至俄罗斯帝国的解体。这种时间划分有其意义，因为我们在1917年前后对中国态度根本不同。



这一章的作者，著名的汉学家，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学系副主任Н. А. 萨莫伊洛夫冷静而详细地描述了俄罗斯和满清帝国的政策，既不偏袒，也不批判任何一方的态度，尽量客观地表明双方当时行动的机制及其原因。

现于台湾淡江大学工作的教授 А. А. 皮萨列夫写的一章——“内战和革命时代”概括了从1917年到1949年苏联和中国关系复杂转折时期。这是极

其有趣，事件丰富，有许多还未充分研究的时期。当时莫斯科有时支持国民党，有时又对它激烈批评，对中共的关系也并非全是晴天无云。

熟知俄罗斯研究家们、中国、美国和台湾专家们的评价的作者详尽地对它们进行了介绍和评论。他还涉及到了今天争议最尖锐的问题：И. В. 斯大林对中国态度基于他在新的，苏联式的XIX末—XX初传统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复兴，还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者在论述两种看法后倾向于赞同关于马克思学说对苏联领袖政策起了重要作用的结论。

“从友谊经过对峙到正常化”这一章是俄罗斯汉学家和国际关系问题专家、俄罗斯外交学院院长Е. П. 巴扎诺夫写的，它叙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苏联解体的复杂时期。这是两国最亲密友谊和最残酷敌对的时期。其中详细阐述了两个最大的共产主义制度国家建立联盟的原因和不可避免性以及双方之间产生分歧的必然规律。

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副院长、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外交关系学院(大学)东亚和上合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A. B. 鲁金写的下一章叙述俄中关系在苏联解体后的进化。作者详细叙述了俄罗斯外交政策总的方向改变引起的对华态度变化和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支链结构的建立。

第五章叙述了整个俄罗斯和中国关系中边界地区关系的进化。双方关系中暂时还没有充分研究和不很了解的这方面完全值得特别增大注意。它的作者们都是来自我国东部的著名俄罗斯学者:西伯利亚联邦大学人文学院普通历史教研室主任 B. Г. 达茨申,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地区人民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所长 B. Л. 拉林和该研究所高级科学工作者 Г. Н. 罗马诺娃。

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外交关系学院(大学)东亚和上合组织研究中心高级科学工作者 A. B. 伊万诺夫写的第六章分析俄罗斯/苏联和台湾、香港与澳门关系历史和现状。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部分的这些领土有自己特别的历史和特殊地位,因此可以分别评述。

A. B. 鲁金写的最后一章“俄罗斯和中国的今天与明天”是对专题书的历史研究内容的总结。其中以浓缩方式阐述主要问题和对两个伟大邻邦之间关系现状和发展前景的态度,评述成就、实际的和臆想象的问题。科学专题书面向广泛的读者:从研究相应课题的大学生到希望了解俄罗斯和外国同行对俄中相互关系具体问题的态度的专家。但愿我们的著作能引起研究俄中关系、亚太地区国际局势、俄罗斯总的外交政策问题的专家们的兴趣,并且有助于为确立俄罗斯对中国关系方针而创造理论与历史基础。



叶甫根尼娅·皮亚德舍娃

“国际生活”杂志责任秘书，
历史学副博士

pyadysheva@gmail.com



至关重要的世界政治和俄罗斯外交问题

一年一鉴的“外交年鉴——2012”（外交年鉴——2012，摘自文章。作者集体。M.：‘全世界’，2013年。共380页）在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建校80周年前夕问世。多年来以单集出版的年鉴刊有本年度发生的重大事件，对世界政治的“主流”课题进行分析的文章。作者的名字本身就显示了他们的资深专业水平。

今年，以外交学院院长叶甫根尼·巴扎诺夫，责任编辑特命全权大使尤里·佛金为首的“年鉴”编辑部收集了“灿若明星”的作者的文章。排版第一篇是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题为“变革中的世界：俄罗斯联邦外交优先方向”的文章。外长以详细的提纲方式，清晰地勾画了我国外交活动的画景。将俄罗斯在

*Евгения ПЯДЫШЕВА,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секретарь журнал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кандидат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О САМОМ ГЛАВНОМ В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Е 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世界上的作用标志为“是全球平衡、地缘政治稳定和世界政策均衡性的重要因素，是当代世界具有影响力的中心之一。”

与此同时，他就2012年的世界局势予以了公开和强硬的定性。（在此指出，这一集在今夏才出版并非出版社的过错。）但今天，当我们离2013年年终还有一段距离时，以下几行字就显示得更为迫切：“显而易见，从历史角度来说，世界正在经历空前的伴随了地缘政治地域的翻新，新力量格局的组建，经济、政治，国际关系总体上紊乱的过渡时期”。中东和北非地区继续在沸腾。令人严重不安的是叙利亚局势及围绕其周围事态的发展。俄罗斯致力推行的“负有责任的对外政策”，在今天可能予以了以和平方式结束叙利亚局部的“代理人战争”，未使其演变为残忍、流血的国际冲突的机遇。

就俄罗斯特殊优先方向而言，拉夫罗夫外长指出，我国对外政策的核心方向还将是独联体空间。外长写道，“增强在独联体空间的多边合作和扩大一体化进程——作为战略前景的和反映了全球化时代客观趋向，包括加强地区联合体作用的方针。”

与经贸上的主要伙伴——欧盟，俄罗斯为利于扩大战略合作范围在进行有序和耐心的工作。外长指出“我们与欧盟关系中关键的一点，仍然是为公民短期往来尽快过渡到实施签证免签制度。所有相关

的技术性和法律性问题都已解决，下一步就取决于政治意志。”

至于欧大西洋伙伴关系，总体上，这种伙伴关系在顺利发展，尽管反导防御系统课题依然是我们关系上的绊脚石。

在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其它方向上，拉夫罗夫外长在自己的文章中，将安全问题和就此启动的“赫尔辛基+40”进程作为重点。指出，政治一外交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别无选择性。俄罗斯在地区和国际组织中占有积极的立场。

不能不指出，为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对外政策的效力，部长建议更积极地启用“软力量”的能力。

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地区合作被选为“外交年鉴——2012”的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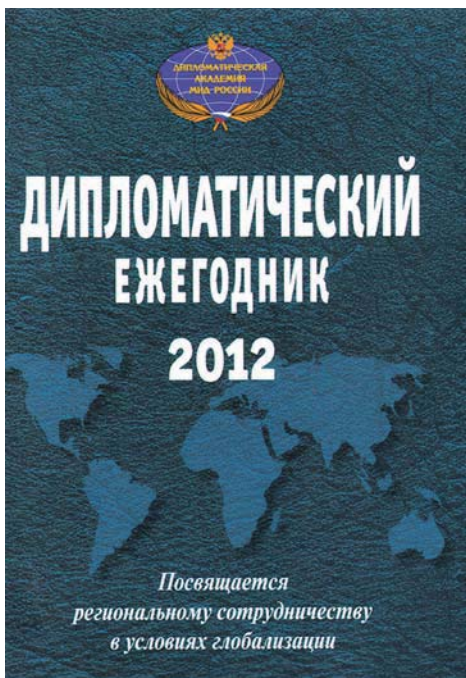
俄罗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弗拉基米尔·季托夫在“纪念巴伦支海欧洲北极地区理事会成立20周年”的一文中指出，巴伦支海欧洲北极地区理事会作为在北欧地区合作形式的独特性，体现于其在日常中再生合作议程的能力。20年来，巴伦支海地区合作做到最主要方面——保障了巴伦支海地区以社会—经济方面与履行包括辐射安全和保存北方土著民族原始性的生态要求紧密挂钩为重点的稳定发展。

就本集有关地区的课题，可以指出俄罗斯科学院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首席科研人员亚历山大·帕诺夫写的“俄罗斯融入亚太地区：2012—

2020年的前景”这篇文章。以对历史的回顾以及亚太地区现阶段的发展，即，俄罗斯被卷入当地出现的进程进行的分析，作者做出以下的结论：“俄罗斯东向政策的有效性将主要取决于在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科研发展采取的行动上的坚决性与合理性。俄罗斯东部地区的发展，只有与在亚洲地区进行的始终如一地，针对性地积极外交相结合，才能为俄罗斯确立作为公认的伟大的太平洋大国地位创建条件。”

在此，我们也得对本选集的编辑将两名外籍作者的文章归为栏目中的统一分类的构思予以应有的评价。其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特命全权大使李辉“中共十八大与中国内政外交的发展方向”的文章和中亚问题研究所所长贝尔梅特·阿卡耶娃的“中共十八大后的中国：成绩、问题与进一步发展的战略”一篇文章。两篇文章，实质上涉及的是同一个问题，但中国的作者以“家内”的立场进行阐述，而吉尔吉斯研究员描述的则是旁观的印象。真理就在于两者的中间。

俄罗斯科学院非洲问题研究所俄—非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科连加索夫和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莉迪娅·格里沙耶娃两名作者以“金砖国家和非洲：伙伴关系与合作的潜力”和“世界金融危机条件下的俄罗斯与金砖国家”的研究文章，为



研究和预测像金砖国家这种政治现象的发展添砖加瓦。

俄罗斯科学院欧洲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阿列克谢·葛罗米柯在“危机中的英国”一文里，阐述了英国政府两党制活动取得成功性的可能性。

俄罗斯驻墨西哥使馆人员塔季扬娜·阿夫杰耶娃在“墨西哥‘绿色’座向标：国家环保与气候政策的经验”一文中，实际上是提请意识到本课题对社会发展前景的重要性，在国家管理的所有层次上进行制定和推广环保计划，社会中进行生态合理生活方式的宣传，以及在国际生态合作上采取积极立场的国家对解决环保问题途径的注意。

分析性的文章，相对来说，是涉及各种课题的人文性质的资料。

康斯坦丁·多尔戈夫在“有关保障世界人权的局面：俄外交部人权、民主与法治问题全权代表的视角”为题的文章中，就此问题阐述了估计是世界上无人不关注的官方立场。

外交学院副院长亚历山大·卢金在“公共外交：国家宣传还是公民倡议”一文中，对需求逐日增大的作为“软力量”工具之一的公共外交进行推论。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瓦西里·利哈乔夫在“俄罗斯外交：议会的标尺”一文中涉及了吸引议会外交解决现实国际事务的问题。

联合国副秘书长卡塞姆·托卡耶夫“就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日举行的隆重活动上的讲话”，叶列娜·波诺马廖娃教授和盖奥尔吉·鲁多夫教授“作为向俄罗斯对外政策提出挑战的‘阿拉伯之春’的方法论”，无疑也都作为引起兴趣的文章是被纳入选集中。外交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系主任鲍里斯·洛吉诺夫撰写的“就中等阶级在世界发展中作用的非乐观的思考”，特命全权大使瓦连金·博格马佐夫“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与人

类的传统价值观”，外交学院国际法系系主任叶卡捷琳娜·雅妞克“论‘稳定发展’构想的国际法工具问题”，尤里·库尔诺索夫教授和亚历山大·季缅科夫系主任“采取基于局势中心的外交活动领域决定的信息—分析支持”。

“外交：历史和当代”传统地作为引发兴趣和有益读物的一栏。比如，盖尔曼·罗赞诺夫教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第二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文中讲述了苏联外交官如何在二战中战胜战役的情况。

作为“真理报”本记者在英国工作了多年的帕维尔·博格莫洛夫发表了以“罗尼和麦琪：他们两重唱背后隐藏了什么？（国际记者笔记）”为题的推论性文章。

奥斯陆大学教授卡尔·乌戈朗回顾了俄罗斯—挪威的经济关系。他撰写了一篇题为“俄罗斯—挪威贸易史上若干问题（自维京时代至较晚时期）”的文章。

“外交年鉴——2012”既有利于业务上的研究，也可以作为消遣读物。估计，国际关系的“资深”人士和刚踏上研究对外政治途程的大学生，以及爱好阅读世界政治事务书籍的人，都会在该选集中找到自己关心的文章。



Digest 2012



LA VIE INTERNATIONALE

Politique étrangère, diplomatie, sécurité nationale



www.INTERAFFAIRS.ru

Специальный выпуск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INTERNATIONAL AFFAIRS

АТЭС РОССИЯ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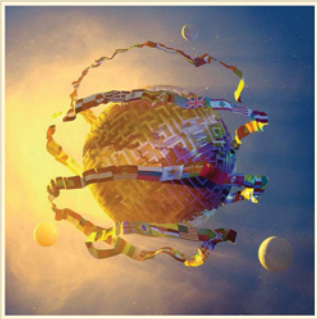
www.INTERAFFAIRS.RU APEC
Eurasian Cooperation

Digest 2012



VIDA INTERNACIONAL

Temas de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diplomacia y seguridad nacional



www.INTERAFFAIRS.ru

文摘 2012




国际生活

俄罗斯对外政策、外交和国家安全




www.INTERAFFAIRS.ru

Special Issue 2010



INTERNATIONAL AFFAIRS

RUSSIA – ASE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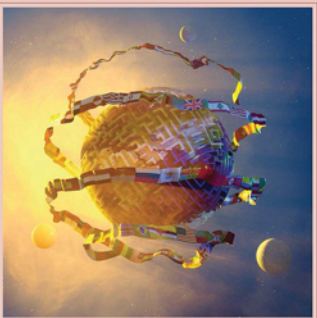
www.INTERAFFAIRS.ru

Digest 2012



الاحداث السياسية الدولية

للمناخ السياسي الخارجي، والدبلوماسية، والأمن القومي



www.INTERAFFAIRS.ru

Май 2013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Проблем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дипломат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68 лет назад закончилась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Золотая коллекция» Эрика Туомийо
Министр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Финляндии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основные задачи момента
Кирилл Барский
Специальный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по делам ШОС


Деловой совет ТПП РФ – путь на зарубежные рынки
Георгий Цетров
Вице-президент Торгов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й палаты России

В МИД РФ
Игорь Халевинский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Совета Ассоци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дипломатов

Москва. Издаётся с марта 1922 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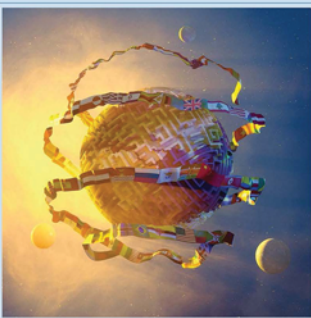


Digest 2012



INTERNATIONALES LEBEN

Problem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iplomatie und der nationalen Sicherheit



www.INTERAFFAIRS.ru

VOLUME 59 NUMBER 2, 2013

International Affairs

A Russian Journal of World Politics,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is Issue

- Press Conference of Sergey Lavrov
- On the New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Asia-Pacific
- Russian Muslims and the "Arab Spring"
- Eurasian Vector of Development
- Citizen Voting Rights in the 2012 U.S. Election
- The Little World War in South America
- Stalingrad, an Imperative of History



